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中共政治繼承佈局與菁英甄補之研究

—以「十七大」政治局為例

指導教授：曲兆祥 博士

研究生：蔡明宏 撰

中華民國一〇二年一月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The Inquiry of CCP Political Succession and Elite
Recruitment—A Case Study on the Seven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Politburo**

Advisor: Chu, Chao-Hsiang Ph.D.

Graduate Student: Tsai, Ming-Hung

January 2013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謝誌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取得碩士學位，也象徵著我將邁向人生的下一個學習階段，回首撰寫論文時，大多時間都沉浸於書籍和文獻之中，如今想來，當時的努力總算是有了代價。能夠完成研究所的學業，最該感謝的是家人的支持和幫助，尤其是我的父母，他們在我的求學路上，總是無怨無悔的資助我生活上的需要，讓我能夠無後顧之憂的完成學業，這點對我有很大的幫助，因此，我在這要對他們表達感謝之意。

其次，感謝所上曲兆祥老師對論文的指導，每一次跟曲老師的面談，就像是進行腦力激盪一般，讓我獲益良多，老師也給予我表達意見的空間，充分解除我的疑慮和困惑之處。另外也要感謝所內論文發表會時之評論人高輝老師和口試委員寇健文老師、吳建忠老師，這幾位老師都是國內中共研究的專家，三位老師對論文的修正意見，使得本文在立論上能夠更加完善、更加充實。

最後，我想感謝研究所生活時所認識的朋友，讓不善交際的我，也能夠在生活之中充滿歡笑。在此也要謝謝娃娃的一路相伴，在我感覺孤單、寂寞和沮喪的時候，總是不斷的鼓勵和支持我，娃娃的包容，讓我有繼續前進的動力。總之，謝謝大家。

明宏 謹誌

校所名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論文題目：中共政治繼承佈局與菁英甄補之研究—以「十七大」政治局為例

畢業時間：2013年（一〇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碩士學位論文摘要）

研究生姓名：蔡明宏

指導教授：曲兆祥 博士

論文摘要：

過去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曾憑藉著革命經歷和個人特質為其帶來無人能敵的政治威望，直接指定在其之後的接班人選，致使政治繼承在這個時期不僅充滿了高度的人治色彩且派系鬥爭激烈，導致政治局勢動盪不安，嚴重耗損中共政治菁英。為了讓接班過程能夠平穩和順暢，權力繼承與菁英甄補在鄧小平「有意」的推動之下，開始有了些許的「規範」。

隨著時代的變遷與政治老人的逐漸凋零，已讓政治強人逐漸退出中國政治。而且，在客觀環境因素的考量下，未來出現政治強人的機率也已經大幅降低。因此，我們注意到的是，胡錦濤和前代的江澤民都是由「政治強人」鄧小平所指定的接班人選，未來中共的領導人將會如何產生，是一個相當值得研究的問題。2007年10月，中共召開了「第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會中除了施政報告和制訂未來方針外，另一項重點就是人事的安排。按照慣例，胡錦濤會於「十八大」時，卸下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職務，而提前安排下一代領導梯隊進入權力核心，是中共培養接班人的作法，這無疑說明了「十七大」的重要性，所以本文將在此前提之下進行研究。

但是，若僅憑「十七大」的人事安排來探究中共菁英甄補的規範，將無法全面性地了解中共菁英甄補的演變，以至於容易出現以偏概全的缺失。所以本文將透過歷史的回顧，探究中共自「十四大」以來，政治菁英甄補規則的發展或制度的累積，再以此分析「十七大」的人事安排有何意涵，而欲進入中共權力核心需要何種條件或是受到哪些規範限制，都是本文的研究重點。

【關鍵字】 政治繼承、菁英甄補、十七大、政治局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Title of Thesis: The Inquiry of CCP Political Succession and Elite

Recruitment—A Case Study on the Seven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Politburo

Student: Tsai, Ming-Hung

Advisor: Chu, Chao-Hsiang Ph.D.

Abstract:

In the past,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both had the advantage in their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and personal traits, which brought them an invincible political prestige. They both designated their successors directly, which resulted in a fierce political succession that not only caused a strong man-based rule, but also lead to a serious deple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CCP) political elite. In order to have a smooth succession process, succession of power and elite complements were given impetus by Deng Xiaoping's "intention," and which began with some "norms."

With the changing of time and senior politicians dying, the political strongmen are gradually withdrawing from Chinese politics. For objective consideration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 probability of generating a future political strongman has also been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refore, we note that the successor Hu Jintao and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f Jiang Zemin were selected by political strongman Deng Xiaoping. Hence, how to develop future Chinese leaders will be a problem that is important to study.

In October of 2007, the CCP convened the Seventeenth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In addition to addressing policy and formulating future direction, personnel arrangements was another focus of this convention. By rule, Hu Jintao will leave his duties to the top party leaders at the Eighteenth Session and will arrang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hip to have their core power in advance. This may strengthen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venteenth Session, and this thesis has based its study upon this premise.

However, exploring the elite recruitment norms from the Seventeenth's personnel arrangements alone would allow us to hav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elite complement, and it may be prone to

overgeneraliza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historical review by investigating Communist China's accumulated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al elite recruitment rules or system since the Fourteenth Congress. Additionally, this article also focuses on analyzing what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personnel arrangements in the Seventeenth Congress are, and what conditions need to be had or what norms were limited to allow for the CCP's core power.

【keywords】 political succession, elite recruitment, 17th CCP National Congress, Politburo

目次

| | |
|--------------------------------|-----|
| 第一章 緒論 | 1 |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
| 第二節 相關文獻回顧..... | 3 |
|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 15 |
|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 19 |
| 第五節 研究架構..... | 21 |
| 第二章 鄧後中共權力結構與菁英甄補 | 23 |
| 第一節 鄧後中共政治繼承..... | 23 |
| 第二節 中共權力結構..... | 41 |
| 第三節 中共菁英甄補之非制度性制約..... | 53 |
| 第四節 中共菁英甄補之制度性制約..... | 62 |
| 第三章 鄧後中共政治局之人事甄補 | 75 |
| 第一節 中共「十四大」之人事安排..... | 75 |
| 第二節 中共「十五大」之人事安排..... | 87 |
| 第三節 中共「十六大」之人事安排..... | 102 |
| 第四章 中共「十七大」之政治繼承 | 117 |
| 第一節 意識形態的繼承與更新..... | 117 |
| 第二節 政治局人事安排與分析..... | 126 |
| 第三節 中共政治繼承佈局之分析..... | 144 |
| 第五章 結論 | 155 |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 156 |
| 第二節 研究建議..... | 165 |
| 參考文獻 | 167 |

圖表目錄

| | |
|--------------------------------------|-----|
| 圖 1-1 研究架構圖 | 22 |
| 圖 2-1 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結構圖 | 43 |
| 圖 4-1 2007 年省級黨委書記、副書記年齡和學歷結構圖 | 128 |
| 圖 4-2 十四屆以來政治局新人比例 | 134 |
| | |
| 表 1-1 中共兩次權力繼承模式之比較 | 7 |
| 表 2-1 中共政治繼承和整肅異己變遷表 | 38 |
| 表 2-2 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人數統計表 | 45 |
| 表 2-3 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與交流工作規定 | 69 |
| 表 3-1 中共第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 79 |
| 表 3-2 華國鋒與江澤民相似處比較表 | 81 |
| 表 3-3 中共第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 93 |
| 表 3-4 中共第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 106 |
| 表 3-5 十六屆政治局中的「上海幫」成員 | 114 |
| 表 4-1 中共第十七屆中央政治局成員 | 129 |
| 表 4-2 十四屆至十七屆政治局常委的重要職務分工與排名 | 135 |
| 表 4-3 十二大以來歷屆政治局成員教育程度 | 137 |
| 表 4-4 十七屆政治局委員中的團派人物 | 140 |
| 表 4-5 十七屆政治局中具「太子黨」身分的委員 | 142 |
| 表 5-1 十四大以來政治局成員的年齡結構 | 157 |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將先對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提出說明，並透過文獻的回顧，來擇定研究途徑與方法，同時也會界定研究的範圍，並說明研究時，可能遭遇的限制，在統整匯合之後，提出本文的研究架構。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共黨國家的政治繼承與菁英甄補，不若民主國家，擁有一套完善的法定程序和機制，並且運用由下而上的民主選舉制度之方式來選任國家領導人。中共的權力繼承已經歷經多次的轉移，每一次的繼承方式，都有不盡相同之處。過去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憑藉著革命實績和個人累積的政治威望，取得權力核心的地位，為了避免劇烈的權力鬥爭，影響到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他們也都了解到培養接班人的重要性，雖然過程中歷經幾度波折，¹但培養接班人的態勢早已儼然成形。早期中共的權力移轉伴隨著派系鬥爭和路線之爭，但隨著革命時代的消逝，以及政治強人已不復存在的情形下，將使獨裁領導和欽點接班受到挑戰，所以中共的權力繼承和菁英甄補也開始轉型，以確保政權趨向穩定。鄧小平自 1978 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復出掌權後，歸納毛澤東和其它共黨國家權力繼承失敗的經驗教訓，積極建章立制，相繼提出且逐步落實幹部任用「四化」方針、²任期制和屆齡退休等制

¹ 吳宜純(2007)在其碩士論文《中共領導人「指定接班」問題之研究》中觀察出毛澤東曾在不同時期指定劉少奇、林彪、四人幫和華國鋒為其接班人選。劉少奇因和毛澤東在政治上意見有所分歧，致使在文革期間慘遭批鬥；而林彪和毛澤東的分歧則是在於對當時國際情勢的研判意見不同、林彪在政權和軍權擴張和個人崇拜問題..等，彼此衝突越加明顯，最後導致林彪倉皇出逃，墜機而亡；四人幫則因四人幫事件，無法掌權；華國鋒則因和四人幫及鄧小平之間的鬥爭敗陣下來。鄧小平先擇定胡耀邦為其接班人，但胡耀邦因對學生運動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縱容而下台；之後鄧小平擇定趙紫陽接班，趙紫陽因保守派人士的反對、失敗的物價改革和 1989 年學運的處理不當而下台。

² 中共現行人事體制改革建立於幹部四化原則之上，以專業化、知識化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期有效提昇政府效能與活力，以年輕化培養梯隊接班及所需人才，以革命化反腐敗鬥爭，鞏固政治價值與基礎。

度。³至此之後，中共在政治菁英甄補方面，有了規範性的準則。而在黨和國家領導人方面，由於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和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皆是由「政治強人」鄧小平所指定的接班人選，但如同先前所述，政治強人已不復存在，中共現階段的政治情勢，也不易再產生政治強人，因此胡錦濤之後的接班人選和接班模式，更值得吾人研究。

2007年10月，中國共產黨召開了「第十七屆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十七大」），會議中除了施政報告和未來方針，另一項重點便是人事上的安排，不僅研究中共政治者關心，國內外媒體也高度關注這場會議，早在會議召開之前，各種人事安排傳聞不斷，各方皆試圖大膽揣測中共未來的可能接班人選，這無疑說明了「十七大」的重要性。由過去的例子來看，中共習慣讓接班人選提前進入權力核心，以便熟悉政務和降低派系惡鬥的可能性，因此，「十七大」的菁英甄補便顯得格外重要，吾人希望藉由「十七大」的人事安排，觀察和窺探出未來接班的可能發展，而進入「十七大」權力核心的人選，是否儼然成為梯隊接班的班底？胡錦濤之後將由誰接班、如何接班以及接班過程將面臨哪些挑戰？誰又可能是第五梯隊的最高領導人，集體領導制是否將持續下去？另一方面，進入中共權力核心須具備哪些條件，這些議題都值得關注中共政治者，作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二、研究目的

中共是一個「以黨領政」及「黨國體制」的龐大人治機關，1949年建政初期，以「槍桿子出政權」和派系惡鬥等方式，來奪取政治權力，但是高度的派系鬥爭容易消耗國家實力，也使得政治菁英耗損過快，嚴重時，更可能產生政權崩潰的可能性。因此，中共領導人也開始思索菁英政治的重要性，盡可能建立一套規範和準則，希冀政治菁英的甄補能夠順暢和正常化，但這並非意味著派系的鬥爭就因此消失，而是轉趨向檯面下發展。外界論及中共權力交接，仍習慣用派系鬥爭來看待這一切，例如「十七大」的「團派」、

³ 吳仁傑，〈中共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書記接班角色探析〉，《中共研究》，第40卷第6期，2006年6月，頁45。

「太子黨」和「上海幫」...等派別的分布情形。但是，單單只用派閥來闡述一切的人事安排，不僅無法充分了解中共政治菁英甄補的規則，也容易有以偏概全的情形產生。2002年江澤民將總書記和國家主席職務交給胡錦濤，2004年9月決定進一步辭去中央軍委主席，正式完全將黨、政、軍職務，交棒給胡錦濤，此接班方式，外界多給予和平順利的評價，而此一模式是否有助於中共建立權力繼承規範，值得探討，有藉於此，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有以下幾點：

(一) 從過去幾次的政治繼承經驗，探究中共權力接班的轉變和未來的可能發展。

(二) 探討中共政治菁英甄補有何規範和準則，是否有制度化的傾向？抑或有何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制約。

(三) 「十七大」權力核心的人事安排有何意涵？從相關文獻分析和探討「十七大」的甄補特色和未來走向。

(四) 胡錦濤身為黨、政、軍的最高領導人，他在「十七大」上扮演何種角色？是否能夠影響「十七大」的人事運作。

第二節 相關文獻回顧

一、派系政治之研究

毛澤東在1966年8月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一席「黨內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的談話，間接證實了中共黨內有派別之分。⁴早期對於中共權力移轉的研究，也多數從派系政治的角度來分析。黎安友(Andrew J. Nathan)曾在1973年的《中國季刊》發表一篇〈中共政治的派系主義模式〉(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之文章，黎安友認為，中共的派系主要是依據上下位階的扈從關係(clientelist tie)所形

⁴ BBC 中文網，〈分析：黨內無派不再千奇百怪〉，《BBC 中文網》，2012年9月18日，<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analysis/2012/09/120918_ana_party_factions.shtml>。

成，個人與他人之間為了展開可能的利益交換，是派系之所以能夠被建構的主因，派系是中共高層的基本要素，其可以區分為簡單派系(simple faction)和複合派系(complex faction)，前者是單一派系領袖依據與其他成員的扈從關係而形成；後者則是由許多簡單派系匯集而成，派系成員須透過次級領導人，而與派系最高領導人產生聯結關係，意即不論簡單或複合派系，成員之間不需要有橫向的連繫關係。此外，黎安友認為中共派系之間受制於權力的侷限性，以致於彼此間的互動是處在一種「非零和」(non zero-sum)的狀態，也就是說，派系彼此之間皆體認無法完全消滅對方。⁵

但是黎安友所提出的派系模式，受到鄒讜(Tang Tsou)的強烈質疑，鄒氏認為黎安友的派系模式僅適用於某些時期的中國政治(如文化大革命時期)，但無法解釋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彼此結盟整肅「四人幫」的過程，因此鄒讜認為菁英之間的結盟不該是被限縮在具有上下垂直的扈從關係，也可以是橫向水平的同儕關係且派系之間的互動是屬於「贏者全拿」(winner-take-all)，任何派系之間都會試圖消滅敵對派系。另外，鄒氏提出以「非正式集團」(informal groups)來取代派系的概念。⁶

而羅德明(Lowell Dittmer)則提出「非正式政治」(informal politics)來闡述中共的派系政治。羅氏認為「關係」(relationship)是「非正式政治」的核心，而價值理性關係(value-rational relationship)之中的親屬、同鄉、同事、同儕...等水平的非正式關係也可以是派系形成的基本要素。⁷白魯恂(Lucian W. Pye)則從中國人的政治心理之角度來分析派系政治的存在，他認為中國的傳統文化致使中國人深信「關係」才是安全的保障，而這些「關係」就是派系形成的本源。派系領袖和追隨者彼此之間是一種互利關係，前者需要號召後者來壯大聲勢，而後者則藉由依附前者的權威來保護自

⁵ Andrew J. Nathan,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NO.53, January 1973, pp.35-42.

⁶ 鄒讜著，甘陽編，何高潮等譯，《中國革命再闡釋》(Interpreting the Revolution in China)(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180-190。

⁷ Lowell Dittmer,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NO.34, July 1995, pp.12.

身利益或權力。白魯恂認為派系之間時常因為政策路線和意識形態的分歧而鬥爭，但鬥爭的主要本質是為了爭奪或保護權力地位。⁸

蘇嘉宏在《派系模式與中共政治研究》一書中，對中共派系形成的背景因素闡述見解，蘇氏認為除了類同關係和利益關係外，中共派系的形成有五點背景因素：(一) 受到馬列主義鬥爭哲學的影響；(二) 受到國際共黨的影響；(三) 中共早期鬥爭傳統之影響；(四) 毛澤東個人權謀之影響；(五) 政策路線不同的影響。⁹寇健文在〈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途徑與發展〉一文中，提出了四種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途徑，分別為極權主義途徑、派系政治途徑、世代政治途徑和技術專家途徑，寇氏認為相較於其他三種途徑，以派系政治途徑來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無論是在理論建構或是實例分析上，成果更為豐碩。¹⁰李英明在《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一書中提到，長期以來，研究中共高層菁英的權力運作或繼承問題，以派系主義為研究途徑者，往往會因為過於突出派系的影響力，而忽略和抽離制度因素的背景。¹¹

寇健文從實際資料分析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崛起的原因時發現，若是從職務種類的分布來看，共青團已經成為培養中國大陸各級黨政首長，以及組織、宣傳、統戰、紀檢等部門主管的一個（但非唯一）重要場所。賦有幹部輸送任務的共青團把優秀幹部輸送到各省黨政機關，無須顧慮派系圍剿的問題，或是「搞派性」的批評，所以胡錦濤自上臺以後，為了鞏固本身權力基礎，大量從團系之中挑選可信賴的人，占據重要領導職務，並反映在團系出身的省委書記和省長人數激增。因此，團系崛起是受派系考量與組織任務的共同影響。¹²

⁸ Lucian W. Pye 著，胡祖慶譯，《中國政治的變與常》(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台北：五南，1989年)，頁5，9，17-19。

⁹ 蘇嘉宏，《派系模式與中共政治研究》(台北：永然文化，1992年)，頁110-117。

¹⁰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途徑與發展〉，《中國大陸研究》，第47卷第3期，2004年9月，頁17。

¹¹ 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台北：生智文化，2003年)，頁20。

¹² 寇健文，〈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的崛起：派系考量 vs. 幹部輸送的組織任務〉，《遠景基金會季刊》，第8卷第4期，2007年10月，頁83。

儘管中共對於外界透過派系為媒介來分析中國政局並不苟同，¹³但從上述學者的研究來看，派系的確是分析中國政治的主要憑藉之一。但我們亦可以發現，學者之間對於派系的定義並不統一，本文為了避免文獻間的爭議而失焦，也為了研究需要，在綜合上述學者的見解之後，本文將派系定義為個人與他人之間依據某種「關係」為基礎所形成的非正式組織，這種關係可以是上下位階的扈從關係，亦可以是橫向水平的結盟關係，派系間的成員彼此互惠互利，並透過派系所具有的權力關係網路展開可能的利益交換。

二、政治繼承和菁英甄補之研究

所謂政治繼承是指統治權力因上層領導人的改變，而從一個統治者或政府手中，轉移到繼任者的過程。而吾人在探究政治繼承時，通常是分析「在特定制度或環境之下，某個人或團體，對一個政治職位的繼承，以及此繼承過程對該國政治體系中的結構和政策所產生的影響」。¹⁴繼任者必須透過人事安排、制度調整和理論更新來達到權力鞏固的階段。¹⁵

巴克曼(David Bachman)認為1990年代，美國不重視中國政治菁英的研究，有以下幾點原因：(一) 當時中共政治並未透明化，研究者必須倚賴正確性堪慮的香港刊物；(二) 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就有人討論繼承問題；但對鄧小平死亡的長期等待和中共中央政治上的停滯也妨礙了菁英政治研究，出現沒什麼新意可提的現象；(三) 許多後鄧時期的人物，都缺乏政治魅力，讓人沒有興趣去研究這些人；(四) 中央政治是否能夠全面解釋菁英政治，是令人有所存疑的；(五) 美國學者認為地方政治單位更容易接觸，是比較好的研究對象；(六) 因為現在的資料，在將來可能被證實是錯誤的，

¹³ 鄧小平和趙紫陽都曾在接見外賓或接受外媒採訪時表示，若將廣大的中共黨員簡單地區分為「改革派」和「保守派」，將無法了解中國實際的政治局勢。詳見朱新民，《1978~1990年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台北：永然文化，1991年)，頁322-323。

¹⁴ Seweryn Bialer,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65.轉引自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10》(台北：五南，2010年)，頁58。

¹⁵ David Bachman, "Succession Politics and China's Futu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9, NO.2, Winter 1996, pp.375.; 王嘉州，〈論「三個代表」與政治繼承〉，《中國事務》，第10期，2002年10月，頁24。

導致學者不願意大膽且耗費時間去進行研究；(七) 許多美國和中國學者都預期中國未來會產生民主轉型，因此沒必要研究現行的體系。¹⁶

吳玉山在《後鄧時期對大陸及台灣的震盪》一書中，比較了毛澤東和鄧小平的繼承模式(見表 1-1)。

表 1-1 中共兩次權力繼承模式之比較

| | 比較特徵 | 毛澤東的繼承 | 鄧小平的繼承 |
|-----|------------------|------------------------|-------------------------|
| 相異處 | 培養繼承人時間 | 短 | 長 |
| | 權力移轉型形式 | 上下代間權力鬥爭 | 同代間權力鬥爭 |
| 相同處 | 第一次實現理念 | 三面紅旗大躍進 | 1978 至 88 年十年經改 |
| | 第一次退卻 | 劉鄧三自一包 | 治理整頓 |
| | 第二次實現理念 | 文化大革命 | 1991 年開始之第二次城市經改 |
| | 重拾領導權之策略 | 聯合學生、軍人對付北京中央 | 聯合東南各省市對付北京中央 |
| | 爭奪繼承權派系 | 極左派對保守官僚派 | 成長改革派對保守官僚派 |
| | 派系領袖的死亡導致群眾事件 | 周恩來死，導致第一次天安門事件 | 胡耀邦死，導致第二次天安門事件 |
| | 派系領袖因之被整肅 | 鄧小平被剝奪黨內外一切職務，但未死亡 | 趙紫陽被剝奪黨內外一切職務，但未死亡 |
| | 最高領袖安排中派接班，平庸但集權 | 華國鋒為最終繼承人，為黨主席、總理及軍委主席 | 江澤民為最終繼承人，為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及軍 |

¹⁶ David Bachman 著，張鐵志、林葦芸譯，〈鄧後中國的政治衝突模式〉，田弘茂、朱雲漢編，《江澤民的歷史考卷》(台北：新新聞文化，2000 年)，頁 68-69。

| | | | 委主席 |
|------|----------------------------------|--|------------------------|
| 模式類推 | 最高領導死，中派政變，推倒最高領袖嫡系，和嫡系的對立派系共享政權 | 毛澤東 1976 年死：華國鋒十·六政變剷除極左派四人幫，鄧小平復出和華共享政權 | 鄧小平死：江澤民剷除朱鎔基，和李鵬共享政權？ |
| | 嫡系的對立派系剷除中派，獨攬政權 | 鄧小平鬥倒華國鋒 | 李鵬鬥倒江澤民？ |

資料來源：吳玉山、林文程、江水平，《後鄧時期對大陸及台灣的震盪》（台北，國家發展研究文教基金會，1995 年），頁 32。

羅德明在中共召開「十五大」之後，發表了一篇〈Sizing Up china's New Leadership: Division of Labor, Political Background, and Policy Orientation〉的文章，他分析了當時「十五大」中央委員會的成員背景後發現，改組情況有兩大特點：首先，領導結構開始以技術官僚為主；其次，地方菁英進入中央委員會的比例有所成長。而談到中共權力交接問題時，他分析了胡耀邦、趙紫陽和江澤民的三次權力繼承後認為，這三次繼承的基本架構是一樣的，都是領導人在死前就安排好的繼承，其中只有兩位主要的行為者：現任領導人與其接班者，唯一不同的是，江澤民懂得運用政治技巧來化解繼承危機。¹⁷

楊中美認為由於中共最高權力接班機制的非法制化與非民主化(黨內的民主集中制)，致使中共黨內可能為了競逐最高權位而爆發激烈的鬥爭。一旦出現各種社會矛盾結合黨內權力鬥爭而激化震盪，有可能會導致軍事政變或軍事接管政權，因為軍隊是中共在一黨專政下，唯一可以依賴的力量。¹⁸任慧文表示中共培養和選拔跨世紀接班人的迫切性是基於三個因素：(一)是

¹⁷ Lowell Dittmer 著，張鐵志、林葦芸譯，〈中國新領導—從分工、政治背景、與政策傾向評量〉，田弘茂、朱雲漢編，《江澤民的歷史考卷》（台北：新新聞文化，2000 年），頁 47-49，62。

¹⁸ 楊中美，《新紅太陽：中共第五代領袖》（台北：時報文化，2008 年），頁 35。

防止西方和平演變中國的需要；(二) 解決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幹部老化問題；(三) 提高中央運作效能和加強地方領導的需要。¹⁹

鄭永年在十六大召開之前，對於中共權力繼承的問題，提出些許的看法。鄭氏認為，海內外之所以會如此關注中共接班人問題，就是因為中國政治運作既不透明，也缺少制度化。雖然有年齡和任期等限制，但最終還是避免不了與領導人的個人政治利益有所牽扯，除此之外，派別的利益也成為考量之一，而派別捲入接班人問題，將使權力繼承更加複雜。²⁰

丁望在《胡錦濤與共青團接班群》一書寫到，就他觀察 80 年代中共選拔菁英規範時，發現所謂選拔四化原則，有往革命化傾斜的現象，當時所稱的革命化是指要政治正確，具有堅定和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²¹直至 1994 年 4 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錦濤重申鄧小平的堅持改革開放路線，革命化轉變為擁護領導人的權威和政策，丁氏同時發現雖然德才兼備是甄補菁英的準則之一，但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期，落實幹部知識化的成效不彰。²²

吳仁傑認為雖然中共權力繼承機制自鄧小平時代就開始開始建構，並且逐步在幹部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方面取得成效，但是在退出和新老交替機制明顯不足的情況下，時常出現一線領導人的決策受制於退居二線的政治老人間之權力鬥爭，不但引發繼承危機，更導致權力不正常的更迭。雖在政治強人壓陣和妥協中屢屢化險為夷，但已經嚴重影響政局穩定和政策延續，更傷害制度權威，致使中共不得不開始發展風險較低，且符合各方利益的繼承機制。²³

1978 年以後，中共陸續開始改革幹部制度與國家領導制。在幹部制度方面，改革內容包括「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的實質終身制」、「推動幹部四化政策」、「建立領導班子的梯隊接班」。在國家領導體制方面，改革的焦點主要

¹⁹ 任慧文，《鄧後權力交班內幕》(台北：書華出版，1997 年)，頁 44-45。

²⁰ 鄭永年，《胡溫新政：中國變革的新動力》(新加坡，八方文化，2004 年)，頁 201-203。

²¹ 所謂四項基本原則指的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²² 丁望，《胡錦濤與共青團接班群》(香港：當代名家，2005 年)，頁 176-177。

²³ 吳仁傑，〈中共權力繼承機制探討與展望〉，《中共研究》，第 39 卷第 3 期，2005 年 3 月，頁 65。

是「黨政分開」和「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責任相結合」，這些變革直接影響中共政治菁英之間的互動，以及對於接班的安排。²⁴

寇健文在觀察中共梯隊接班過程，有幾點發現：首先、黨政領導班子年齡呈現多層次分佈。由於早期的接班所指涉的僅止於最高領導人之職務交替，並未對其他領導幹部作通盤性的考量，在梯隊接班模式建立後，中共開始有計劃的選拔中生代幹部，使得領導班子年齡至少呈現兩個層次以上的分佈；其次、年齡限制和任期限制成為幹部新陳代謝的機制。高齡的領導幹部，因為年齡和任期因素必須卸下職務，使得政治菁英甄補的管道得以開啟，不至發生斷層現象；再者、接班梯隊以集體領導和分工合作方式來繼承權力。雖然總書記仍是影響力最大的領導人，但他非政治強人，環顧現實政治情勢，他已很難具有抗拒其他常委聯合抵制的壓力，合縱連橫將是中共高層政治的常態；最後，接班人選會透過醞釀協商過程產生，且在醞釀過程達到群眾接受的共識。²⁵

楊開煌在觀察過去中共歷次接班情形，他發現接班人的選拔方式有以下四種要點：（一）是一種政治菁英選拔政治菁英的方式；（二）個人才能是選拔的主要依據，例如，劉少奇、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人的政績都受人肯定；（三）接班人必須要經過民意的歷練，如民意不支持，也無法順利接班，如四人幫和華國鋒；（四）接班在中國政治文化中，是一種現任領導人培養未來接班人聲望的過程。同時楊氏也發現，位處接班人的位置，有其困擾存在，首先是接班者處境尷尬。凡事不能無主見，又不能太有主見，分寸之間的拿捏，實屬困難；其次是接班者與同儕之間的關係問題。由於接班者並非完全確定可以順利接班，因此與同儕之間必須保持一定的關係，屬於一種既鬥爭又拉攏的微妙關係；最後是下屬相鬥的問題。可能的接班人選，身邊必然圍繞許多附庸者，附庸者與其同儕之間也會產生鬥爭的情形，如何不讓下屬鬥爭情形，危及接班地位，也是必須費盡心力。²⁶

²⁴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台北：五南，2005年），頁71。

²⁵ 寇健文，〈權力轉移與「梯隊接班」機制的發展〉，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文化，2003年），頁61-65。

²⁶ 楊開煌，〈中共「十六大」之接班與人事安排—內在邏輯之探討〉，《遠景基金會季刊》，第3卷

吳仁傑撰文探討「中共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書記的接班角色」，根據吳氏的研究和觀察，他認為儘管未見明文規範，但較最高領導人年輕一輩(約10歲上下)的書記處排名第一書記被視為接班人培養歷練已形成慣例，此與現行的年齡和屆期限限制以及最高領導「三位一體」²⁷體制與集體接班機制結合，初步為中共構築一套高層權力繼承機制，除有利於其權力轉移朝向規範化發展，亦有助於觀察和掌握其高層人事變動。²⁸

徐斯儉認為如果用韋伯(Max Weber)對權威的三種理念型來說，包括「魅力型權威」(如毛澤東和鄧小平藉由革命經歷和個人特質取得政治威望)、「傳統型權威」(如六四後元老合議指定江澤民和隔代指定胡錦濤為第三代、第四代領導人)、以及「法制型權威」(如各種黨內文件或國家法律法規)。當中共中央菁英不能再以個人魅力作為正當性來源時，也就沒有任何一位中央領導人具有先天高於同輩的權威基礎。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央菁英彼此之間的關係更為平等，但也更為競爭，權力繼承者通常需經過要一段時間的努力，才能鞏固權力。²⁹

綜觀上述學者的研究，我們可以了解到，縱使中共對於菁英甄補已有些規範和準則，但在「人治」色彩濃厚的體制之下，政治繼承仍有很大的部分受制於非制度性因素的影響，因此，若要分析中共菁英甄補的情況，亦不能將派系、意識形態等因素排除在外，所以本文將盡可能兼顧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對於中共菁英甄補的影響，並藉此窺探兩類制約在權力繼承機制中的互動情形。

三、制度化之探討

90年代開始，有越來越多學者開始探討中共菁英甄補制度化的可能性，不過各方看法不一，以下將分別陳述學者的意見。

第3期，2002年7月，頁109-111。

²⁷ 三位一體指的是，中共最高領導人將會身兼黨的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對此中共雖然並沒有明文的法令規定，但似乎已成慣例。

²⁸ 吳仁傑，〈中共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書記接班角色探析〉，頁60。

²⁹ 徐斯儉，〈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精英與政策〉，徐斯儉、吳玉山主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精英與政策》(台北：五南，2007年)，頁3-4。

寇健文認為制度化的政治繼承機制應該包括兩個部分：（一）有關政治繼承的遊戲規則。這些規則通常存在於憲法、其他法律或執政黨的內部規章，亦可能僅是政治菁英之間的不成文默契，政治繼承的遊戲規則應該清楚規定領導人的選派程序、任期長短與連任次數、去職和罷免程序，以及有權認可上述過程的機構等問題；（二）主要政治行為者對於遵守這些遊戲規則達成共識，意即政治菁英對政治繼承規則的共識則是指主要政治行為者是否願意遵守現有政治繼承的遊戲規則。³⁰

寇健文觀察過去中共二十年來的權力交替，發現中共就幹部甄補的面向，已經逐漸發展出一些規範，其中可以從年齡限制、任期限制和梯隊接班幾項指標獲得驗證；寇氏表示儘管從過去二十五年來看，中共菁英政治確實朝制度化的方向發展，但仍有一些瓶頸有待突破。因此，他認為中共菁英政治並未真正通過「制度深化」的最後考驗，也不能排除現有制度化趨勢逆轉的可能性。如果中共能克服「最高領導人的年齡限制或任期限制」、「如何選擇新任領導人」、「如何定位新舊任領導人的權力關係」三大瓶頸，制度化將進一步大幅躍升。如果不能克服這三個瓶頸的話，中共菁英政治將很難完成制度化的歷程。此外，在「十七大」召開之前，寇氏以「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和「年齡限制」兩個原則所發展出的三個制度性必要條件「必須是現任（十六大）中央委員或候補委員」、「必須是現任正省級幹部且於2007年時已經歷練同級職務達五年以上」和「2007年時年齡必須低於六十四歲」來評估「十七大」中央政治局的可能人選，其研究結果與實際情況相當吻合。³¹

鄭世平(Shiping Zheng)認為年齡限制已經逐漸成為中共政治菁英退場的重要機制，「十五大」所形成的「七十歲離退劃線」讓高齡且企圖往更高位攀爬的政治菁英，不再具有角逐大位的資格。³²陶儀芬觀察中共「十六大」

³⁰ 寇健文，〈政治繼承與共黨政權結構穩定性的比較研究〉，《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3期，2000年3月，頁60。

³¹ 寇健文，〈權力轉移與「梯隊接班」機制的發展〉，頁66-69；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1978-2004》，頁5-7；寇健文、黃霏芝、潘敏，〈制度化對中共菁英甄補之影響：評估十七大政治局的新人選〉，《東亞研究》，第37卷第2期，2006年7月，頁24-34。

³² Shiping Zheng, "The New Era i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Issues and Studies*, Vol.41.NO.1, March 2005, pp.190-198.

人事交接的演變，她認為「十六大」對歷史的重要性之一為第三代領導人在正式職位上的完全退出(除了當時江澤民仍保有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代表著中國政治繼承往制度化的方向邁進一大步。³³

黎安友認為鄧小平對於中共菁英甄補制度的建立有所貢獻，其中表現在幹部「四化」和「高級幹部退休制」，這使得過去的派系政治開始轉型。此外，他也對菁英甄補制度的建立表示看法，黎氏認為制度化的建立需要強人，但有時又必須要求領袖不能過分強勢，因為過分強勢的領袖有可能會反過來破壞制度(毛澤東即是如此)，而鄧小平卻是適切的扮演了這種角色，未來中共如果沒有出現政治威權過大的領袖，那麼制度化會慢慢建立起來。³⁴

丁望表示中共現階段的權力轉移和選拔接班群，仍僅是處於初級的制度建構階段，於「一黨領導」的體制下，在社會還未邁向真正的法治軌道前，中共黨內難以發展出真正的民主機制，且若以制度建構的四項要素：(一)制度設計的正當性、合理性和民眾的認受性；(二)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避免斷層化；(三)制度約束的平等、公正和消除「一般之外有特殊性」；(四)法律和制度的切實執行，來評估中共選拔菁英制度，現行制度仍是有所殘缺的。³⁵薄智躍(Zhiyue Bo)除了從年齡、任期和知識化，較制度性的規範來探討中共選拔菁英狀況，他也注意到政治菁英的領導經驗，在地方省級單位擁有良好的施政表現，在未來被拔擢的機會將增加不少，同時中央也會將政治菁英派往地方擔任領導，以進行磨練和培養。³⁶

包淳亮認為中共權力繼承的制度仍處於曖昧不明的狀態，因此，中共領導人如何認識、乃至於創造或藉由慣例建構「制度」，將可能會使中國大陸的政治權力繼承方式產生驟變。如果能進一步認識現有制度的選擇空間，以

³³ 陶儀芬，〈「十六大」後大陸的經濟改革與政治繼承〉，《中國大陸研究》，第46卷第2期，2003年3月，頁35。

³⁴ Andrew J. Nathan 著，何大明譯，《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中國政治變遷之路》(*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From Totalitarian Rule to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台北：巨流出版，2007年)，頁51-56。

³⁵ 丁望，〈中共「十七大」與權力景觀—以解構的視角分析政治局強勢競爭者〉，陳德昇主編，《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台北：印刻出版，2008年)，頁127。

³⁶ 薄智躍，〈中共十七屆政治局候選人：從地方精英到權力核心〉，陳德昇主編，《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台北：印刻出版，2008年)，頁135。

及歷史慣例的啟示，不但有助於對中共領導層的研究，也有助於引導中共領導人對權力繼承方式做出的最佳選擇。³⁷

陳德昇表示，儘管中共政治繼承形成梯隊接班態勢，並透過職位任期制與年齡限制，作為幹部甄補依據，致使近年中共新一代的政治繼承呈現年輕化、知識化，以及具備地方諸侯經歷之實權人物較受重用的特色。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儘管中共人事運作制度化、法制化之規範日益嚴謹，但對於遊戲規則之界定、政治忠誠之認知、政治菁英年齡的擢拔標準、權力分派與重組，仍受實權政治領袖的掌控。吾人若表面地認為中共人事運作已全面制度化，恐與現實有所差距。³⁸

楊開煌表示從胡錦濤在「十七大」推行的「民主測評」以擇定接班人來看，這表示胡錦濤在繼任者的培養上是從制度入手，而非從人選入手。這是因為胡不是強人，所以他無法如同鄧小平一樣以指定接班人的方法來繼承共黨的領導，所以他嘗試建立接班制度。另外「十七大」的接班安排也一改過往由一人做接班人的培養，而是改採兩人集體接班，以分工合作的模式進入常委會，在正式接班前，磨練和磨合兩人的默契。這是中共在接班人問題第一次採用「黨內民主」的方式來確定，因此，成敗如何仍待觀察，結果如何也有待評鑑，然而，可以確定的是，採取制度建立的方式將會優於個人指定的方式。³⁹

而董立文則對當前學界大量使用制度化來分析中共政治的情形提出不同的看法，首先，他對制度化的定義提出質疑，他認為不能將不正規的過程重複發生就視為制度化，而是應該從政治理性化、結構分化或系統適應環境能力等面向來討論權力繼承中所產生的規範，他並舉出「十六大」後，江澤民留任中央軍委主席和安排大批自己人馬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以致對繼任者的權力產生掣肘來反駁制度化的情形。⁴⁰

³⁷ 包淳亮，〈當代中共權力繼承的制度限制〉，《東亞季刊》，第33卷第1期，2002年1月，頁36。

³⁸ 陳德昇、陳陸輝，〈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陳德昇主編，《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台北：印刻出版，2008年），頁33。

³⁹ 楊開煌，〈中共「十七大」總觀察〉，《海峽評論》，第204期，2007年12月，頁31。

⁴⁰ 董立文，〈從權利繼承看中共政治發展的非制度化〉，林佳龍主編，《未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

本文在綜合上述學界的見解後發現，年齡限制和任期限制是學者觀察中共菁英甄補是否制度化的基本指標，但是也有學者將之稱為規範或慣例。而關於制度化與否的爭議，主要存於對制度化的定義有所差異，而導致學界間有不一樣的想法，吾人認為以制度化來分析中共政治，最大的貢獻在於讓中共的政治菁英甄補具有可預測性，且從實際運作來看，菁英甄補的過程也的確受制於這些規範的制約。但本文亦不否認，如中共未能將菁英甄補的規則，由上至下的法制化，將使制度化的爭議一直存在。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所謂研究途徑是要說明研究者到底是從哪一層次為出發點、著眼點、入手處來觀察、歸納、分類與分析研究對象，分析的架構會因著眼點的不同，而導致與之相配的概念也會有異。⁴¹基於上述定義，本文認為在研究之前有必要先就本文的研究觀點和要點作一說明，以完善本文的立論基礎。

(一) 派系研究途徑

誠如學者白魯恂所言，中國人習慣以依附權威的方式，透過忠誠和利益的交換，讓自身成為權力關係網路的一環，來獲取官場上的安全感，這在無形之中，促進了「派系政治」的形成。⁴²因此，長期以來，「派系主義」一直是研究者分析中共政治的重要論點。

對中共而言，派別政治直接涉及的是權力之分配，致使派系之間的角力和權力鬥爭時常畫上等號。過去毛、鄧時期，經常以政策和意識形態的分歧為名爆發衝突，實質上是為了掩飾派系之間對於領導權的爭奪。⁴³在恩庇侍

(台北：財團法人台灣智庫，2004年)，頁131，151-152。

⁴¹ 朱宏源主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1999年)，頁182。

⁴² Lucian W. Pye 著，胡祖慶譯，《中國政治的變與常》(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頁26。

⁴³ 王官德，〈中共領導人的權力繼承與鞏固〉，《源遠學報》，第12期，2000年11月，頁78。

從之下，派系領導人透過拔擢跟從者的方式，來擴大和穩固權力基礎，在這時期，派系政治之下的菁英衝突是中共政治變遷主要的動能。⁴⁴儘管中共從不承認「派系」的存在，也不給予其正當性和合法性的地位，但回顧中共的黨史，便可以發現派系屢屢在權力角力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⁴⁵

1980 年代左右，在鄧小平的推行之下，中共逐步發展出一套人事甄補的規範，近年來，學界也逐漸注意到制度性規範的出現對人事安排的影響，並開始以制度性的指標(年齡、任期和經歷等)來分析和預測中共的人事佈局情形，不過這些文章依舊承認非正式制度在人事甄補中仍然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力，⁴⁶因此本文認為，儘管學者之間對於持續以派系為媒介來研究中共內部的菁英衝突和人事更迭有所爭議，但中共內部確實存在著不同的派系，且透過上述文獻的回顧，吾人認為以派系的角度來觀察中共政治，將有助於了解中共權力運作的實際狀況，也可充分解釋非制度性力量在人事甄補中所發揮的影響力。因此，就算中共為了政治局勢的穩定，將盡力維持表面上的和諧，但派系政治依舊會持續下去。⁴⁷

(二) 歷史制度主義研究途徑

本文雖然運用派系主義作為研究途徑，但也注意到過度注重派系的影響力，將會忽略和脫離制度性因素的背景，以致於可能會導致研究有所偏頗。因此，本文也採歷史制度主義做為研究途徑，這是因為歷史制度論者除了強調既有的規則外，也注重非正式規則、程序、規範與不成文的慣例所形成之制度。⁴⁸

依據學者豪爾(Peter Hall)及泰勒(Rosemary Taylor)的觀點，歷史制度主

⁴⁴ Andrew J. Nathan 著，何大明譯，《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中國政治變遷之路》(*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From Totalitarian Rule to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頁 45。

⁴⁵ 朱新民，《1978~1990 年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頁 342。

⁴⁶ 學者寇健文和陳陸輝、陳德昇皆曾以制度性指標來探究中共的人事甄補，不過他們也依舊認為派系力量是不能被忽略的影響力之一。詳見寇健文、黃霽芝、潘敏，〈制度化對中共菁英甄補之影響：評估十七大政治局的新人選〉，頁 24-34；陳陸輝、陳德昇、陳奕伶，〈誰是明日之星？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的政治潛力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55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7。

⁴⁷ Lucian W. Pye 著，胡祖慶譯，《中國政治的變與常》(*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頁 41。

⁴⁸ 蔡相廷，〈歷史制度主義的興起與研究取向—政治學研究途徑的探討〉，《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第 41 卷第 2 期，2010 年 11 月，頁 69。

義具有以下四種特徵：(一) 歷史制度論者傾向於以相對廣泛的意義來界定制度與個體行為之間的相互關係；(二) 強調制度的運作與產生過程中的權力不對稱性；(三) 制度的建立和發展過程中，會依循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t)的軌跡並產生意外的後果；(四) 關注制度分析和能夠產生某種政治後果的其它因素之整合研究。⁴⁹

歷史制度論者藉由比較歷史方法和歷史脈絡作為基礎，並從中檢視變項的因果關係，強調歷史過程、環境和制度結構與行動者的複雜互動，他們認為制度是權力鬥爭之下，經過「計算」，以符合行為者利益的產物。⁵⁰且制度和歷史之間是一種互為因果的關係，因為制度變遷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機制，將使制度在建構的過程之中，受到過去的選擇之約束，即一旦走上某一條路徑，隨著制度對行為者的邊際報酬漸增，改變既有制度的成本也就越高，因此制度會沿襲該方向繼續發展下去，並在這之中得到自我強化，意即出現遵循路徑依賴的現象，讓制度呈現鎖定(lock-in)狀態。⁵¹

過去中共習慣以鬥爭的方式來解決權力分配的問題，不過隨著甄補規範的建立，讓人事上的安排有所依據，因此，本文希冀透過歷史制度論的角度，有效地探究和理解中共人事甄補制度的產生，以及甄補規範的堆積和持續所導致的「制度化」情形，並藉此釐清政治行為者和制度在這過程之中的互動關係，以及各自所扮演的角色。本文期望藉助歷史制度論的觀點，來探索中共菁英甄補規範或制度延續發展的情況，以補足派系主義研究途徑的不足。

學者羅德明曾認為，中共非正式政治和正式政治之間的關係是模糊不清且不斷變化的，⁵²本文認為相同的情形亦可能出現在人事甄補上，因此本文將同時採用派系主義研究途徑和歷史制度主義研究途徑，以整合之方式來兼顧分析非制度性力量和制度層面因素對中共中央政治局人事運作的影響，這

⁴⁹ Peter Hall and Rosemary C.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Vol.44, 1996, pp.938.轉引自薛曉源、陳家剛主編，《全球化與新制度主義》(台北：五南，2007年)，頁196。

⁵⁰ 黃宗昊，〈歷史制度論的方法立場與理論建構〉，《問題與研究》，第49卷第3期，2010年9月，頁148。

⁵¹ 王躍生，《新制度主義》(台北：揚智文化，1997年)，頁80。

⁵² 轉引自朱德米，〈精英互動中的正式與非正式政治〉，《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88期，2005年4月，頁147。

也將有助於研究兩者之間的互動情形。

二、研究方法

事實上，國內外對於中共問題的相關研究，已經到達一定的成果，如果從不同的議題或角度切入，採用的方法自然有所差異。郭華倫教授曾經表示：「凡是科學方法，如吾人慣用之分析法、綜合法、歸納法、演繹法、比較法與歷史法等，都可用作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方法，應視研究主題及資料的多寡，採取不同方法加以研究，或以多種方法從不同角度與觀點作細密周詳的研究，才能得到接近事實的判斷。」⁵³然而上述之方法皆不脫離探究歷史的本質，因此本文採取的研究方法為歷史研究法，並在其框架之下，運用文獻分析法和歸納法。

（一）歷史研究法

關於歷史研究法的定義，學者易君博曾經提出他的看法：「透過歷史解釋的性質、類型以及邏輯，作一系統的分析，期望藉由此一分析，能從個別歷史事實的因果關聯去重建過去。」⁵⁴以歷史研究法來探討中共權力繼承，將獲得相當的幫助。本文開頭將先回顧鄧後時期的歷次權力移轉，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何接班失敗？而江澤民及胡錦濤卻能夠成功接班，以歷史角度來探討和分析中共權力繼承。

（二）文獻分析法

其次，藉由對歷史文獻的分析，透過有系統的蒐集資料，並客觀地評鑑資料，以便對事實做相關性的分析，經由對文獻的探討以確保研究問題的價值性、研究方向的正確性與研究模式的合理性。關於中共權力繼承和菁英甄補問題，前人的學術研究已經給予相當程度的經驗判斷，已為後人的研究立下良好的基礎。因此，本文將運用前人的研究資料，間接地觀察過去所發生

⁵³ 郭華倫，《中共問題研究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76年），頁135-136。

⁵⁴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1984年），頁165。

的歷史事件，透過了解和重建過去的經驗規則，來解釋現在的甄補規範。除此之外，本文在文獻資料的收集上，也將從官方文件、非官方文件、國內外期刊、報章雜誌和網路媒體等，多方面著手，盡可能為研究和分析，奠立足夠的資料基礎。

(三) 歸納法

最後，對資料做歸納和整理。所謂的歸納法是指，先做觀察、蒐集和記錄若干個別情事的工作，在這過程之中，探究其有無共同特徵或特徵之間的關聯性，從而將所得的結果推廣到其他尚未經過觀察的事例，並以此獲得一項通則性的論述。所以，本文也將採用歸納的方法來探討中共權力繼承，將過去的權力繼承和菁英甄補經驗，分析和整理其中的特徵或特徵間的關係，企圖將此經驗推廣到「十七大」的人事佈局，推論出最佳的研究成果。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對於一黨專政且「人治」色彩濃厚的中共而言，建立一套甄補規則有其困難之處。因為，制度建立者必須先拋下以個人權位和利益為優先考量的心態，轉向著重於解決集體利益問題，不單如此，制度建立者還須面對與其他領導人之間的權力分配問題，在制度建立階段，制度建立者必須是具有高度政治權威且在權力逐漸受到制約的情形下，依舊能夠堅持鞏固制度。學者之間，不約而同的認為鄧小平正適切地扮演了制度建立者的角色。⁵⁵

1980年代左右，鄧小平在復出掌權後，有感於幹部嚴重老化以及權力鬥爭而耗損政治菁英的問題，他開始致力於推動幹部退休制度、幹部「四化」政策，至此之後，中共在菁英甄補方面開始有了可以依循的準則，因此，本

⁵⁵ Andrew J.Nathan 著，何大明譯，《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中國政治變遷之路》，頁 51-56；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 6-7。

文在時間上將從 1980 年代開始，先回顧鄧後時期，中共的歷次權力繼承情況，探討鄧小平對政治繼承機制的構想和影響，同時也將探究，在政治老人逐漸凋零之後，歷經「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三屆的人事改組後，政治繼承規則有何變化，以期了解影響中共菁英甄補的非制度與制度性因素，並透過經驗法則，來對「十七大」的權力佈局，作出合理的解釋及觀察中共菁英政治的可能走向。

在內容方面，由於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明列的唯一執政組織，而從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架構和實際運作情況來看，中央政治局是中共的權力核心，因此，本文的焦點將放在中央政治局人員的甄補情形。另外，從中共黨史來看，意識形態不僅是奪取權力的工具，也是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來源，且其也屬於政治繼承的一環，因此本文將無可避免的涉及探究中共自「十四大」以來，意識形態的發展與轉變。

二、研究限制

雖然關於中共權力繼承和菁英甄補的問題，國內外已有相當程度的研究，但是由於政治權力移轉，在共黨國家是屬於相當敏感且機密的問題。縱使中國大陸近幾年來隨著改革開放和西方國家之要求，在資訊的傳遞上已經不再那麼封閉，但在中共權力繼承和菁英甄補尚未完完全全制度化的前提下，在這方面的官方文件或資料，仍是不夠透明，且中共權力接班問題有可能僅是經由少數權力核心成員協商而成，不易被外界所得知，在資訊的供給上，造成了相當的阻礙，也使得在研究上遭遇了限制。

承接著上述的限制，縱使獲取資料，資料的真實性仍是一項不可忽視問題。中共以「意識形態」治國，因此許多境內媒體，在新聞自由上受到了官方強力的干預，甚至充其量只是黨或國家的宣傳機器，因為權力繼承事涉國家機密，在封閉的體系中，所釋放出來的訊息，是否經過刻意篩選，也不免令人有所質疑。此外，除了學術研究，關於中共權力繼承問題，有時也必須倚靠坊間出版品的相關文獻，但是，坊間出版品在陳述消息來源時，習慣使

用「據指稱」、「據消息來源」和「據相關人士表示」..等方式，在消息來源不確實的情況下，容易偏離事實根據。再者，由於坊間一些關於中共研究的資料，有時會遭受價值判斷和意識形態的箝制，而導致無法客觀判斷事實。最後，有些相關文章完全沒有經驗法則，僅僅是憑空臆測，例如，關於中共人事安排，媒體習慣使用「引述相關人士透露」的手法來搶先報導，但最後卻與事實相反。吾人在進行研究時，將盡可能避免陷入這種情形，使研究的限制性降到最低。

第五節 研究架構

首先，本文在架構上除了先對研究動機與目的提出說明外，也將透過對相關文獻的探討來擇定本文的研究途徑與方法，並以此界定研究範圍，和說明可能遭遇的限制。而第二章一開始將先對鄧後時期的幾次權力繼承進行分析，釐清胡耀邦和趙紫陽接班失敗的原因，並探討同樣由鄧小平主導接班的江澤民和胡錦濤為何能夠避免重蹈上述兩人接班失敗的覆轍，以此出發點探究鄧小平對中共政治繼承的規畫和影響，並分析接班過程所累積下來的經驗和模式，以便了解中共權力繼承的變與不變。此外，也將同時探討中國共產黨的中央組織結構，以便了解中共黨中央的權力運作狀況，分析政治局為何是中共的權力核心。

在經過上述的初步分析後，提出可能影響中共菁英政治的因素，了解中共甄補菁英時的相關規範，分析出可能左右人事甄補的相關因素，其中包括制度性與非制度性的制約。在綜合上述的研究成果後，運用經驗法則來研析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在時代變遷和人事更迭中，爬梳和分析影響鄧後歷屆政治局人事甄補的因素，希冀透過對歷史的考究，探討中共權力接班的演變，以企圖為「十七大」的人事佈局作出最合理的解釋，並分析和理解「十七大」時，中共權力核心菁英甄補的特徵和用意，探究中共接班安排之模式是否出現變化。

最後，在統整匯合之後，將列舉出研究之後的發現和成果，提出具體的事例來驗證和返視本文最初所提出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同時也將在此基礎之上，分析和評估中共菁英政治的未來走向(圖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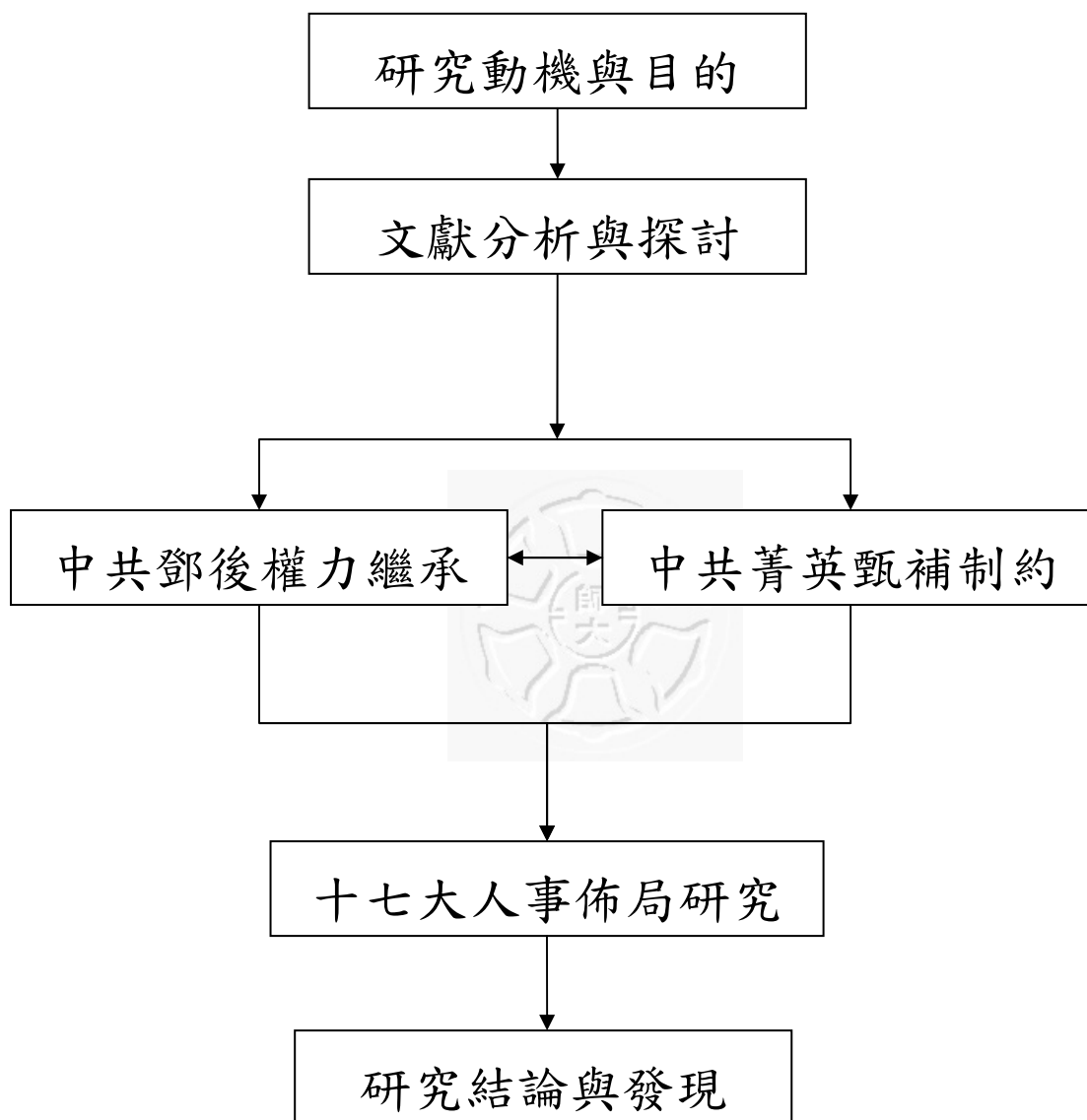


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第二章 鄧後中共權力結構與菁英甄補

由於中共權力繼承機制的不透明性，反而使得人們更關心權力繼承的運作和發展。首先，胡耀邦、趙紫陽、江澤民和胡錦濤都是鄧小平欽定的接班人，不可否認的，他們的權力來源基礎都是建立在鄧小平的政治權威上，是怎樣的原因使得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權力繼承結果有別於江澤民和胡錦濤，而江澤民和胡錦濤在鄧小平過世之後，在失去權力支柱的情形下，透過哪些作為來鞏固權力；其次，中國共產黨五年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吾人關心的焦點總是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事安排上，尤其是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第二節將從中國共產黨的中央組織結構來分析政治局為什麼成為中共權力的核心；最後，中共的菁英甄補不若民主國家具備一套完善且經法定程序認可的制度，所以影響菁英甄補有哪些主要因素，這些都是本章要探討的重點。



第一節 鄧後中共政治繼承

一、胡耀邦之政治繼承

胡耀邦 1915 年生於湖南省瀏陽縣的貧農家庭，1930 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以下簡稱共青團），⁵⁶1933 年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自此開始在黨政方面累積豐富的資歷，而論及胡耀邦之政治歷程，就不得忽視其和政治強人鄧小平之間的關係。除了早先工作經驗所累積的情感外，⁵⁷文化大革命

⁵⁶ 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原名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是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先進青年群眾組織，作為廣大青年實踐和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單位，是中國共產黨的助手和後備軍；其基本任務包括：貫徹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為國家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和有紀律的青年建設人才，為黨輸送新鮮血液，以協助加快建設小康社會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

⁵⁷ 國共內戰時期，鄧小平任中共「西南區」第一書記兼西南軍政委，胡耀邦在其之下任「川北行政公署」主任，兩人有業務往來之工作關係。1952 年時期，兩人皆上調北京，1956 年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時常向鄧小平匯報其擔任「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書記之工作業務。1956 年期間，鄧小平為了培養胡耀邦進入中央書記處，將其調往西安兼任中共「西北局」第二書記並代理陝西省第一書記，藉以讓胡耀邦獲取和磨練地方工作經驗。詳見李奎泰，〈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崛起和下台的比較研究〉，《共黨問題研究》，第 18 卷第 1 期，1992 年 1 月，頁 10。

命時期，兩人皆受到批鬥與打壓，被冠上「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之名號。而一般認為胡耀邦獲得鄧小平的賞識與其工作任內的兩大功績有著絕對之關係：

(一) 推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1977年，中國共產黨陷入理論之爭，由華國鋒所提出的「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的遵循」之「兩個凡是」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彼此對壘。早在先前，鄧小平就對「兩個凡是」提出批判，鄧小平認為應該「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對毛澤東思想要有完整而準確的認識，且須善於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來指導各項工作，才不至於歪曲和損害毛澤東思想。⁵⁸1978年，胡耀邦審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理論動態》第60期發表，之後包括《光明日報》、《人民日報》和《解放軍日報》皆有轉載，此文一出，隨即帶來很大的紛爭，雖然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對此文提出強烈之批判，但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鄧小平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鄧小平對甘冒反黨風險的胡耀邦自然另眼相看。⁵⁹

(二) 致力於平反「冤、假、錯」案：文化大革命時期，許多知識份子和共黨幹部皆因受到無止盡的批判和鬥爭，而造成許許多多的冤案。1977年，胡耀邦兼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時，開始致力於平反的工作。胡耀邦提出「兩個不管」之要求：「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的改正過來，包括毛主席批的，都照樣平反。」⁶⁰此一作為成功的解放了過去被批鬥的右派老幹部，老幹部因而對胡氏充滿感謝之意，這也讓胡耀邦因此深受黨內外的信任。

一般認為胡耀邦權力繼承失敗的原因是歸於處理學運事件不當與放任資產階級自由化有關。1986年，學生發起民主運動，事件發生後開始蔓延

⁵⁸ 鄧小平，〈兩個凡事不符合馬克思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9。

⁵⁹ 胡績偉，《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香港：明鏡出版社，1997年)，頁307。

⁶⁰ 阮銘，《鄧小平帝國》(台北：時報文化，1992年)，頁37。

上海、南京、和北京等地。鄧小平曾在中國共產黨十二屆六中全會中表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現在年輕群眾中，有一股自由化的思潮，這股思潮會將我們帶往資本主義的道路上，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化和我們現行的政策和制度有所對抗，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⁶¹因此在該屆六中全會討論《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時，主張擱置「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爭議的胡耀邦成了眾矢之的，受到當時反對派鄧力群、胡喬木、彭真和薄一波等的圍剿。1987年1月，胡耀邦辭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職(以下簡稱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同年會見辛巴威總理穆加貝時表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不力，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誤」，自此「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不力成了胡耀邦下台的表面原因。

然而實際上真正導致胡耀邦下台的主要因素為失去鄧小平的信任與得罪當權的老幹部。鄧小平曾要求胡耀邦開除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王若望和方勵之的黨籍，但胡耀邦卻未完全遵照處理，鄧小平認為胡耀邦不聽從其指示，開始不聽他的話了。十二屆六中全會後，鄧小平曾找胡耀邦進行個別談話，鄧小平說：「我全下，辭去一切職務和軍委主席。你半下，接軍委主席，把總書記讓給年輕人當。趙紫陽也半下，當國家主席，把總理讓給年輕人當，這可帶動一批老人退下來並有利於幹部的年輕化」。對於反對個人崇拜和獨裁及有心於政治革新的胡耀邦自然表示贊同，無論鄧小平是真心誠意或是假意試探，胡耀邦以外的保守派勢力，包括王震、鄧力群和胡喬木等人，為了保障自身的權力與地位皆大表反對之意，並藉此將胡耀邦打為不忠的罪人。⁶²因為，胡耀邦曾有意在中共「十三大」時，更進一步落實幹部年輕化，計畫規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委員)年滿60者須退休，政治局委員年滿72者須退休，如此一來，大批的革命元老皆在退休之列，使得老幹部們深感不滿。⁶³此外，胡耀邦當時並未擔任任何軍職，軍委主席一職

⁶¹ 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談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81-182。

⁶² 阮銘，《鄧小平帝國》，頁186-188。

⁶³ 韓文甫，《鄧小平傳—治國篇》(台北：時報出版，1993年)，頁714。

仍是由鄧小平把持，因此，學運發生時，胡耀邦缺乏軍方的支持，最終在保守派的權力運作之下被迫辭職下台。

二、趙紫陽之政治繼承

趙紫陽 1919 年在河南省滑縣出生，自幼因受到革命環境的感染，和胡耀邦一樣，曾經加入共青團，在 1938 年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趙紫陽在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前，一樣擁有豐富的行政資歷。⁶⁴胡耀邦辭職下台後，由趙紫陽代理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首先他必須面對由胡耀邦所遺留下「反對資產自由化」的棘手問題，趙紫陽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提出兩個基本點來因應：（一）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二）堅持改革、開放、搞活的方針。以防止反對資產自由化的鬥爭擴大，限制傾左的勢力藉反自由化來反改革開放和反對思想僵化。並且針對原先高舉「反對資產自由化」為首的鄧力群所起草之中央四號文件，也就是〈中共中央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一文中，主張將反自由化思潮擴展到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城鄉生活等一切領域之情勢提出對策。趙紫陽命鮑彤起草一份與鄧力群針鋒相對的四號文件，強調四點原則：（一）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長期的，主要是進行教育，學好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的論著；（二）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範圍嚴格限制在黨內；（三）絕不允許因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妨礙改革、開放、搞活政策的執行；（四）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要講究質量，切勿沿用文革時期不恰當的用語。在趙紫陽的主動反擊與鄧小平的支持下，最終成功暫時壓制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全面性的擴張與鬥爭。

65

趙紫陽在 1987 年 11 月的十三屆一中全會正式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而鄧小平為了協助趙紫陽鞏固權力也有些實際上的作為。首先，清除如陳

⁶⁴ 趙紫陽加入共產黨後，便在河南地區當任黨務工作，開始累積長期的地方工作經驗，1977 年，鄧小平提拔趙紫陽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79 年成為正式委員，1980 年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年先後任國務院副總理、任國務院總理。1981 年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⁶⁵ 阮銘，《鄧小平帝國》，頁 203-206。

雲、李先念和彭真等的老幹部，至於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中的重要人物如鄧力群和胡喬木等人，未來勢必成為改革的阻力，為避免此一情況發生，鄧小平安排這些人退出中央委員會，並補進不少年紀較輕的改革派人士。⁶⁶其次，鄧小平為了避免趙紫陽重蹈胡耀邦的覆轍，安排其先後接任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共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和國家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之職務，但是鄧小平仍舊掌握中共中央軍委和國家軍委主席一職。上有鄧小平，下有老軍頭軍委的常務副主席楊尚昆，因此，趙紫陽並未因為擔任軍委副主席之職務，而獲得軍方的支持。趙紫陽無從插手軍方事務，軍委副主席從頭至尾都只是虛銜，無法獲得真正軍權，後來這也成為趙紫陽被罷黜的原因之一。

身處於權力鬥爭的年代，稍有不測，隨即風雲變色。1988年趙紫陽施行物價改革政策，在群眾的預期心理下，發生搶購商品、用實物來保值、銀行擠兌存款和市場緊張的現象，也動搖了原先支持物價改革的鄧小平之決心，因而在市場的壓力與鄧小平對物價改革的怯退下，趙紫陽決定暫緩物價改革，將重心轉往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物價改革宣告失敗，此時，共產黨內也開始刮起反對改革與「倒趙」的風潮。⁶⁷

趙紫陽被整肅的重要遠因還包括成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新敵人。中共在實行改革開放和搞活政策下，不免將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潮帶進中國大陸，讓知識分子得到一個對中共的社會主義政經制度與西方民主自由的政治經濟制度比較分析和再認識的機會。中共教條式僵化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措施，當然無法克服自由思潮的擴散，趙紫陽站在第一線，自然首當其衝成為代罪羔羊。⁶⁸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臟病去世，為悼念胡氏所引起的學生運動事件，迅速累積人潮，趙紫陽在處理學運的態度上，和黨內保守派大老及鄧小平出現了嚴重的分歧。趙紫陽在其《國家的囚徒》一書中，表示當時他

⁶⁶ 吳宜純，《中共領導人「指定接班」問題之研究》(花蓮：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73。

⁶⁷ 同前註，頁75-76。

⁶⁸ 李久義，〈從權力結構談趙紫陽被整肅因果及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15卷第8期，1989年8月，頁5。

認為八九學運是一場愛國運動，應該以勸阻的方式、採取疏導方針並和學生進行對話，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同年4月24日，李鵬、李錫銘和陳希同在政治局常委會將學潮定性為「有組織、有計畫、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並做成會議記錄，4月25日李鵬和楊尚昆把常委會的情況向鄧小平報告，鄧小平同意政治局常委會的定調，認為學潮影響穩定，應採取強硬的手段，迅速解決這場政治動亂。⁶⁹而趙紫陽在同年5月4日會見亞洲銀行代表時，仍舊強調需在冷靜和理智的氣氛中，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5月16日，趙紫陽會見來華訪問的戈巴契夫時曾表示：「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重大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通報和請教，重要問題仍需鄧小平的掌舵。」⁷⁰此話一出，使得鄧小平遭受「垂簾聽政」等政治性的批判，鄧氏認為趙紫陽是有意暗示其必須為現今的學運事件負責，再再都增添了鄧小平對趙紫陽的不信感。最終，學運事件在鄧小平的強硬態度下，由李鵬宣布北京部分地區戒嚴，八九學運演變成血腥武力鎮壓的「六四事件」。

1989年6月下旬所舉行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會議通過由李鵬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指控趙紫陽的三大罪狀，包括：（一）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二）趙紫陽在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期間，雖然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工作方面做了一切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導思想上和實際工作中也有明顯失誤；（三）趙紫陽在主持中央工作以來，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⁷¹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嚴重忽視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給黨的

⁶⁹ 趙紫陽，《國家的囚徒》（台北：時報文化，2009年），頁43-44。

⁷⁰ 張良，《中國「六四」真相》（上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年），頁424。

⁷¹ 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為解決黨內和社會上思想僵化及混亂的情形，在1979年3月30日召開的理論工作會議上所提出的談話，內容為：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必須堅持馬列主義及毛澤東思想。

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⁷²會議過後，趙紫陽被免除一切職務，並遭到軟禁的對待。

三、江澤民之權力繼承

江澤民 1926 年生於江蘇省都江縣內。自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畢業後，開始擔任技術官僚等職務，1982 年被選為中央委員，1985 年江澤民調任為上海市長，1986 年出任上海市委書記，1987 年的十三屆一中全會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989 年的「六四事件」後，原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趙紫陽被免去一切職務，使得鄧小平原先規劃的接班人部署再次受到嚴重的衝擊，改革派的趙紫陽和胡啟立皆被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芮杏文和閻明復離開中共中央書記處，使得改革勢力受到重挫。⁷³鄧小平未免保守派勢力趁機大舉奪權，在派系平衡的考量之下，決定接受陳雲、李先念和彭真等人提議，由江澤民接任總書記一職。

關於江澤民的出線，有學者從鄧小平的觀點來看，認為可歸於七點因素：（一）江澤民獲得中共元老李先念和陳丕顯的支持，且陳雲及彭真等人也未表示反對之意；（二）鄧小平認為江澤民會持續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也是能夠讓群眾感到耳目一新的改革派人選；（三）鄧小平認為江澤民在政治上廉潔，能夠取信於民及負擔反貪腐之任務；（四）鄧小平認為江澤民在政治上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且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五）江澤民的學識、眼界與胸襟足以勝任；（六）江澤民在中共黨中央沒有派系班子，對鄧小平而言，比較容易控制；（七）將江澤民拔擢至中央，有平衡中央與地方權力架構之考量。⁷⁴再加上，江澤民主政上海期間，推動經濟改革有成，對 1986 年所發生的上海學運處理得當，另外，鄧小平認為江澤民可以寬大處理趙紫

⁷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頁 544。

⁷³ 姜孟伶，《鄧小平時期中共政治繼承之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年），頁 76。

⁷⁴ 楊中美，《江澤民傳》（台北：時報文化，2000 年），頁 254-256。

陽的問題，避免保守派挾怨報復。⁷⁵1989年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江澤民正式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職。

由於江澤民的急速竄升，使得其在接任總書記初期，權力並不穩固，領導地位與基礎非常薄弱，在當時甚至被認為只是過渡性的政治人物。江澤民初期的權力鞏固必須倚靠鄧小平的協助。由於胡耀邦和趙紫陽在接班過程中的中箭落馬，使得鄧小平對接班問題產生緊迫感，在選定江澤民繼任後，對部分高層領導人發表談話時，強調每一代領導集體均要有一個核心，而第三代核心即是江澤民。⁷⁶再者，鄧小平鑑於自身年事已高，以及為了擺脫「六四」軍事鎮壓和淡化「槍指揮黨」的陰影，和讓接班人擁有足夠扮演核心的權力，以避免重蹈1987年和1989年的權力鬥爭，於是，1989年9月鄧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表明將辭去軍委主席職務，稍後同年11月召開的十三屆五中全會後，改選由江澤民接任。⁷⁷鄧小平向上百名軍中元老說：「江澤民是一位合格的總書記、合格的軍委主席」，奠定了江澤民接班的基礎。

⁷⁸

1989年的「六四事件」後，鄧小平雖對重大問題仍有決定權，但他的威權已經受損。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勢力，趁勢活耀，掌握組織、宣傳大權並鼓吹「反和平演變論」，⁷⁹且質疑鄧小平的經濟改革路線是姓「資」還是姓「社」，使得改革派在整頓治理經濟上受到很大的牽制。在此情況下，希冀搞左右平衡以維持地位的江澤民，在論及改革開放時，也談反和平演變，偏往保守派勢力，使得鄧小平對江澤民未能大力推動改革開放深表不滿。

⁸⁰1992年1月，鄧小平南巡時，針對保守勢力的批評發表談話，他表示：「關

⁷⁵ 張鎮邦，〈鄧小平怎樣安排江澤民接班〉，《中共研究》，第23卷第10期，1989年10月，頁27。

⁷⁶ 鄧小平，〈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10。

⁷⁷ 楊中美，《江澤民傳》，頁267。

⁷⁸ 宗海仁，《第四代》（香港：明鏡出版社，2002年），頁525。

⁷⁹ 1990年代，中共認為西方社會不斷透過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極力宣傳和推銷西方經濟模式、政治體制、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念，其結果就是導致「蘇、東、波」的陸續瓦解，「和平演變」共產體制，對此，中共呼籲黨員幹部要築起「反和平演變」鋼鐵長城，中共也認為「和平演變」與「反和平演變」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國際上的鬥爭，中共內部要做好準備，統一思想戰線，確實執行「反和平演變」的工作。詳見王官德、劉承宗、李化成，《中國共產黨史》（台北：五南，2003年），頁572-573。

⁸⁰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136-137。

於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⁸¹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和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⁸²且在共軍高階將領楊尚昆和楊白冰所負責之中共解放軍總政治部的「保駕護航」下，使得保守派受到很大的壓力，這無疑是對江澤民政治權力的挑戰，使得江澤民陷入了政治危機。

在鄧小平發表南巡談話後，江澤民了解其內容顯然是對其主政的批評，明白自己是犯了「靠向」的方向性錯誤，隨後按照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意旨，在中共中央黨校做了擁護性的講話，並將南巡談話的內容，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達全國縣團級，表示鄧小平南巡談話內容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各級黨政軍組織應予以貫徹落實。江澤民快速轉向緊跟的對應，紓解了鄧小平先前的不滿，加上鄧小平年事已高，已無再立新人之力，之後仍繼續採取維護江澤民為領導核心的立場。⁸³1992年10月，由鄧小平所主導的「十四大」，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解決共產黨內對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

此外，「十四大」對幹部制度有重大變革，為顧及幹部離休和退休制度的建立，且在完成階段性任務的情形下，決定廢除由政治老人盤據的中央顧問委員會(簡稱中顧委)。「中顧委」自成立以來，由於組成分子均是老一輩的革命家，以陳雲為首的「中顧委」，對共產黨的權力運作構成干擾，成為改革開放的最大阻力，「中顧委」的廢除排除了政治老人干政的機會。⁸⁴另一方面，以楊尚昆和楊白冰為首的「楊家將」勢力也在「十四大」後，被大幅削弱。是以「六四事件」之後楊白冰升任軍委秘書長，掌握軍中人事大權，

⁸¹ 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係指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

⁸²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70-372。

⁸³ 楊中美，〈江澤民傳〉，頁272-273。

⁸⁴ 王玲玲，〈中共「十四大」人事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36卷第1期，1993年1月，頁24。

逐漸拓展勢力，「楊家將」在軍隊內已經結成幫派，違反「黨指揮槍」之原則，加上傳聞楊白冰在 1992 年 8 月下旬，鄧小平病危消息傳出之際，私下召集高級將領 40 餘人，論及鄧小平百年之後，如何因應政局變化與人事調整。⁸⁵鄧小平未免軍隊捲入路線鬥爭，出現軍事強人進而威脅政權穩定，決定剷除「楊家將」在軍中的勢力，「十四大」後，楊白冰被解除軍委秘書長、總政治部主任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三項職務，僅留政治局委員一職，楊尚昆從政治局委員和軍委第一副主席退下，其國家主席一職，也在 1993 年 3 月的「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由江澤民取代。⁸⁶此時的江澤民，已經是總書記、軍委主席和國家主席「三位一體」的政治領袖。

「十四大」後，鄧小平的親信劉華清和張震出任軍委副主席，用以輔佐江澤民處理軍中事務。以降級和調任的方式，肅清「楊家將」勢力；對軍隊宣傳和強調「黨指揮槍」的原則與重要性；透過封將晉爵，鞏固「黨指揮槍」的領導權威；修改《軍官軍銜條例》，新條文界定軍委主席為最高軍事統帥，採首長制；加強第二武裝力量，透過中共武警部隊的建設，制約軍隊；提高軍隊將士待遇，用以穩定軍心；走訪省市地方軍區，了解軍務軍情；提高軍事預算，用以滿足軍事和國力要求。⁸⁷江澤民以統一思想理念的方式，強調「講政治」的重要性，要求軍隊和各級單位，在政治方向、立場、觀點和紀律等，必須和中央保持一致，堅持原則，以免迷失方向。江澤民透過上述多項實務作為，用以加強和穩固其在軍中的權力。

「上海幫」勢力的形成，是江澤民鞏固權力不可或缺的一塊拼圖。1989 年 6 月，江澤民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便安排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的曾慶紅擔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1993 年升任辦公廳主任。在此時期，江澤民也將前上海警備區司令巴忠倓少將由上海調至北京，出任武警部隊司令員，軍銜提升為中將；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一職，由原本的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龔心瀚接任；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副總編輯兼黨委書記周瑞金，

⁸⁵ 康橋，〈對中共「十四大」中共領導人事調整之分析〉，《中共研究》，第 26 卷第 11 期，1992 年 11 月，頁 30。

⁸⁶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 142-143。

⁸⁷ 楊中美，〈江澤民傳〉，頁 275-282。

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主任劉吉，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因受到鄧小平賞識其處理經濟事務的能力，由上海上調入京，雖傳聞朱鎔基在上海時和江澤民相處並不融洽，但由於彼此各有所求，因而結盟。在工作方面配合良好。十四屆四中全會，增選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黃菊為政治局委員，並增補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和山東省委書記姜春雲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兩人並於1995年出任國務院副總理。⁸⁸此時，江澤民所培植的「上海幫」人馬，已經在黨政方面擔任多項要職。

由於經濟快速發展的結果，導致了黨政幹部貪污腐敗盛行，對此民眾積怨已久，江澤民順勢藉「打貪反腐」來整肅異己。江澤民藉由陳希同貪汙案和周北方及王寶森經濟犯罪案，削弱「北京幫」勢力，⁸⁹除了樹立反貪的良好形象和個人權威外，更重要的是整肅黨內異己和打擊地方主義對其權力的挑戰。

從政治繼承循環之觀點來看，政治繼承包括「人事安排」、「制度調整」和「理論繼承與更新」等三面向。理論繼承是路線或意識形態的延續，政治繼承最後一環即為重建意識形態。⁹⁰江澤民在2000年2月，首次提出「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代表著中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三個代表」，⁹¹稍後再度強調「三個代表」思想是「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和力量之源」。

⁸⁸ 郭瑞華，〈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評析〉，《共黨問題研究》，第20卷第11期，1994年11月，頁14-15。

⁸⁹ 中共自建政以來，由於「用人唯私」，以人際關係為主的權力關係網路隨之成形。陳希同在北京的經歷逾四十年之久，任市委書記長達十年，北京市重要黨政幹部，幾乎都是由其提拔，因而使「北京幫」的勢力漸壯大。陳希同多次對外發表挑戰江澤民權威的言論，成了江澤民的頭號政敵，遭到整肅。詳見唐明輝，〈現階段江澤民權力穩固性芻探〉，《共黨問題研究》，1999年3月，頁21。

⁹⁰ 王嘉州，〈論「三個代表」與政治繼承〉，《中國事務》，第10期，2002年10月，頁22。

⁹¹ 在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後，中共黨內開始爭論著是否將因此轉型為全民黨和可否讓私營企業入黨等問題，對此，中共左派人士透過旗下刊物對「三個代表」大肆批判，其中包括前中央宣傳部長鄧力群，強烈質疑讓私營企業入黨，將使他們成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言人，最終導致黨的分裂。面對此一形勢，江澤民則是夠過加強宣傳學習力度和嚴控媒體以擁護以江為核心的黨中央權威，強調論述是經由黨內民主集中制原則，聽取多方意見而成，非個人專斷獨行，並從理論上來回應左派批判言論，論證讓私營企業入黨有其必要性。最後成功避免陷入姓「社」還是姓「資」的路線之爭，紛爭也未再擴大。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全球化和資訊化的加速，國家競爭日趨激烈，中共認為在面臨機遇和挑戰時，黨的建設是繼續推進現代化的關鍵；貧富不均、幹部腐敗和經濟上的私有化，對黨和國家繼續領導前進，形成考驗；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瓦解和蘇聯解體，對馬克思主義的實行產生挑戰，官僚主義和貪汙腐敗日趨嚴重，不利於黨的形象和政權鞏固。⁹²在多項的背景因素下，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以新思路、新作法和加強自身建設來面對挑戰，用以解決「十五大」以來要「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除了可以強化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地位外，對江澤民而言，更可確立其歷史地位。之後的「十六大」，將「三個代表」納入黨章。

四、胡錦濤之政治繼承

胡錦濤 1942 年 12 月出生於江蘇省泰州，祖籍為安徽省績溪縣，在 1964 年 4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自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畢業，曾任該校學生幹部之政治輔導員，畢業後擔任該校水利工程系科研助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曾經受到批鬥，1968 年在國務院水電部劉家峽工程局房建隊勞動工作，1969 年至 1974 年間，在水電部第四工程局八一三分局擔任技術員、秘書和機關黨總支副書記等職。在甘肅省的工作期間受到賞識，1974 年被提拔為甘肅省建設委員會秘書，隨後不久升任甘肅省建設委員會設計管理員處副處長，1980 年因工作認真，在當時鄧小平大力倡導積極培養青年幹部以解決接班問題的背景之下，被時任甘肅省省委第一書記的宋平破格拔擢為甘肅省建設委員會副主任；1982 年出任共青團甘肅省委書記一職；1982 年 9 月初次在中共中央嶄露頭角，被推舉為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當時的胡錦濤僅 39 歲，是中央委員會裡最年輕的成員，⁹³同年 12 月出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1984 年 12 月，在王兆國出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後，接替其擔任共

⁹² 吳仁傑，〈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意涵和未來發展〉，《中共研究》，第 35 卷第 11 期，2001 年 11 月，頁 29。

⁹³ 蔡學儀，〈解析中共新領導人胡錦濤〉，《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6 期，2003 年 6 月，頁 95。

青團第一書記一職；1985年7月調任貴州省，擔任貴州省委書記和貴州軍區黨委第一書記，同年9月胡錦濤被增選為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

胡錦濤在貴州的主政期間，致力於改善貴州貧窮問題，不同於一般政治人物僅做表面功夫，而是以務實的精神，深入了解地方民情，經過研究和調查之後，提出多方面的改革措施，實行成效雖無法完全擺脫貴州貧窮的悲情，但其施政風格已頗獲貴州百姓的好評。1978年至1988年間，中共中央長期面臨棘手的西藏問題，經過一連串的风波後，1988年10月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討論之後，決定由胡錦濤在同年12月出任西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和西藏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成為第一位文官出任駐藏大臣。1989年1月，十世班禪圓寂而去，藏民長期積壓的不滿情緒，終於爆發，西藏軍民對峙情勢激烈，胡錦濤在中共中央下令後，配合武裝鎮壓，造成死傷慘重，藏民的反抗活動也受到相當程度的壓制，此後在胡錦濤的「一手抓反分裂鬥爭，一手抓經濟建設」兩手論下，西藏情勢逐漸穩定，獲得了鄧小平及中共中央領導階層的高度肯定。⁹⁴

在政治恩人宋平的大力推薦下，加上鄧小平有意培養青年幹部，以解決未來接班問題，又鄧小平之女婿張宏為胡錦濤舊識，在言談之間對胡錦濤多所肯定，使得鄧小平留下深刻印象，在鄧小平了解胡錦濤的檔案之料後，堅定其栽培胡錦濤為第四代接班人的決心。⁹⁵因此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和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1993年9月接替喬石出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1997年中共「十五大」，續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由第7躍升至第5；1998年3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副主席；1999年任中共軍事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委員會副主席；2002年11月的「十六大」被選任為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至2012年11月才卸任；2003年3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至今；2004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至2012年11月；2005年3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委員會主席至今。

⁹⁴ 楊中美，《中共新領袖：胡錦濤》（台北：時報文化，2002年），頁164。

⁹⁵ 同上註，頁174。

胡錦濤有著鄧小平欽點接班的身分，在 1998 年 2 月的十五屆二中全會，江澤民也曾明確指出，胡錦濤就是中共第四代集體領導的核心，江澤民表示：「胡錦濤同志五年來的表現，證明我們選擇是正確的，其出任國家副主席一職，目的是使他在外交事務得到鍛鍊，至使其政治上能更成熟，接班問題遲早要解決，遲解決不如早解決好。」⁹⁶ 1999 年 9 月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後，胡錦濤接任中共中央軍委會副主席一職，更加確立其「儲君」的身分，從胡錦濤的職務更迭來看，已逐漸進入權力核心的安排，希冀接班過程能夠順利完成。但是，到了 2002 年 11 月召開的「十六大」前夕，世人開始出現江澤民是否會完全退位的疑問，對胡錦濤能否順利接班也開始有所質疑。江澤民在軍中和地方要員的支持者，在「十六大」前夕，發起「第四代領導集體無法應付和解決不斷產生的經濟問題及外交挑戰」、「為顧及政權穩定和維持安定的社會發展，應該讓江澤民繼續擔任黨的最高領導人」等有利於江澤民留任的輿論。⁹⁷ 這無疑使得江澤民成為胡錦濤是否能夠順利接班的一大障礙，後來隨著政治情勢的不允許⁹⁸，江澤民在「十六大」後交出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職務，但卻保留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一職，對「黨指揮槍」之原則發生矛盾問題，自此開啟後江澤民時代的過渡時期，江澤民也企圖繼續發揮影響力，為胡錦濤在初期的權力鞏固帶來了無比的挑戰。

江澤民在卸下總書記職務後，其政治權力和影響力的基礎來源分別是人脈網絡及「三個代表」的意識形態詮釋權。⁹⁹ 屬於中共權力核心的政治局常委會，在「十六大」的人事安排，將人數由 7 人變為 9 人，分別為胡錦濤、

⁹⁶ 龍飛，〈對江澤民欽定胡錦濤為「接班人」之探討〉，《中共研究》，第 33 卷第 11 期，1999 年 11 月，頁 16。

⁹⁷ 蔡學儀，〈解析中共新領導人胡錦濤〉，頁 97。

⁹⁸ 江澤民接班初期，權力來源完全倚靠鄧小平的支持，而胡錦濤又是鄧小平身前欽點的第四代接班人選，加上包括宋平、萬里和喬石等黨內元老都明確反對江澤民繼續留任，江澤民在「十五大」時定下七十歲劃線規定以逼對喬石，並承諾只再任一屆，使得已七十六歲的江澤民，在考量政權穩定和個人聲譽的提前下，僅保留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一職。韋伯提出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包括傳統式、領袖魅力式和合理式三種，中共政權合法性來源的說法，雖與韋伯提出的典範有些許差異，但江澤民既無政治強人如毛澤東或鄧小平具有絕對的領袖魅力，又不符合傳統權力繼承方是，更無合理性基礎，再者，中共當前的權力合法性，有很大的部分來自改革的形象，江澤民繼續掌權的合法性將受到強烈的質疑。詳見包淳亮，〈江澤民在「十六大」全面退休的可能與挑戰〉，《共黨問題研究》，第 26 卷第 10 期，2000 年 10 月，頁 91-92。

⁹⁹ 寇健文，〈中國政治情勢：高層政局的演變〉，丁樹範主編，《中國大趨勢 2003-2004》(台北：新新聞文化，2004 年)，頁 18。

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和羅幹，其中大多數屬於江澤民的人馬，而人數的增加容易形成已派系為主的權力鬥爭，更顯現出在「十六大」後江澤民的影響力之大，不容小覷，致使胡錦濤在權力不穩固的時期，只能依循江澤民所延續下來的政策和政治路線，多次在會議中表示，必須牢記江澤民同志的囑託，學習貫徹江澤民同志的報告，持續過去接班前對江澤民的低姿態，採取「尊江」的立場，來度過此弱勢領導時期。

胡錦濤初期先透過「建立民間聲望」和「加強人事安排的影響力」兩種方式來鞏固權力，提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的「三個為民」來爭取中下階層人民的好感，建立親民愛民的形象，表示將致力於消除社會貧富不均和發展不均的情形，更隱含了自身的權力繼承是承襲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而來，具有正統性。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肆虐期間，多次探訪重災區，危機過程中，贏得民心 and 肯定，形象塑造工程成效顯著。¹⁰⁰此外，中共貪腐問題嚴重，對於反腐敗的重要性，胡錦濤認為乃「關於人心向背和黨的生死存亡，是黨必須始終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務」，2006年，由於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陳良宇因涉入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違規使用社保基金一案，為一些不法企業謀取利益，袒護有嚴重違紀的身邊工作人員，並且利用職務之便為親屬牟取不正當的利益，造成惡劣的政治影響，基於上述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決議免去其上海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並停止其擔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職務，此舉對於胡錦濤而言是雙面得利，一方面可對人民宣示出其反腐敗的堅強決心和鮮明態度；另一方面，由於陳良宇屬於上海幫勢力，如同江澤民查處陳希同貪汙案一樣，可達到整肅政敵的效果，同時藉反貪腐大旗，來牽制江澤民在省級領導幹部的勢力。而在中共歷次權力繼承和鞏固的過程中，排除異己是實屬必然之情況(表2-1)。

¹⁰⁰ 寇健文，〈中國政治情勢：高層政局的演變〉，頁16-21。

表 2-1 中共政治繼承和整肅異己變遷表

| 項目 | 選項 | 毛澤東 | 鄧小平 | 江澤民 | 胡錦濤 |
|-------------|----------------|--------------------------------------|--|-------------------|----------------------|
| 領袖條件與基礎 | 革命功績 | 具備 | 具備 | 不存在 | 不存在 |
| | 政治魅力 | 強 | 強 | 明顯弱化 | 明顯弱化 |
| | 政治權威 | 強 | 強 | 須鞏固，不容挑釁 | 須鞏固，不容挑釁 |
| 整肅政治異己或同僚方是 | 鬥爭 | ● | ● | ● | ● |
| | 解職 | ● | ● | ● | ● |
| | 殺害 | ● | | | |
| 整肅名義 | 路線與權力鬥爭 | ● | | | |
| | 政策執行不力 | | ● | | |
| | 腐敗違紀 | | | ● | ● |
| 對象 | 代表人物 (當時職務) | 1. 劉少奇 (國家主席) 2. 林彪 (中央副主席) | 1. 胡耀邦 (中共總書記) 2. 趙紫陽 (中共總書記) | 陳希同 (北京市委書記) | 陳良宇 (上海市委書記) |
| 效果與影響 | | 維持毛澤東領導地位與路線 | 維持鄧小平領導地位與路線 | 基本保證江澤民執政時期高層政治穩定 | 期望發揮胡錦濤主政時期高層政治穩定的效果 |

資料來源：陳德昇，陳陸輝，〈中共「十七大」政治菁英甄補與地方治理策略〉，《中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64。

以加強對人事安排的影響力來建立自身班底，是胡錦濤鞏固權力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共青團除推薦優秀團員作為黨員發展對象外，也對黨政各層級

輸送年輕後輩幹部，所以一直被中共視為「後備軍」，由於胡錦濤在共青團的歷練，以及曾任中央黨校校長一職，為自身建立了良好的政治人際網絡，共青團也自然成為胡錦濤提拔人才最好的對象。「十六大」之後，有一批曾在共青團工作的中共幹部，在政府換屆的人事改組後，開始擔任重要領導職務，2003年2月止，包括河北省長的季允石、上海市長韓正、北京市長孟學農、廣東省長黃華華、河南省長李成玉和寧夏自治區主席馬啟智；而在省級黨委書記方面有時任江蘇省委書記的李源潮、河南省委書記李克強、貴州省委書記錢運錄和福建省委書記宋德福，人事布局呈現出「中央江系掌權，地方團系接班」的現象，¹⁰¹此後，具有共青團背景的幹部被提拔的情況大幅增加¹⁰²，儘管這些省級領導人與胡錦濤或許並非刻意大規模的建立以共青團為基礎的派系，但是由於相互受益的關係，這些團派幹部通常願意自視為胡錦濤的追隨者，也成為胡錦濤穩固自己權力的基礎。¹⁰³

2003年7月1日時逢中共建黨八十二周年紀念日，胡錦濤發表「七一講話」，先表示「三個代表」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是具有貢獻的思想論述；另一方面，胡錦濤進一步闡述「三個代表」的本質應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和他先前所提出的「三個為民」不謀而合，並將「三個代表」中最具爭議的「代表先進生產力」轉化為「代表最大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化解私營企業入黨的疑慮，成功的掌握了「三個代表」的詮釋權，¹⁰⁴也逐漸掏空江澤民的權力來源基礎。

「十六大」之後，胡錦濤接任中共總書記一職，但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職務仍就由江澤民擔任，這樣的情形，使得胡錦濤只能夠被動介入軍隊事務，軍權掌握在江澤民手上，也讓胡錦濤無法盡快熟悉軍隊事務，進而影響他完全掌握軍隊的時間，這使一直以來所奉行的「黨指揮槍」產生微妙的變

¹⁰¹ 鄭宇碩，《胡錦濤的新時代》(台北：遠景基金會，2004年)，頁48。

¹⁰² 具有共青團背景的中共中央委員(包含候補委員)，在十四屆時，有23人，十五屆為34人，十六屆為58人，比例也從9%成長到16%；省委書記和省長的比例方面，由2002年的10%，2006年增加到29%(寇健文，2007：72-73)。詳見寇健文，〈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的崛起：派系考量 VS. 幹部輸送的組織任務〉，《遠景基金會季刊》，頁72-73。

¹⁰³ 李成，〈十六屆中委會人事構成及其權力均衡〉，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文化，2003年)，頁30。

¹⁰⁴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163。

化，也對胡錦濤身為「黨的最高領導人」身分形成挑戰。¹⁰⁵2004年9月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江澤民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一職，胡錦濤正式成為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最高領導人。雖然胡錦濤於1999年9月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就出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一職，但屬文人出身，又無任何軍事背景與軍方也無直接淵源的情況下，讓胡錦濤很難深入軍隊事務和建立軍中人脈，接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一職，僅是為了順利接班的安排，因此，在接任中央軍委主席後，為了更進一步的完成權力鞏固，胡錦濤必須獲得軍方勢力的支持。

依據共軍《軍官軍銜條例》之規定，上校以上軍官軍銜由中央軍委主席批准授予，因此，頒授軍銜是胡錦濤拉攏和控制軍頭最直接且主要的方式。從接任中央軍委主席至2011年7月，已經將45人升為上將，這些被提拔的將領成為胡錦濤在軍中主要的關係網絡與支持力量。¹⁰⁶胡錦濤為了確立領導的地位，展開了一連串的思想教育活動。2004年9月的十六屆四中全會，為了「加強執政能力」，打擊形式主義歪風，以解決黨員思想信念動搖、組織紀律渙散及貪污腐敗的問題，胡錦濤提出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實踐內容，對各組織階層推行「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目的是確保能夠提高黨員素質、加強基層組織、服務人民群眾和促進各項工作，並增強黨員與黨組織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最終提高黨的執政能力。¹⁰⁷2005年3月底，中央軍委舉行「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集體學習，強調保持先進性，是軍隊建設強基固本的主要工作，共軍須強化政治意識，聽從指揮，自覺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決聽從黨和胡主席的指揮。2006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後，胡錦濤總結「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他認為這是規模最大的一次黨內集中教育活動，成功的在全面建設

¹⁰⁵ 丁樹範，〈黨還指揮槍？軍隊改革與黨軍關係變化〉，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文化，2003年），頁115。

¹⁰⁶ 洪志安、洪陸訓、郭雪真，《中共的文武關係：以胡錦濤時期為例的因素分析》（台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11年），頁73-74。

¹⁰⁷ 王信賢，〈中共保先運動的發展與評估〉，《展望與探索》，第3卷第2期，2005年2月，頁12-13。

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之關鍵時刻，實踐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

「科學發展觀」在「十七大」被寫入黨章，是胡錦濤所提出的另一項重要思想論述，他認為，如果忽視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忽視各項社會事業的發展，忽視資源環境的保護，經濟建設是很難搞上去的，或是得付出沉重的代價，因此，「科學發展觀」的第一要務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為了重視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協調發展，人與自然的和諧，各級黨委和政府一定要堅持「科學發展觀」，不斷探索促進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新思路新途徑。¹⁰⁸2010年4月，胡錦濤發表談話表示深入貫徹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礎在於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來武裝黨員及幹部頭腦，目的是為了推動經濟社會好又快的發展，關鍵在於提高各級領導的科學發展能力，根本在於發揮人民主體作用，動力在於創新體制機制，以「科學發展觀」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現和諧社會的目標。



第二節 中共權力結構

中共「以黨領政」、「一黨專政」的黨國體制特色，具體的展現在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條文上。依據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條明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包括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之國務院，掌管軍事權之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及執行司法權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都需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監督和對其負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但必須受人民監督與對人民負責」；另一方面又在序言中提到「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在邏輯推演下，人民是國家一切權

¹⁰⁸ 黃清賢，〈中共領導人的辯證思維研究〉，《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5期，2008年7月，頁296。

力的來源，而人民必須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換言之，國家的權力系統皆須對中國共產黨負責。¹⁰⁹在此種情形下，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合法統治的地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且絕對的執政黨。

中國共產黨在國家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是其在戰爭時期的一種自然延續。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為了解決抗日時期，黨政軍在各方面工作不協調的情況，政治局通過了《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係的決定》，確立了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該決定指出，中央代表機關及各級黨委為各地區的最高領導機關，統一各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之領導，其所做出的決議或指示，下級黨委、軍隊的軍政委員會及同級政府黨團、民眾團體和黨員，均須無條件執行。¹¹⁰一元化領導的高度集中和高效率，對於中共獲得軍事戰爭的勝利具有重要的意義，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初，由於政府機關處於創立階段，面對恢復經濟和對應國內外複雜的局勢之急迫需要，中共自然以戰爭年代的一元化領導原則來應用於國家社會政治事務的領導和管理，這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體制產生深遠的影響。¹¹¹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具體的表現在它對國家各方面事務的政治領導、組織領導和思想的領導。政治領導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國家制定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做好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及各方面的工作；組織領導是指以黨在各時期的基本路線為依據，搞好國家政權建設和組織建設，並以黨的名義向國家政府機關推薦重要幹部；思想領導是指特別重視思想教育和宣傳理論工作在國家生活中的作用，加強精神文明建設與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¹¹²為避免過去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所造成的多頭馬車、職權不清，致使效率低落，形成內耗，中國共產黨開始將黨政關係朝「規範化」發展，黨對國家的領導，在符合依法治國的原則下，黨的主張必須經過法定的程序轉變成國家的意志，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對政府與政治的領導，不是

¹⁰⁹ 曾慶華，〈中共權力結構與決策模式〉，《中共研究》，第37卷第7期，2003年7月，頁26-27。

¹¹⁰ 邵宗海、蘇厚宇，《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共決策機制：中共中央工作領導小組》（台北：韋伯文化，2007年），頁36-37。

¹¹¹ 楊光斌，《中國政府與政治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5。

¹¹² 朱光磊，《中國政府與政治》（台北：揚智文化，2004年），頁59。

直接介入到政府具體的社會事務管理中，而是透過領導政府各個部門，包括權力、行政、司法、軍事等機關，甚至其他黨派與社會團體，¹¹³由這些機構來扮演中介的角色，借助這些中介的力量和影響，全面實現對政府與政治的領導。¹¹⁴因為中國共產黨具有對國家和社會絕對領導的地位，所以本節探究的權力中心，將以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核心組織為重點。

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黨的中央組織結構(圖 2-1)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和其選出的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中央書記處、中央軍事委員會及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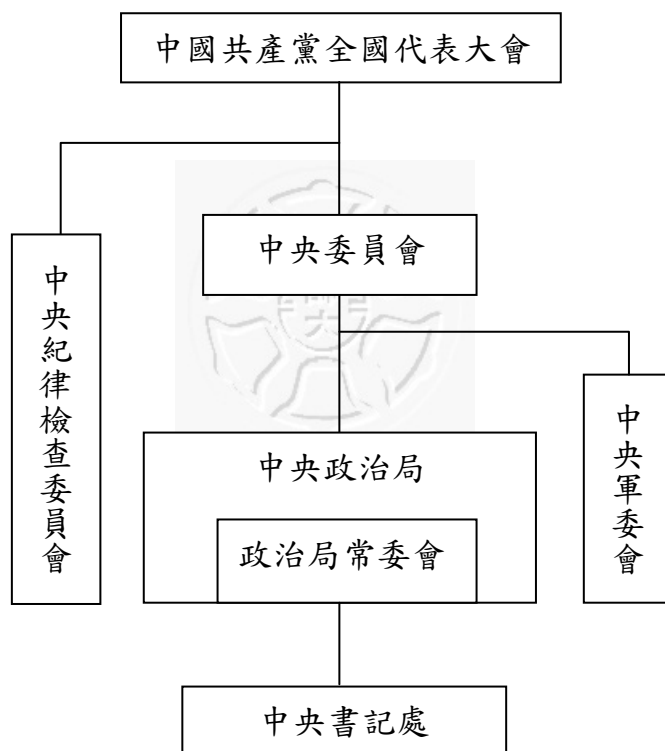


圖 2-1 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結構圖

資料來源：王肇隆、郭瑞華，〈中共政治菁英結構研究—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探討〉，《國立屏東商專學報》，第 3 期，1995 年 2 月，頁 128。

¹¹³ 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是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但也容許存在著包括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農工民主黨...等其他民主黨派，中國共產黨是居於領導地位的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參政黨，而非在野黨，以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多黨合作方式作為指導方針。

¹¹⁴ 謝慶奎、楊鳳春、燕繼榮，《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2005 年)，頁 164。

一、全國代表大會

黨是根據自己的綱領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的統一整體。¹¹⁵ 依據中共黨章，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全國代表大會由中央委員會召集，每五年舉行一次，無非常情況，不得延期舉行。若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或是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省一級組織提出要求，全國代表大會可以提前舉行。全國代表大會由各級單位的黨員採無記名方式選舉產生的黨員代表組成，候選人名單是由黨組織和候選人經過充分醞釀和討論，可採差額選舉的方式先進行初選，或是逕行以差額方式直接選舉，而名額和選舉辦法由上一屆的中央委員會決定。¹¹⁶

全國代表大會的職權包括：（一）聽取和審查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二）聽取和審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報告；（三）討論及決定黨的重大問題；（四）修改黨的章程；（五）選舉中央委員會；（六）選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中國共產黨章程第 19 條）。由於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一次，間隔時間較長，當遇到重大問題而中央委員會不能解決時，可以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其職權是討論和決定重大問題；調整和增選中央委員會、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部分成員，但其調整和增選的數額，不得超過全國代表大會選出總數的五分之一。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很少召開，除非發生改變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結構的重大變動。¹¹⁷

實務上，由於中共的政治習慣十分重視會前的醞釀協商，人數多達 2000 多人的全國代表大會（表 2-2），又五年才召開一次會議，會議議期也不長，自然很難成為主要的決策權力機關，加上從中共的黨章來看，全國代表大會中共政治運作中並不是真正具有重要性，其最主要的功能僅是提供領導者

¹¹⁵ 依據中國共產黨黨章，中共的民主集中制有幾項基本原則：一、黨員服從黨的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組織，全黨各組織和全體黨員服從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二、黨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由選舉產生；三、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中央委員會。黨的地方各級代表大會和它所產生的委員會是黨的地方各級領導機關，各級委員會向同級的代表大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四、黨的上級組織要經常聽取下級組織和黨員群眾的意見，並及時解決他們所提出的問題，而下級組織要獨立負責解決自身職責範圍內的問題，並向上級組織請示和報告；五、黨的各級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的原則；六、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

¹¹⁶ 陳堯，《當代中國政府體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46。

¹¹⁷ 楊光斌，《中國政府與政治導論》，頁 43。

權力行使的合法性基礎，替權力者「背書」，以便完成政治上的程序正義，但從黨大會所接受的政治報告，可以了解中共的思想路線和政策方向有無改變。¹¹⁸

表 2-2 中國共產黨中央組織人數統計表

| 職 稱 \ 屆 次 | 十四大 | 十五大 | 十六大 | 十七大 |
|-----------|------|------|------|------|
| 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 1989 | 2048 | 2114 | 2213 |
| 中央委員 | 189 | 193 | 198 | 204 |
| 中央候補委員 | 130 | 151 | 158 | 167 |
| 政治局委員 | 20 | 22 | 24 | 25 |
| 政治局常務委員 | 7 | 7 | 9 | 9 |
| 政治局候補委員 | 2 | 2 | 1 | 0 |
| 中央書記 | 5 | 7 | 7 | 6 |
| 中央軍事委員 | 7 | 7 | 8 | 11 |
|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 | 108 | 151 | 121 | 127 |

資料來源：根據新華網資訊，自行整理

二、中央委員會

中央委員會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為黨的最高領導機構，負責執行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監督和決定黨之政策及行動，對外代表中國共產黨，並負責選出黨的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委員及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必須具有五年以上的黨齡，中央委員會每屆任期五年，若全國代表大會提前或延期舉行，它的任期也相應地改變，其名額由全國代表大會決定，遇有委員名額出缺之情況，由候補委員依得票數之順序依次遞補(中國共產黨章程第 21、22 條)。每一屆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名單由上一屆的中央政治局彙整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央有關部門的提名，向新一屆的全國代表大會主席提出，經由全體代表投票產生。¹¹⁹中央委員會的成

¹¹⁸ 楊開煌，〈對江澤民十六大政治報告之研析〉，《中共研究》，第 36 卷第 12 期，2002 年 12 月，頁 25。

¹¹⁹ 李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台北：生智文化，1999 年)，頁 34。

員大多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國家機關的領導人，各省級地方、部級黨政機關和各人民團體全國領導機構的主要負責人，解放軍四總部、各大軍區¹²⁰和軍兵種的部分主官，以及部分具有代表性的黨員。¹²¹

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舉行一次，聽取並監督中央政治局或其他機構所提出的工作報告，會議議題非自身決定。關於中央委員會的功能定位和重要性，學者方面有些許不同的看法：由於中央委員會人數較全國代表大會少，決策更具效率，許多重大政策和政治方向的轉變，都是在中共中央委員會會議決定的，例如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施行的改革開放政策和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的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決策；¹²²李英明則認為，由於委員會的人數眾多，使其在本質上無法作為政策制定的機關，但它具有認可和接受黨的政策、計畫及決定黨中央機關人數的權力。¹²³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另須負責選出中央政治局和其常務委員會委員及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產生。

「總書記」一職的名稱，首次出現於「四大」的黨章裡，負責處理中共中央黨務，其功能地位即為中國共產黨黨魁。事實上，自中共建黨以來，具有黨魁職權與地位的職務名稱甚多，總書記只是其中存在時間較長的名銜之一，而且並非在每個時期都具有中共黨魁的職權與地位。¹²⁴根據現行的中共

¹²⁰ 中國人民解放軍四總部分別為：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和總裝備部；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成都軍區、廣州軍區、蘭州軍區和南京軍區為中共七大軍區。

¹²¹ 朱光磊，《中國政府與政治》，頁 29。

¹²² 陳堯，《當代中國政府體制》，頁 47。

¹²³ 李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頁 34。

¹²⁴ 總書記一職首現於中共四大黨章，到六大前，名稱被改為中央臨時政治局主要負責人；六大召開後，職稱改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主席，到七大前，因內部權力鬥爭，不僅名稱多次變動，也無黨魁的地位，權力遭到架空；七大到八大前，總書記職稱消失於中共黨內，其職能由中央書記處主席取代，但此職稱只存在兩個月，改由中央委員會主席取代；到了八大召開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重新出現於中共黨內，但職權地位已下降，在其之上的有相當於黨魁的中央委員會主席和四位副主席，在文革期間，由於身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鄧小平被整肅，總書記一職也被廢除，到四人幫被捕前的十年間，由中央文革小組負責處理黨政軍事務；1980 年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中共決定恢復總書記一職，但黨魁職權仍在中央委員會主席，在此時期的胡耀邦身兼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但由於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握有軍權，因此鄧小平才是實質上的黨魁；1982 年十二大後，中央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職務被廢除，黨魁職權重新落到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上，但仍擺脫不了鄧小平才是實質上最高領導人的事實，六四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改由江澤民擔任，1989 年十三屆五中全會，鄧小平交出軍權，由江澤民接任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黨章，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負責召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並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是中共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黨章雖然沒有明確賦予總書記實質上的權力和地位，但總書記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且從實務運作和政治實踐來看，在民主集中制原則下，人治色彩濃厚的中國共產黨，需要一位核心人物來帶領和處理黨務系統及工作，因此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是中共黨內最高領導人，是站在權力架構金字塔的頂端。¹²⁵

三、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

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建立於 1927 年的中共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負責指導全國一切政治工作和處理黨的日常事務，1945 年「七大」所通過的黨章，對於中央政治局的職責有了較明確的規範，黨章規定中央政治局在兩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責任，凡屬重大的思想、政治、政策、組織和軍事問題，都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政治局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由於政治鬥爭的影響，「十二大」選出的政治局委員中，非鄧小平派佔有相當數量，權力決策核心轉向中央書記處，政治局在此時期屬二線機構，待鄧小平能掌握政治局，加上「十三大」後的黨章和政治局工作規則，明確強化其功能定位，政治局再度恢復其權力中樞的地位。¹²⁶

現行黨章規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產生，在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政治局人數約 20-25 名左右，常委會人數約 5-9 人。雖然中央委員會會議每年至少召開一次，但是否召開會議，中央政治局握有主導權，而且會議議期又不超過十天，其餘大多時間都是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來負責領導和決策日常的工作，擁有影響黨和政府機關重大事務決策及挑選黨政軍負責人的權力，政治局委員也大多同時兼任國家中央機關的領導，相較於黨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成為名符其實的黨魁。詳見趙建民、劉松福，〈中共中央總書記地位演變之研究：兼論總書記與書記處之關係演變〉，《共黨問題研究》，第 23 卷第 8 期，1997 年 8 月，頁 29-37。

¹²⁵ 陳堯，《當代中國政府體制》，頁 48。

¹²⁶ 王肇隆、郭瑞華，〈中共政治菁英結構研究—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探討〉，頁 118。

和中央委員會更具重要性，是中共黨內實質的最高領導機構，權力中的核心。相對於政治局而言，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更是經常性的集中討論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且從許多中共黨史的例子來看，常務委員會在做決策時經常不需要與政治局商量，¹²⁷又依據《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工作規則》規定，常委會須定期向政治局匯報工作，現階段，政治局每月一次會議，而政治局常委會則是一至兩周召開一次會議，顯示出政治局常委會更是權力核心中的核心。

政治局在黨中央有三大主要功能：（一）人事運作：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同為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委員，中央書記處成員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提名，再經中央委員會通過，因此，黨的領導者是由政治局產生的；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張全景曾說：「副省部級幹部由中央常委會議集體討論決定。省部級正職中央常委討論後，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¹²⁸（二）領導功能：因為在中央委員會休會期間，由政治局與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行使其職權，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採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方式，由政治局委員協助，處理對口事務，如委員會分別負責經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宣傳文教、組織人事、紀律檢查和政法系統..等方面事務。另外，為作為對政府有關部門的指導、協調和監督工作，在政治局與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領導下，分別設置「中央財經工作領導小組」、「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中央黨的建設工作領導小組」、「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和「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等組織；（三）監督功能：政治局負有監督及決定對黨幹部做出處分的職權，如經由委員會全體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決定，可對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地方各級委員會委員、候補委員，給予撤銷黨內職務、開除黨籍或留黨查看，嚴重觸犯刑律者，由政治局決定開除黨籍。¹²⁹

¹²⁷ 李英明，《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頁 36。

¹²⁸ 南方周末，〈中組部前部長直言高官管理：非常反感跑官要官〉，《新華網》轉載，2006 年 11 月 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lianzheng/2006-11/09/content_5309743_1.htm〉。

¹²⁹ 鍾穎盛，〈中共中央政治局角色之探討--兼論其黨政關係〉，《共黨問題研究》，第 26 卷第 7 期，2000 年 7 月，頁 11-12。

四、中央書記處

「中央書記處」名稱首次出現在 1934 年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會議決定將黨章規定的「中央常務委員會」（現今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更名為「中央書記處」。根據「六大」的黨章規定，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前後期間負責指導黨的政治工作，而中央常務委員會為中央政治局的常務機關，負責處理日常工作，在實際運作上，因為中央委員會開會次數較少，人數較多，所以權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而中央常務委員會又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務機關，擔負進行日常工作的責任，所以在「中央常務委員會」更名為「中央書記處」後，決策和執行的權力自然落在中央書記處上。¹³⁰1943 年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決定》，該決定強調中央書記處的職權是根據政治局確定的方針處理中央日常事務，並直接管理中央各部、委、廳、社，這次首次對中央書記處的職權作出明確的規範，也如同先前所述，在此時期，中央書記處為中央日常決策機關，職能明顯不同於現今的中央書記處。¹³¹

1956 年，中共召開「八大」，對黨章和組織進行修改和調整，「八大」黨章規定「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決策權力改歸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在此階段，中央書記處僅是一執行機關。文革期間，中央書記處成員多數遭到整肅，¹³²1966 年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毛澤東的壓迫之下，中央委員會作出裁撤中央書記處的決議。¹³³在鄧小平復出重新掌權的背景下，1980 年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恢復設立中央書記處，1982 年的「十二大」黨章規定中央書記處成員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下，處理中央

¹³⁰ 趙建民、劉松福，〈中共中央總書記地位演變之研究：兼論總書記與書記處之關係演變〉，頁 38-39。

¹³¹ 吳仁傑，〈中共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書記接班角色探析〉，頁 47。

¹³² 1962 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時，中央書記處成員有鄧小平、彭真、王稼祥、譚震林、李雪峰、李富春、李先念、陸定一、康生、羅瑞卿、葉劍英、陶鑄，候補書記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到了 1966 年底，15 之中遭到整肅的超過一半，分別是鄧小平、彭真、譚震林、陸定一、羅瑞卿、陶鑄、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詳見吳安家，〈論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的政治意涵〉，《中國大陸研究》，第 37 卷第 11 期，1994 年 11 月，頁 8。

¹³³ 趙建民、劉松福，〈中共中央總書記地位演變之研究：兼論總書記與書記處之關係演變〉，頁 33。

日常工作，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1987年中共「十三大」，再度修改中央書記處的產生方式和定位，將原先的「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改為「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提名，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中央書記處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的辦事機構」並延續至今。¹³⁴根據學者的觀察，中央書記處的職能雖然一路從決策機構到執行機關，再到辦事機構，權限一直受到限縮，似乎有地位下降的現象，但若從成員組成的角度來看，大多時間，中央書記處書記至少有一位以上的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存在，成員同時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佔多數，其實質地位仍有相當的重要性。¹³⁵現今的中央書記處在政治運作中發揮著以下功能：（一）負責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作會議議題的準備；（二）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事務；（三）負責組織起處用中央名義發佈的一般性黨務工作文件；（四）辦理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交代的事項。¹³⁶



五、中央軍事委員會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共的政權是靠軍隊打下來的，人民解放軍先是「黨」軍，如同毛澤東所言，「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若沒有人民解放軍，就沒有現今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地位，因此中共一直以來特別強調「黨指揮槍」的重要性。在中共建政以前，人民解放軍一直都是「黨」軍，建立政權之初，根據《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決定設立「中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負責統一管轄級指揮全國人民解放軍和其它人民武裝力量，此軍事委員會的成立，也標誌著中央軍事領導機構正式納入國家政府系統。1954年的憲法規定，由國防委員會取代中央

¹³⁴ 吳仁傑，〈中共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書記接班角色探析〉，頁 52-53。

¹³⁵ 趙建民、劉松福，〈中共中央總書記地位演變之研究：兼論總書記與書記處之關係演變〉，頁 39。

¹³⁶ 中共中央組織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教程〉（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1997年），頁 32。

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但國防委員會¹³⁷僅是諮詢性質和有利於統一戰線的組織，實際的武裝力量領導機關是同時期恢復設立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¹³⁸

1982年憲法規定，在國家體制裡設立「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重新將武裝力量納入政府機關，但為確保黨指揮槍的原則，中國共產黨內也有負責領導武裝力量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與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關係，可從三方面來看：（一）人員組成：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人員由中共中央委員會決定；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其他組成人員由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提名，再經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在實務上，兩個機構的組成人員一模一樣，也就是所謂的「一套人馬，兩塊招牌」；（二）職能方面：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國家中央軍事委員會都具備領導武裝力量的地位；（三）政治結構：中央軍事委員會是國家機構的一部份，也是中共中央的部門，兩者實際上是同一機構。¹³⁹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設置主席、副主席和委員若干人，採「主席制」，中央軍委主席在職權範圍內有權做最後的決定，其他人必須完全服從主席的指示和命令。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政治工作機關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該部負責管理軍隊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中央軍事委員會有權規定軍隊中黨的組織體制和機構。對中共當權者而言，軍隊有穩定國家政權和自身權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是奪取政權的暴力工具，因此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通常是由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來擔任，¹⁴⁰以確保政權穩固和符合「以黨領軍」、「以黨領政」之原則。

¹³⁷ 國防委員會是名義上國家最高軍事的領導機關，但卻曾在 1975 年至 1978 年間的憲法上，被取消設立。

¹³⁸ 薄智躍，〈中國大陸的黨軍關係〉，《中共研究》，第 46 卷第 3 期，2012 年 3 月，頁 37-39。

¹³⁹ 謝慶奎、楊鳳春、燕繼榮，《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頁 262。

¹⁴⁰ 中共曾經出現有違「黨指揮槍」之矛盾尷尬時期，1981 年 6 月至 1989 年 11 月間，鄧小平非擔任名義上黨的最高領導人職務「中央委員會主席」或「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但他卻擔任中央軍委主席，握有軍權，加上其聲望甚高，成為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1987 年 11 月到 1989 年 11 月間，鄧小平更是無身兼其他重要職務，僅以普通黨員身分當任中央軍委主席；2002 年 11 月，江澤民將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職交由胡錦濤接任，直至 2004 年 9 月才卸下中央軍委主席一職。

六、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馬列共產主義極為重視「黨的紀律」，為了保證執行黨的路線、加強黨的團結統一、純潔黨的組織、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必須倚靠「鐵的紀律」來達成。要建立「鐵的紀律」，黨員必須無條件的自身自覺遵守和維護黨的紀律，要達到這種目標，主要可透過兩種方式：（一）對黨員不斷地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進行黨的基本知識和黨的各項政策教育，以提高黨員遵守黨紀的自覺性；（二）專設一個執行黨的紀律工作機關來貫徹。中國共產黨在1928年的「六大」便了解成立監察機關的重要性，以非常設機構的「特別委員會」來審查關於黨員違犯黨紀的問題；1949年中共中央委員會根據「七大」黨章規定，決議成立中央和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用常設機關來處理和懲戒黨員違法亂紀的事件；1955年在原有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基礎上，設立中央和地方各級監察委員會，職權較原先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更為擴張，¹⁴¹文革期間遭到廢置，直至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設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依據現行黨章，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黨的中央委員會領導下工作，組成人員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任期與全國代表大會相同，均為五年，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體會議得選舉常務委員會和書記、副書記，並報請中央委員會核准。做為檢查和監督的角色，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任務有：（一）維護黨的規章和制度，檢查和處理黨員違紀問題；（二）檢查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的執行情況；（三）、協助中央委員會加強黨風建設和組織協調反腐敗工作；（四）對黨員進行維護紀律的教育、發揮監督功能；（五）為保障黨員權利，必須受理黨員的控告和申訴。此外，如因工作需要，可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黨的紀律檢查組或紀律檢查員，並可列席該機關的會議，該機關黨的組織也需支援紀律檢查員的工作（中國共產黨章程第43、44條）。

¹⁴¹ 拳鼓，〈中共正式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研析〉，《中共研究》，第13卷第1期，1979年1月，頁91-92。

在中國共產黨絕對領導的原則下，中共近來大力執行的反腐工作中，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可以指揮司法檢察機關，遇有貪腐案件時，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也可先於檢察機關立案偵查；在國家監察部方面，1993年1月，中央至地方紀檢組與監察機關開始合署辦公，實行一套工作機構，兩個機構名稱，雖然監察部仍隸屬國家機關國務院下，但監察部長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擔任，須對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負責，在這樣的架構之下，產生兩大弊病：（一）干預司法，使得「司法獨立」無法真正落實；（二）反腐工作無法確實執行：由於黨章規定，若同級黨委發生貪腐事件，可由上級紀律檢查委員會查辦，若中央政治局委員層級涉入貪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若無中央委員會同意，無法主動立案偵查。¹⁴²

第三節 中共菁英甄補之非制度性制約

一、派系政治

派系一直是中共非正式政治的最被關注的行為者，自中共建黨以來，在權力鬥爭之下，派系政治自然應運而生，政治菁英們拉幫結派形成「類同團體」或許是為了在權力鬥爭的風暴裡，找到能夠自我保護的依靠，又或許是為了獲取自身最大的政治利益，透過「派系」這個媒介，藉由派系所蘊含的政治人際網絡來達成此目標。關於中共派系形成的背景原因，可歸內以下幾點：（一）受馬列主義鬥爭哲學的影響：意識形態經常能夠左右特定團體成員的思想與行動，突出意識形態以強調合法性的正統地位，一直是中共派系鬥爭的焦點，也提供了中共黨內對權力鬥爭源源不息的動力；（二）國際共黨的影響：中共在政治思想上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息息相關，毛澤東思想也深受其影響，是故蘇共內部對思想路線分門別派，自然也對中共造成影響，形成黨內派系鬥爭；（三）中共早期鬥爭傳統之影響：中共在長時間的發展中，因為時間、地緣因素、特殊背景的差異，自然容易使趨同性高的團體聚在一

¹⁴² 李世明，〈中共紀檢委在反腐工作的角色探討〉，《展望與探索》，第9卷第9期，2011年9月，頁52。

起，形成派系，維護自身利益；(四) 毛澤東個人權謀之影響：毛澤東為排除異己，鞏固自身權力，因此特別強調鬥爭的存在；(五)、政策路線不同的影響：不同的主張，形成不同的政策路線，也自然將它們分門別類，形成派系。¹⁴³關於這點學者黎安友提出他的看法，他認為中共派系政治時常伴隨著政策路線之爭，但其本質是為了爭奪權力，也就是說，政策路線之爭只是被用來當作權力鬥爭的工具，並非在政策路線上存著多大的歧見，改變政策路線並非主要目的，爭奪權力才是主要目標。¹⁴⁴白魯恂也持類似的看法，他認為，派系的形成不是因為政策的差異性，而是取決於權力的分配，派系鬥爭結束，誰取得最高的權力，自然也就擁有制定政策的能力，但他認為黎氏的政治鬥爭未改變政策路線的說法，有待商榷。¹⁴⁵

黎安友觀察早期中共派系政治有幾項主要特徵：(一) 派系政治是菁英政治的一種形式；(二) 派系政治不是一種文化，而是一種制度性的體制。這個體制所依靠的是領袖拔擢特定下屬以換取其個人忠誠之回報；(三) 它指涉的是一種政治，「權力考量」是驅使行動者的主要或強烈的動機；(四) 個人忠誠的網絡是建立此政治團體的主要結構，恩庇者與侍從者在長期互相需要的關係上，前者需要後者侍護，後者需要前者的恩庇，兩者才能在團體之內，繼續向上攀爬，以獲取更多資源，也就是建立起「恩庇—侍從」關係；(五) 缺乏制度化的鬥爭方式造就了派系主義，派系主義又回過頭來延續非制度化的情勢，菁英衝突和權力鬥爭不斷產生，形成一個不穩定的政治體系；(六) 權威寓於個人，而不在職務。¹⁴⁶

綜觀中共黨史，毛澤東時代就曾多次發生派系鬥爭，其主因都是毛澤東為了鞏固權力而起，其透過「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之運作方式，在鬥爭之中，取得優勢。1958年，毛澤東高舉「三面紅旗」，動員全國民眾

¹⁴³ 蘇嘉宏，《派系模式與中共政治研究》，頁110-116。

¹⁴⁴ Andrew J.Nathan, "Policy Oscil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Critique," *The China Quarterly*, Vol.68, December 1976, pp.720-733.

¹⁴⁵ Lucian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1981), pp.56-64.

¹⁴⁶ Andrew J.Nathan 著，何大明譯，《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中國政治變遷之路》(*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From Totalitarian Rule to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台北：巨流出版，2007年)，頁44-45。

以期達到超英趕美的目標，未料造成大規模的飢荒，造成至少三千萬農民死亡，大躍進正式宣告失敗，一場權力鬥爭也旋即展開，當時身為中共最高領導人的毛澤東也涉入其中，因為對其而言，這是一場政權保衛戰。1959年，中共召開廬山會議為了糾正大躍近以來，一連串「左」傾的錯誤，彭德懷在會議中對大躍近以來的錯誤上書建言，不料毛澤東認為這是對其權威認同的挑戰，為避免權力失勢，遂將彭德懷與其經濟問題上的歧見，提升到路線問題上的歧見，彭德懷和同意彭氏意見的黃克誠、周小舟、張聞天受到批判，被打為「反黨聯盟」，冠上「右傾機會主義者」，毛澤東藉此機會以整肅彭德懷在軍中的勢力。¹⁴⁷在這次事件中，毛澤東拉攏林彪，讓林彪取代彭德懷國防部長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在這之後，毛澤東將鬥爭的對象轉為劉少奇。劉少奇原本是毛澤東擇定的接班人選，並多次公開發言對劉少奇給予肯定，但兩人後期多次出現意見分歧、政策衝突，包括劉少奇曾對於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看法，¹⁴⁸致使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信任感越加深刻，1965年底，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將派系鬥爭赤裸裸的端上檯面，毛澤東在國務院方面有周恩來，解放軍方面有林彪的雙重力量下，將劉少奇打為「形左實右」、「修正主義」的走資派，成功鬥倒劉少奇，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屆時一中全會上，劉少奇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已經從第二降至第八，並喪失原先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職務。¹⁴⁹

林彪在兩次的權力鬥爭都發揮其作用，儼然成為毛澤東最主要且有力的支持者，中共「九大」黨章內容更是直接宣稱：「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真誠、最堅定地執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文革過後，林彪成為最

¹⁴⁷ 會議過後，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分別被免去國防部長、總參謀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保留他們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政治局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因彭德懷足國防部長外，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黃克誠和彭德懷關係良很，且任總參謀長，加上彭德懷聲望日益高漲，毛澤東擔心其有造反之可能，遂透過此事，整肅和清除彭氏在軍中勢力。詳見伍小濤，〈廬山會議五十年祭：毛澤東與彭德懷的恩恩怨怨〉，《歷史月刊》，第262期，2009年11月，頁87-89。

¹⁴⁸ 陳永發，〈毛澤東與七千人大會：民主發揚還是文革預演？〉，《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9期，2010年9月，頁128。

¹⁴⁹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73。

大的獲益者，林彪被選為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委員，他所屬的「四野」勢力也逐漸掌握權力，對毛澤東造成壓迫，使毛澤東對於權力的掌控感到威脅，1970年8月的九屆二中全會，林彪提議恢復設置國家主席，讓毛澤東深感被奪權的壓力，決定孤立林彪集團，¹⁵⁰並予以整肅，而林彪最終在1971年9月搭機逃離大陸時，不幸墜機身亡。在這之後，尚有以四人幫為首的「文革派」及以葉劍英、李先念為首的「務實派」之間的鬥爭。

從以上可以得知，派系鬥爭是為了爭奪權力，獲取或鞏固利益，派系政治對早期中共政治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切入點，藉由派系途徑來研究中共菁英政治也能夠得到相當的成果。毛澤東到鄧小平時代，派系主義是主要的政治動能，因為他們都能夠憑藉著自身的革命資歷和政治威望，透過權力分配聚集彼此認同的追隨者，但是隨著政治繼承的制度化趨勢，過去派系主義所強調的「恩庇—侍從」關係已經相對弱化，但這並非意味著派系政治已經消失於中共政治運作，派系仍就是中共政治的一部份，至今為止，派系仍就是研究中共菁英政治的主要媒介之一，只是和過去相比，派系主義對於中共政治的影響力已經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的直接和明顯。¹⁵¹

二、意識形態與政治路線

意識形態是一種行為取向的思想體系，它在結構上可以分為兩部分，信仰(核心)體系和實踐體系，必須兩者之間相互結合，才能發揮效用，旨在維繫或是動搖現存的社會。¹⁵²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主要是包含一套世界觀、歷史觀，以及用來支撐這套世界觀、歷史觀的方法論或是由這套世界觀、歷史觀所延伸出來的一套價值觀，它會影響人的價值理性運作；實踐體系部份主要是提供一套引導人們去認知判斷周遭世界的認知圖和評估圖，以及由它們

¹⁵⁰ 張五岳，〈從政治聯合理論檢視中共派系政治〉，《共黨問題與研究》，第14卷第3期，1986年3月，頁33。

¹⁵¹ Andrew J. Nathan 著，何大明譯，〈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中國政治變遷之路〉(*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From Totalitarian Rule to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頁46。

¹⁵² 吳玉山，〈意識型態與列寧主義的國家論〉，《東亞季刊》，第15卷第3期，1984年1月，頁47。

所延伸出來引導人們實踐行動的戰略和策略設計，意識形態的實踐體系會指導人的實際行動，影響人的策略理性運作。¹⁵³

中共將意識形態作為掌握國家權力和統治地位的工具，透過思想教育向群眾宣傳具有支配性權威的信念和價值，同時也用意識形態來區別那些不具有共同信念的人們，對中共而言，意識形態廣義上是指黨內以最大公約數所形成的全黨共識，狹義上則是指涉當權派與政治菁英所採取具有支配性權威的思想路線和政治主張。¹⁵⁴毛澤東在與以王明為首的共產國際派爭奪「馬克思主義」的詮釋權時獲得勝利，並成功地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成功的掌握意識形態之控制權後，這也成為毛澤東掌權時期，提供政權合法性、正當性和統治階層權力行使的合理依據，並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革命時期的正統地位，毛澤東思想更是在中共「七大」時，被載入黨章，明白宣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之實踐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做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自此之從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並列，成為共黨意識形態的最高指導權威。¹⁵⁵196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將毛澤東思想的影響發展到極致，形成對毛澤東個人的造神運動與盲目之崇拜，也帶來了長達十年的政治鬥爭與社會動盪。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為了破除迷信與盲目的個人崇拜，中共開始思考意識形態的轉型，企圖衝破毛澤東思想的枷鎖。華國鋒崛起於文化大革命期間，在1976年掌權之後，自然無法全面否定過去，為了不撼動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只能夠選擇性的批判「四人幫」，因為他深知唯有繼續扮演毛澤東的繼承者和護衛者，並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旗幟，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主張，透過壟斷和獨佔毛澤東思想的方式，才能鞏固他的統治地位。¹⁵⁶華國鋒以毛澤東最忠誠的支持者角色，提出「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要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

¹⁵³ 李英明，《中國：像鄧後時代轉折》，頁3。

¹⁵⁴ 張國聖，〈當代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發展的詮析〉，《中國大陸研究》，第47卷第4期，2004年12月，頁36。

¹⁵⁵ 王官德，〈中共領導人的權力繼承與鞏固〉，《源遠學報》，第11期，2000年11月，頁79。

¹⁵⁶ 同上註，頁80。

終不渝地遵循」，面對華國鋒高舉「毛澤東」旗幟，鄧小平則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大旗予以還擊，鄧小平將對毛澤東個人的崇拜，轉化成對「毛澤東思想」的崇拜，意即讓毛澤東的價值不僅是他個人曾經說過什麼、做過什麼、決策過什麼、指示過什麼，更有價值的是「毛澤東思想」之內容意涵，鄧小平將之提升為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而其精髓就是把馬列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互結合，也就是鄧小平所提的「實事求是」，作為意識形態的實踐部分，¹⁵⁷「凡是派」與「務實派」的對壘，最終由鄧小平獲勝，開啟鄧小平掌握權力和掌控共黨意識形態解釋權的時代。

為了避免文革時期以民粹主義為號召的群眾運動，進而造成政治動盪與社會不安的情況再度發生，也為避免再度陷入「左」、「右」的泥淖裡，鄧小平在掌權之後，採取「惕右防左」的態度。他認為可以通過建立以中共為中心的威權體制來反制和化解「右」的問題；另一方面在建立威權體制的同時必須在黨內真正落實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來防止「左」傾的現象。具體的實現是依靠他所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來構築一個「惕右防左」的政治框架，一來可以用來規範在其之後中共領導人的作為，讓其擺脫過去政治路線或政策方向「左」、「右」擺盪的痛苦，而且藉由「惕右防左」所延伸的原則，也可以作為培養和安排權力接班人的憑藉，以保持政治方向和路線有一致性，讓接班過程能夠順利及平和，避免過去那樣激烈的權力鬥爭，對黨造成傷害。¹⁵⁸但後來鄧小平所先後擇定的接班人，都曾被冠上犯了靠向的錯誤。

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同意胡耀邦辭去總書記，會議做出結論認為胡耀邦在擔任總書記期間「違反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失誤」，後者的陳述是對於胡耀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不力而來，認為胡耀邦在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兩條路線鬥爭中，卻只反左不反右；後任者趙紫陽一樣被打為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及在發生學生運動時，犯下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1992年，中共再度糾

¹⁵⁷ 黃清賢，〈中共領導人的辯證思維研究〉，頁 288。

¹⁵⁸ 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頁 154-158。

結於姓「資」或姓「社」，同時間江澤民對於改革開放的曖昧不清態度，讓鄧小平在南巡期間說出：「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誰就會被打倒。」之重話。

我們可以發現，自從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路線獲勝後，確立改革開放政策，為了邁向國家現代化建設的目標，以及適應新時代的社會發展需求，中共的意識形態也隨之變化調整，主要有幾點：（一）以科學的態度來理解毛澤東和馬克思思想，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原則是理論與實踐兩者必須統一；（二）透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實事求是，思想解放」原則來重新解構「毛澤東思想」，剔除其不利於發展的部分；（三）在改革開放與思想解放的政治氛圍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四）重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定位。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重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定位，認定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確實犯了嚴重的錯誤，但他的革命功績遠遠大過於他的過失，並且認為毛澤東思想以獨創性的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五）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之意識形態做為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新詮釋體系；（六）中共在「十五大」正式將「鄧小平理論」與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並列，寫入黨章，作為中共政治路線的最高指導原則。¹⁵⁹在確認「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對於中共意識形態的地位後，雖然兩人具有革命實績和高度的政治威望，但為了符合社會情勢發展的需求和增強統治能力，後任者必須在意識形態上作重建或更新。這是因為不同於革命家將意識形態作為政治控制和動員的工具，技術官僚主要是將意識形態作為論證他們執行的政策之合理性與合法性。¹⁶⁰江澤民和胡錦濤就是在這種情形下，逐漸的重新建構中共的意識形態，鄧小平講求的思想解放，將意識形態推向了實用主義，江澤民作為權力繼任者，為了適應情勢的發展和回應左派的攻擊，自然必須提出一套思想論述，來除破困境，在鄧小平的南巡談

¹⁵⁹ 張國聖，〈當代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發展的詮析〉，頁40-43。

¹⁶⁰ 鄭永年，〈政治漸近主義：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前景〉（台北：吉虹資訊，2000年），頁51。

話下，1993年確立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有市場經濟，1997年的「十五大」確立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打破了公有、私有之爭，2002年十六大將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寫入黨章，作為其意識形態的最終定位。；胡錦濤接任後，不僅重新詮釋「三個代表」，面對高度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提出「科學發展觀」來取代「發展是硬道理」，強調在以人為本的前提下，發展的同時也要兼顧區域均衡。¹⁶¹學者觀察至今為止中共意識形態的轉變有以下結論：（一）意識形態對社會的作用和影響力減少，影響範圍限縮到政黨系統裡面。關於這點，鄭永年也持相同意見，過去中共的意識形態是延伸到社會各個層面，擁有控制社會的功能，但現在則不然，現在意識形態只是黨的意識形態；（二）現今中共是在執政綱領上建構和宣傳意識形態，政黨的意識形態逐漸變成政黨的執政綱領。¹⁶²

三、老人政治的干擾

這裡的老人政治指的是沒有正式的、法定的制度職位，但卻在幕後操縱國家的政治生活，也就是說權力機構並沒有真正賦予他們職務和權力，但他們卻可以超越制度，對重大決策具有絕對的影響力，也由於他們不是站在權力制度的第一線，權力自然也就不受制度的約束，形成「垂簾聽政」的現象。¹⁶³1980年代，中共對於幹部退休制度的不完善，造成幹部嚴重老化，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且在新老交替的同時，能夠兼顧經驗的傳承，因此在1982年的「十二大」設立了過渡性質的「中央顧問委員會」，¹⁶⁴原先用意是希望老幹部們發揮傳、幫、帶的作用，為一諮詢和協助單位，但卻造就了老人政治的開端，1986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在中央顧問委員會

¹⁶¹ 曹海濤、葉日松，〈中國大陸轉型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與制度變遷〉，《全球政治評論》，第38期，2012年4月，頁131。

¹⁶² 林尚立，〈從中共「十七大」前瞻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東亞研究》，第38卷第1期，2007年1月，頁199。

¹⁶³ 鄭永年，《政治漸近主義：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前景》，頁61。

¹⁶⁴ 根據「十二大」的黨章規定，中央顧問委員會由全體委員選出主任、副主任和常務委員，並報中央委員會批准，主任必須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產生(此條文在「十三大」時被刪除)，中央顧問委員會為有權列席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在中央政治局認為有必要的時候，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全體會議。

副主任薄一波的帶領下，17名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猛烈轟擊當時被冠上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之罪名的胡耀邦，最終迫使胡耀邦辭去總書記，「十三大」後，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增加到200名，儼然成為保守派的大本營。¹⁶⁵1989年的趙紫陽下台和欽定江澤民為接班人都是直接顯示革命元老干政的實例，當時鄧小平多次和這些革命元老商討如何解決學生示威運動和趙紫陽的去留問題，但是這些元老大都不具有黨內職務，也就是說根本不是黨章規定最高領導機關的其中一員，之後商討由江澤民接任的是也是如此。¹⁶⁶1989年11月鄧小平卸下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儘管他曾經說過：「我的份量太重，對黨和國家不利」，¹⁶⁷但憑藉著他的聲望和政治強人身分，雖然僅為一普通黨員，其具有的政治威權仍然足以影響重大決策，1992年1月的一席南巡談話，解決姓「資」、姓「社」問題。這些老政治家憑藉著革命時期累積的政治威望，不斷地干擾政治決策，也形成了許多弊端：（一）派系為主的分裂政治：政治老人在第二線的權力鬥爭，會直接反映到第一線領導人上，對政治運作造成傷害；（二）非責任政治的形成：這些政治老人無正式職務卻擁有掌控權，造成非理性的決策，第一線僅能遵從第二線的決定；（三）形成無效率的被動政府：在權責不清的情況下，第一線領導人無法主動的推行自身的政策理念，只能夠被動遵從政治老人的決策。¹⁶⁸1992年的「十四大」決議廢除「中央顧問委員會」，排除政治元老干政的機會，之後隨著革命元老的逐漸凋零，老人政治的影響力也逐漸消退。

¹⁶⁵ 趙建民，〈對中共「十四大」的權力構想〉，《政治學報》，第20期，1992年12月，頁251。

¹⁶⁶ 這些人分別是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楊尚昆、鄧穎超、薄一波和王震，有中共「八大元老」之稱，當時黨章規定最高領導機關是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休會時由政治局和他的常務委員會行時職權，但這八人之中，僅楊尚昆一人具有上述職務為政治局委員，陳雲為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詳見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128-129。

¹⁶⁷ 蔣益文，〈鄧小平廢除職務終身制始末〉，《共產黨新聞網》，2011年4月6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317188.html>〉。

¹⁶⁸ 鄭永年，《政治漸近主義：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前景》，頁62-63。

第四節 中共菁英甄補之制度性制約

毛澤東曾經談及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必須符合幾項條件：（一）不搞修正主義，是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二）要全心全意為絕大多數人謀取利益；（三）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四）不搞一言堂，必須貫徹民主集中制；（五）勇於自我批評和改正錯誤。¹⁶⁹內容之中均是對於政治思想要路線的要求，未觸及任何制度性的規範，在毛澤東時期，菁英甄補在權力鬥爭的過程中，屬於「贏者全拿」，是一場「零和遊戲」，失敗者是完全退出政治舞台。¹⁷⁰在鄧小平有意的推動下，政治繼承開始有了制度性的規約，學者觀察到，後鄧時期政治菁英的權力鬥爭開始受到三項制約：（一）要維持政治局勢的穩定和確保國家處於統一的狀態；（二）排除一般民眾介入，將權力競爭範圍侷限在「宮廷」之內；（三）降低失敗者必須付出的代價，避免權力競爭成為生死之爭。¹⁷¹

一、幹部「四化」

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黨和國家制度的改革」發表談話：「陳雲同志提出，我們選幹部，要注意德才兼備。所為德，最主要的，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在這個前提下，幹部隊伍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並且要把對於這種幹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¹⁷²

（一）革命化

鄧小平指出「德」就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也就是所謂的「政治正確」。他在1979年11月談及有關選拔接班人問題時，他說：「現在還

¹⁶⁹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1994年），頁11559-1160。

¹⁷⁰ Tsou Tang,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or a Game to Win All?," *The China Journal*, NO.34, July 1995 pp.156.

¹⁷¹ David Bachman, "The Limits to Leadership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32, No.11, November 1992 pp.1051-1053.

¹⁷² 鄧小平，〈黨和國家制度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326。

有少數青年人受四人幫的思想體系的毒害很深，我們絕不能選這種人當接班人，不然會給黨和國家帶來災難。」¹⁷³陳雲也提到：「在文革期間跟隨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份子，及反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中央路線和在經濟領域和其他方面嚴重違法亂紀的人，一個都不能提拔。」¹⁷⁴江澤民認為年輕幹部的選拔標準應該要把政治素質放在首位，政治上要堅定，忠誠於馬克思主義，這樣才能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所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代代相傳。¹⁷⁵2002年7月，中共中央頒布《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第一條便規定，建設一支高素質的黨政領導幹部隊伍，前提是要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念和三個代表。¹⁷⁶2011年7月1日，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的談話表示「用人唯賢，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是故，可以發現提拔幹部的先決條件是必須堅持黨的路線，貫徹黨的信念，符合黨的意識形態，雖然無法量化，但對黨的效忠和服從黨的領導是選拔幹部的第一要件。

(二) 年輕化

年輕化是指對幹部領導班子的年齡結構在老、中、青有適當的比例，呈現梯形狀態，選拔多數中青年幹部來應付第一線的工作。鄧小平在1961年11月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談話，就顯示出他早就注意到提拔年輕人的重要性和需求性，他表示：「很多大學生畢業幾年了，還在當見習技術員，為什麼不大膽的提拔當工程師，世界上的科學家，成名的很多都是在三十幾歲，我們要重視二十幾、三十幾的年輕人，現在再不重視培養年輕人就晚了。」

¹⁷⁷但他在1978年向華國鋒奪取權力進而獲得勝利的重要關鍵之一是重新啟用文革時期受到迫害的老幹部，使得過多的老幹部擔任領導職務，不僅在政

¹⁷³ 同上註，頁222。

¹⁷⁴ 陳雲，〈在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談話〉，《共產黨新聞網》，1982年9月6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78/4493892.html>〉。

¹⁷⁵ 龍飛，〈中共藉「幹部年輕化」推動新老交替〉，《中共研究》，第34卷第8期，2000年8月，頁27。

¹⁷⁶ 胡亞汝，〈中共中央關於印發《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通知〉，《共產黨新聞網》，2002年7月9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71380/102565/182144/10995045.html>〉。

¹⁷⁷ 鄧小平，〈大量提拔年輕幹部〉，《鄧小平文選》（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91。

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省部級以下的各級領導班子也都由老幹部主持，這樣的情況使得幹部年齡結構嚴重老化，也由於他們年事已高，沒有足夠的體能來擔負第一線的工作，造成冗員充斥在各級單位，不利於黨和國家的發展。

¹⁷⁸面對幹部嚴重老化的情形，鄧小平在1979年11月對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幹部會議的談話表示：「因為老幹部有豐富的經驗，所以把老幹部請回來是完全必要而且非常正確的，但是老幹部大多都六十歲左右了，也確實存在著體力不足的現象，所以我們需要選拔一批年富力強的幹部來搞好四個現代化，這是高級幹部的責任，如不能在三幾年內在各階層解決這個問題，之後就更難辦了。」¹⁷⁹1980年2月29日，鄧小平在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請在座同志考慮在下屆的中央委員中選出50個50歲以下的人。陳雲也注意到幹部老化問題，他在1981年5月8日的文稿談到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他認為：「黨的省、地委和政府各部委主要的負責同志多是六十歲以上的幹部，其中不少還是七十幾歲以上，要重視提拔中青年幹部，讓黨的事業後繼有人，避免青黃不接，讓中青年幹部在工作崗位挑起重擔。」¹⁸⁰

1982年2月20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建立老幹部退休制度的決定》，該決定表示為了顧及黨和國家的健全發展，老幹部的離休和退休或退居二線制度必須建立起來，規定：「擔任中央、國家機關部長、副部長，省、市、自治黨委第一書記、書記...等正省部級幹部正職不超過65歲，副職不超過60歲」。但該規定並未全面性和強制性實施，允許例外狀況，¹⁸¹在黨和國家領導人方面，則顧及局勢和需要，必須保留少量超過退休年齡界線但具有豐富經驗的老革命家。¹⁸²同年9月十二屆選出348名中央委員會委員和候補委員，年齡在55歲以下的有112人，1982年底成立省市機構改革領導小組，

¹⁷⁸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78。

¹⁷⁹ 鄧小平，〈高級幹部要帶頭發揮黨的優良傳統〉，《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222。

¹⁸⁰ 陳雲，〈培養中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共產黨新聞網》，1981年5月8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97/4495004.html>〉。

¹⁸¹ 在因為工作需要又身體狀況良好的前提之下，經過組織批准，就算到達退休離休年齡，也可以在一定時間內，繼續擔任領導職務；相反的，因身體狀況不佳，無法正常工作，就算未達年齡界線，也可以提前退休。

¹⁸² 共產黨新聞網，〈中共中央關於建立老幹部對修制度的決定〉，《共產黨新聞網》，1982年2月2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97/4495001.html>〉。

由中央宣傳部部長宋任窮負責，根據統計，至 1985 年底提拔 46.9 萬多中青年幹部，也有近 126.8 萬的老幹部離休。¹⁸³1992 年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積極大膽地做好選拔年輕幹部的通知》進一步要求在黨和政府各級領導班子中，層級越低，領導幹部要越年輕，¹⁸⁴在此之後也多次對幹部年齡做出要求。

在黨的中央領導人部分，不管 1997 年的「十五大」喬石是自願或因權力鬥爭而被迫退休，¹⁸⁵在政治局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建立「七十歲劃線」已成共識，在中央委員方面，年滿 65 歲的正省、部級原則上不擔任十五屆中央委員，不再提名年滿 60 歲的副省、部級幹部，62 歲是新提名的委員之年齡限制。¹⁸⁶2002 年的「十六大」中央委員會委員年齡要求有三項原則：（一）除特殊情況外，連任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年齡須在 64 歲以下；（二）擔任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正省部級官員，年齡須在 62 歲以下；（三）出任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副省部級官員，年齡須在 57 歲以下。此外，還特別要求推舉 50 歲以下的優秀幹部來擔任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結果十六屆的中央委員會有超過五分之一的委員在 50 歲以下。¹⁸⁷必須注意的是，在黨的中央領導人年齡限制方面，僅是做出規範，而非明文規定。中共強調「梯隊接班」的重要性，「梯隊接班」目的是透過有計畫的選拔，磨練中青年幹部，使得權力核心成員的年齡呈現至少兩個層次以上的分佈。

¹⁸³ 熊亮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 中央高層決策選拔年輕幹部內幕〉，《共產黨新聞網》，2009 年 6 月 1 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9391347.html>〉。

¹⁸⁴ 中央國家部委領導要有 1-2 名 50 歲以下幹部；省區市黨委和政府領導班子中，50 歲以下分別要有 3 和 2 名，其中至少各有 1 名 45 歲以下的幹部；地市州黨委和政府領導中，要有 2-3 名 45 歲以下的幹部，其中至少各有 1 名 40 歲以下的幹部；縣市區和政府領導中要有 2-3 名 10 歲以下幹部。詳見共產黨新聞網，〈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積極大膽地做好選拔青年幹部工作的通知〉，《共產黨新聞網》，1992 年 11 月 3 日，〈<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71380/71387/71591/4855070.html>〉。

¹⁸⁵ 關於喬石為何在十五大退休有兩派說法，一方認為喬石是基於政治局常委會的共同利害，及自身權力地位和年齡考量，所以自願在十五大退下來；另一方則認為，江澤民企圖不斷地透過人事安排來打壓和限縮喬石的權力。

¹⁸⁶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 152。

¹⁸⁷ 郭瑞華，〈中共十六大之人事布局分析〉，《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1 期，2003 年 1 月，頁 15。

(三) 知識化

早在毛澤東時期，他也了解到教育工作的重要性，他說：「教育者應當先受教育，這是馬克思說的。我們這些人應當受教育，說不用受教育是站不住腳的。」¹⁸⁸鄧小平在大量起用老幹部後，他了解到這些老幹部不僅年齡已高，無法勝任工作，並且知識水平偏低，他認為唯有提升幹部專業知識和專業能力才能搞好四個現代化建設，辦好學校是培養幹部的最基本建設，因此要求提升領導幹部的教育水準。所謂知識化就是注重領導幹部的知識水準和教育程度，學歷可以作為評量的標準。2002年7月，中共中央頒布《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中規定：「黨政領導幹部一般應當具有大學專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地(廳)、司(局)級以上領導幹部一般應當具有大學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在中央委員會方面，自十二屆到十六屆，大專以上學歷的委員，佔整體委員會的比例一直向上攀升，分別為55.4%、73.3%、83.7%、92.4%、98.6%。¹⁸⁹



(四) 專業化

專業化方面，指的是要求幹部在提升教育水平外，也要具備專業能力，並且能夠讓這些幹部適才適所。因為不同的行業類別，有不同的專業知識存在，所以中共認為實現領導幹部在各自的領域，充實專業知識和技能，才能確保持續邁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標，而「科技官僚」時常作為我們探就領導幹部專業化的面向。中共曾在1995年發起「百千萬工程」計畫，¹⁹⁰目標是到2000年底造就大量的年輕專業人員能夠在專業領域成為頂端人才，類似的計畫仍持續進行。至於海外留學歸國的「海歸派」，中共在提拔這些人時呈現矛盾狀態，這是由於中共擔心他們將西方民主自由思潮帶進內部，所以僅在經濟發展領域方面，重用這些學有專精的人，讓他們可以發揮所

¹⁸⁸ 中共中央組織部編，《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人才》(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2003年)，頁38。

¹⁸⁹ 吳仁傑，〈中共權力繼承機制探討與展望〉，頁50-57。

¹⁹⁰ 「百千萬工程」目標是在2000年底培育出100名45歲左右的人才進入世界科技的頂端；1000名45歲以下的人，成為國內學術和專業技術領域的頂端；10000名30幾到45歲之間，能夠在學科領域裡表現優良的年輕優秀人才。

長；另一方面則避免在有關組織、宣傳、意識形態等政治性較高的領域提拔這些人，整體呈現「既重用又防範」的現象。¹⁹¹

二、任期制

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共就曾考慮建立幹部退休制度，鄧小平認為當時這個問題沒有那麼迫切，但是文革過後，許多幹部也都由壯年時期逐漸老化，如果再不建立幹部退休制度，會造成機構人事臃腫，老幹部不退休，年輕一輩上不來，黨和國家的建設事業將會後繼無人。¹⁹²1980年8月，鄧小平再次談及幹部退休制度問題，他認為：「革命戰爭時期，幹部們年紀都還輕，不存在著退休問題，但不管當時的歷史環境因素允不允許，沒有即時建立幹部退休制度導致領導幹部終身職的形成，這是一個失策。我們要健全幹部選任制度，根據不同的情況，對幹部職務的任期、離休、退休做出明確且適當的規定，任何領導幹部的任職都不能是無期限的。」¹⁹³1982年2月中央發布《關於建立老幹部退休制度的決定》，不僅對領導幹部的退休年齡做出規定，對那些年歲已高又佔據職務的老幹部設立了退場機制。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也先從企業中開始試行領導幹部任期制，並逐漸推廣到黨政機關職能部門，1982年9月的「十二大」黨章規定：「黨的各級領導幹部，無論是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或是由領導機關任命的，他們的職務都不是終身的，都可以變動或解除」，另外為了協助幹部退休制的建立和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決議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作為過渡時期的機構，以期望在新老交替之際，發揮經驗傳承。1992年11月的十三屆五中全會決議接受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當時鄧小平說：「退就要真退，這次就要百分之百地退下來。」¹⁹⁴若回頭來看，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並沒有任期限制，不管是

¹⁹¹ 寇健文，〈既重用又防範的菁英甄補：中共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與侷限〉，《中國大陸研究》，第50卷第3期，2007年9月，頁19。

¹⁹² 鄧小平，〈高級幹部要帶頭發揮黨的優良傳統〉，《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226。

¹⁹³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331。

¹⁹⁴ 蔣益文，〈鄧小平廢除職務終身制始末〉，《共產黨新聞網》，2011年4月6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317188.html>〉。

受天安門學生運動事件的影響或是鄧小平的個人意志，他決定主動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一職，對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頗有以身作則的感覺。

2000年6月中共中央發布《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綱要》，規定「實行黨政領導職務任期制，縣以上的黨委、政府工作部門和其他工作機構的委任制領導幹部，也要逐步實行任期制」；¹⁹⁵2002年7月的《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規定「聘任制的領導職務任期不超過五年，但可以連續聘任」、「地方黨委、政府領導成員在同一職位上任職滿十年，必須交流」；2006年8月的《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規定》更是清楚的規定適用範圍和任期時間(表 2-3)，是中共實行領導幹部任期制的一大發展。

至於中共領導人任期制的規定，主要是著重在於國家機關方面，1982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副委員長、國家正副主席、國務院正副主席、國務院正副總理、國務委員等職務，任期5年，連續任職不得超過2屆，到目前為止，沒有出現例外情形，因此在國家機關領導人的任期制是可以確立的。¹⁹⁶雖然中共在黨的領導人任期部分尚未有明文規定，但是寇健文從任期保障和任期限制來分析黨務機關領導人任期制的發展：(一)任期保障：指的是除非死亡外，領導人至少任滿一屆，不會異動。若以政治局常務委員來看，十四屆至十六屆任滿率皆到達100%，不同以往容易因權力鬥爭而被迫中途離職；(二)任期限制：分析十一屆以來的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委員任職情況後，同一職務任期最長不超過十年是逐漸存在的事實。¹⁹⁷

¹⁹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深化幹部人事改革綱要》，2000年6月，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0/content_60412.htm>。

¹⁹⁶ 王似華，〈以制度化觀點分析「十四大」以來中共政治局常委之建構〉，《中共研究》，第46卷第2期，2012年2月，頁64。

¹⁹⁷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203-210。

表 2-3 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與交流工作規定

| 《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 | 《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規定》 |
|---|--|
| <p>適用範圍：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的工作部門和工作機構的正職領導成員；縣級以上地方黨委、政府領導成員，紀委、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正職領導成員；省(自治區、直轄市)、市(地、州、盟)黨委、人大常委會、政府、政協的工作部門和工作機構的正職領導成員。</p> <p>主要內容：職務任期為 5 年，除達退休年齡、健康因素、不稱職、自願、引咎或責令辭職、受處分、被罷免、工作需要等因素外，應任滿一期。在同一職位連續任職達到兩個任期或同一層次領導職務累計達 15 年，皆不再推薦、提名或任命擔任同一(層級)職務。若任期內調整職務，原任職 3 年以上計算為 1 個任期。</p> | <p>適用範圍：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的工作部門和工作機構的領導成員，上述工作部門和工作機構的內設機構的領導幹部；中央紀委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副職領導成員及其機關內設機構的領導幹部；縣級以上地方黨委、人大常委會、政府、政協及其工作部門和工作機構的領導成員，上述工作部門和工作機構的內設機構的領導幹部；縣級以上地方紀委和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領導成員及其機關內設機構的領導幹部。</p> <p>主要內容：縣級以上地方黨委、政府正職領導成員及其他領導成員，紀委、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黨委、政府部分工作部門的正職領導成員，擔任同一(層次)領導職務滿 10 年者，必須交流。</p> |

資料來源：新華網，〈授權發佈：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規定〉，〈授權發佈：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新華網》，2006 年 8 月 6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8/06/content_4926300.htm>。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8/06/content_4926453.htm>。

三、集體領導

為了解決一元化領導造成權力集中在個人身上的「家長制」，也為了掃除文革時期以來的個人崇拜歪風，1980 年 8 月 18 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主張權力不宜過分集中，因為這會妨礙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黨的

民主集中制的實行，個人過於專斷，不僅使得集體智慧無法發揮，也會阻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發展，另一方面，如果兼職、副職過多也會助長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的盛行。¹⁹⁸鄧小平說：「各級黨委要真正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責任相結合的制度。要明確哪些問題應當由集體討論，哪些問題應當由個人負責。重大問題一定要由集體討論和決定。決定時，要嚴格實行少數服從多數，一人一票，每個書記只有一票的權利，不能由第一書記說了算。集體決定了的事情，就要分頭去辦，各負其責，絕不能互相推諉。」¹⁹⁹所以他主張施行「集體領導、分工合作責任」制，重大決策必須集體決定，同時為預防集體領導造成議而不決，無人負責的狀況，領導成員間要分工合作，並擔負起個人責任。²⁰⁰現行黨章規定：「任何黨員不論職務高低，都不能個人決定重大問題，不允許任何領導人實行個人專斷和把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中共在各級單位施行集體領導、分工責任制，包括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也是如此，「十三大」時，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分別由趙紫陽以總書記身分負責全面工作、李鵬負責國務院、喬石負責政法、胡啟立負責文宣、姚依林負責經濟，集體領導、分工負責的運作方式一直延續至今，原則上委員之間有各自負責的領域，彼此都不能藉故侵犯他人工作範圍的權力，分工之下可以避免因工作而引發衝突，也能消除權力過於集中個人的情形。另外，政治局常務委員之間在各有所司及負責對象為政治局的情況下，個人之間只是工作性質和角色的不同，彼此之間無權力大小之分，也無上下隸屬關係，對集體領導制的確立和執行有所保障。²⁰¹若以結果論來看，綜觀中共現今政治情勢，集體領導制也符合當今的政治現實，因為毛、鄧之後的領導人，都不可能再具有毛澤東那樣的絕對權威或鄧小平那樣的相對權威，所以他們沒有逕行決策的能力，因此在遭遇重大問題時，必須透過集體協商模式來決定。

另外，中共在集體領導原則下，強調須要有領導核心的存在。鄧小平曾說過：「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

¹⁹⁸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頁 321。

¹⁹⁹ 同上註，頁 341。

²⁰⁰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 93。

²⁰¹ 朱新民，《1978~1990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八十年代以後中國政治的發展》，頁 84。

第一代集體領導的核心是毛主席。因為有毛主席做領導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沒有把中國共產黨打倒。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因為有這個核心，即使發生了兩個領導人的變動，都沒有影響我們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始終是穩定的。進入第三代的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同志們要以高度的自覺性來理解和處理這點。要有意思地維護一個核心，也就是現在大家同意的江澤民同志。」²⁰²關於領導核心問題，鄭永年認為這是因為中共在沒有民主政治的情況下，權力必須集中在每一政治派別上，亦或某一政治派別佔有主導地位，否則將會在權力運作中出現僵局的情形。²⁰³因此，江澤民在鄧小平的登高一呼之外，也透過權力運作或權力鬥爭來達到實質上的鞏固權力，在江澤民主政時期，中國官方媒體習慣用「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來稱呼他，2002年11月，胡錦濤自江澤民手中接下總書記一職，但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仍就是江澤民，這段期間，中國官方媒體對他的表述一直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2004年9月，江澤民卸下中央軍委主席改由胡錦濤接任，這時胡錦濤才能以黨、政、軍最高領導人的身分，進行全面性地鞏固權力，直自2005年2月，官方色彩濃厚的中央電視台首次以「核心」來稱呼胡錦濤，立即引發各界的關注，評析胡錦濤的權力地位是否趨向穩固，²⁰⁴僅是用詞問題。就能受到這麼大的注目，也讓人了解到中共權力運作的不透明和封閉性。中共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張希賢認為，從「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轉變為「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說法，顯現出中國共產黨中央集體領導未來發展的方向。²⁰⁵

²⁰² 陳思名，〈實現黨中央領導集體的順利過渡〉，《共產黨新聞網》，2009年2月17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43371/8818514.html>〉。

²⁰³ 鄭永年，《政治漸近主義：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前景》，頁64。

²⁰⁴ 高毅，〈胡錦濤在兩會前被稱為黨領導“核心”〉，《BBC中文網》，2005年2月28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4300000/newsid_4306300/4306321.stm〉。值得關注的是，中共官方媒體在那次之後，還是鮮少使用核心來稱呼胡錦濤，自今為止，胡錦濤是否為第四代核心也一直是被爭論的問題，值得進一步分析。

²⁰⁵ 楊琳，〈走向成熟的集體領導制度〉，《求是理論網》，2011年6月27日，〈http://www.qstheory.cn/zz/zgtsshzyll/201106/t20110627_89303.htm〉。

四、政治經歷

中共建政初期，在面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層面急需重建的壓力下，為了有利於社會的穩定、政權的鞏固和政令的貫徹，同時為了防止地方分散主義趁勢抬頭，乃因此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政府，若環顧當時的客觀因素，這是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²⁰⁶但中共與地方之間的關係，在施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開始出現了變化，過去是由中央權力一把抓的高度集權狀態，為了經濟改革順利，開始對地方下放權力，與地方分權。

中國改革的成功在於鄧小平時代為了發展經濟所推行的改革開放政策，過程之中，中央政府將經濟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大力發展經濟時，一方面可以為地方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中央也時常將地方經濟的成績看作為地方官員政績的表現，地方官員可藉此增加政治籌碼，²⁰⁷大規模的分權運動不僅存在於經濟層面，也進一步影響了政治層面。在改革中，地方政府前所未有的獲得了一些政治資源和實際利益，特別是經濟較發達的省級地方，不僅和中央有了討價還價的空間，部分地區也獲得了地方立法權，隨著幹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差額選舉制度的實行，地方和群眾因素對重要幹部任免的影響權重明顯加大。²⁰⁸1980年代初期，改革派取得主導地位，在幹部新老交替之際，開始在地方領導階層部屬具有改革思想的新進幹部，不久過後，具地方經歷的改革派人士在中央占有優勢地位。1987年的「十三大」首次有地方省級黨委書記進入政治局，分別為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四川省委書記楊汝岱。相較以往，地方因素對菁英甄補越來越重要。²⁰⁹

由於中共現在的政治菁英都不具有豐富的革命經驗，因此，近年來中共開始將選拔幹部的標準放在地方治理能力，在地方財經和治理績效優異者，

²⁰⁶ 謝慶奎、楊鳳春、燕繼榮，《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頁 52。

²⁰⁷ 鄭永年，《江澤民的遺產：在守成和改革之間》（新加坡：八方文化，2002年），頁 151。

²⁰⁸ 朱光磊，《中國政府與政治》，頁 397。

²⁰⁹ 吳國光、鄭永年，《論中央-地方關係：中國制度轉型中的一個軸心問題》（香港：牛津大學，1995年），頁 111。

其具有的地方歷練，將成為進入中央領導階層的優勢條件。²¹⁰相反地，任職於中央且中央有意栽培的具發展潛力之幹部，也會刻意將之下放地方，歷經地方事務的磨練，提升治理能力和累積實務經驗，根據觀察，在經濟和邊防等重要省份擔任領導職務者，更有機會進入中央決策體制裡。²¹¹除此之外，寇健文觀察過去 20 幾年來的中共中央菁英甄補情況後發現，中共領導人跳脫正省部級經歷和跳脫中央委員歷練，直接擔任政治局委員的情形都逐年降低，甚至完全沒有，整體甄補過程出現「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階梯式發展規律。²¹²



²¹⁰ 陳陸輝、陳德昇、陳奕伶，〈誰是明日之星？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的政治潛力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55 卷第 1 期，2012 年 3 月，頁 5。

²¹¹ 陳德昇，陳陸輝，〈中共「十七大」政治菁英甄補與地方治理策略〉，頁 80。

²¹²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 212。



第三章 鄧後中共政治局之人事甄補

菁英論者認為，由於社會存在著權力分配不均的普遍現象，往往出現由菁英獨佔權力的情形。正因為如此，國家是否存在一個穩定、有效的「菁英流動」機制便顯得相當重要。各社會階層的組成分子若能垂直向上流動，皆有機會獲得政治階層中的職務，政治群體不僅能夠藉由新血的加入而產生活化的效果，亦有助於國家維持穩定發展的方向。²¹³鄧小平也曾說：「思想路線、政治路線要靠組織路線來保證，路線確立了，要由人來具體貫徹執行。」兩者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皆強調人事甄補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性。

中國共產黨 5 年一次的全國黨員代表大會，不僅攸關未來 5 年的政治發展方向，更重要的是權力核心的人事安排，因為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中共統治中國社會最重要的兩項工具。因此，本章將探究中共過去權力核心人事甄補的情況，以了解中共在安排權力體系人事時，有何規範可循。

第一節 中共「十四大」之人事安排

一、政治情勢與人事安排

「十四大」召開前夕，中共正面臨內外情勢交迫的局面。1991 年蘇聯解體後，中共面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式微的衝擊，黨內保守派人士為免西方社會透過各種方式「和平演變」中國共產社會，開始鼓吹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和改革派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相互對壘，中共內部「左」、「右」路線彼此對立，掀起姓「資」還是姓「社」的論爭。²¹⁴自 1978 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施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共內部對於此政策路線的爭論一直不曾斷過。思想傾「左」的人大肆批評「改革開放」所規畫的經濟特區和引進外資來活絡經濟發展等措施，是讓資本主義找到機會進入中國社會。這

²¹³ 黃信豪，〈改革開放時期中共黨政菁英的結構與輪替：回顧與前瞻〉，徐斯勤、陳德昇主編，《中共「十八大」政治繼承：持續、變遷與挑戰》（台北：印刻文學，2012 年），頁 33。

²¹⁴ 康橋，〈對中共「十四大」中共領導人事調整之分析〉，頁 25。

也使得「改革開放」一路走來不斷受到嚴重的干擾，也對貫徹「改革開放」路線造成了阻礙。²¹⁵

是以「六四事件」之後，保守派勢力逐漸壯大，不僅掌握了宣傳和組織部門，國務院和經濟部門也受保守派的掌控，他們高唱「反和平演變論」，提出「特區租界論」和「鳥籠經濟論」，²¹⁶主張要有限制的開放，而非全面改革開放，也主動挑起「姓資姓社」的問題，使得中共在經濟、政治和文化領域面臨全面向「左」轉的危機，這些行動和言論威脅與違背「十三大」以來的「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造成改革開放停擺，經濟發展停滯的後果。²¹⁷除此之外，保守派也企圖取得「十四大」人事的主控權，要求在「十四大」讓一批革命後代進入中央接班。²¹⁸

面對此一形勢，鄧小平為了避免意識形態的分歧進而激化派系的權力鬥爭，導致政局動盪不安，也為了能夠確保他一手策劃的思想路線、政策路線和組織路線能在「十四大」再次獲得肯定，並且能夠持續一百年不變，鄧小平決定主動出擊，解決紛爭。²¹⁹鄧小平在1992年年初，由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楊尚昆的陪同下，南巡視察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期間發表諸多談話，他重申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他說：「從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公有制仍是主體，特區姓“社”不姓“資”。」他還說：「對改革開放，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不爭論是為了爭取時間幹，要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同時強調改革開放的重要性，他認為：「改革開放是中國唯一的出路，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條，誰不改革，誰就會被打倒。」關於路線問題，他說：「短

²¹⁵ 方國平，〈中共「十四大」述評〉，《共黨問題研究》，第18卷第11期，1992年11月，頁1。

²¹⁶ 陳雲曾經將市場經濟和計畫經濟比喻為鳥和籠子的關係，他說：「我們要防止在搞活經濟中，出現擺脫國家計劃的傾向。搞活經濟是在計劃指導下搞活，不是離開計劃的搞活。這就像鳥和籠子的關係一樣，鳥不能捏在手裡，捏在手裡就會死，要讓牠飛，但只能讓牠在籠子裡飛。沒有籠子，牠就飛跑了，如果說鳥是搞活經濟的話，那麼，籠子就是國家計劃」。詳見葉永烈，《陳雲全傳：鄧小平時代的第二號人物》（台北：周知文化，1995年），頁266。

²¹⁷ 中共1989年的GDP增長率從上半年度的11.3%降至4.8%，1990年再降至3.8%。詳見阮銘，《鄧小平帝國30年》（台北：玉山社出版，2009年），頁206。

²¹⁸ 韓文甫，《鄧小平傳—治國篇》（台北：時報文化，1993年），頁846。

²¹⁹ 吳安家，〈中共「十四大」前的政治情勢〉，《中國大陸研究》，第35卷第10期，1992年10月，頁6。

短幾十年內，國家發展得這麼快，使人民高興，世界矚目，這就足以證明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誰想變也變不了。」他認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思想解放，才不會犯大錯。」²²⁰這一系列的談話都顯示出鄧小平對於當時中共內部思想傾向保守者的做法，頗為不滿，也反映出鄧小平對於改革開放停滯的不耐，讓鄧小平不得不採取主動姿態，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對當權者施壓，以突破當前的僵局。²²¹

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在中共建軍六十五周年紀念會上發表〈肩負起為國家改革和建設保駕護航的崇高使命〉一文，內容強調「在改革和建設的過程中，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但主要還是“左”的框框阻礙思想解放，軍隊要肩負起保駕護航的使命，防止和克服這方面的干擾和影響。」²²²在握有軍權的楊氏兄弟之「保駕護航」下，使得原本對於鄧小平的「南巡談話」採取抵制態度的保守派人士承受很大的壓力，不得不紛紛轉向，開始擁護起「南巡談話」，先前也談「反和平演變」的江澤民、李鵬在對內對外的談話中也改變了原先對「南巡談話」的冷漠態度，轉變為對「南巡談話」的積極支持和擁護，這也使得持續堅持「改革開放」成為共識。²²³

1992年10月12日，中共召開第十四屆全國黨員代表大會，總結「十二大」以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經驗，把鄧小平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其所堅持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以及鄧小平長期以來的改革理念和政策路線等各項主張，載入中共黨章，奠定了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定位，也確立鄧小平理論作為中國共產黨思想指導的最高原則；另一方面，江澤民在「十四大」所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是以鄧小平的

²²⁰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70-375。

²²¹ 中共研究雜誌社社論，〈改革論揭開「十四大」序幕戰〉，《中共研究》，第26卷第2期，1992年2月，頁3。

²²² 李久義，〈中共十四大前夕政局情勢〉，《共黨問題研究》，第18卷第9期，1992年9月，頁4。

²²³ 中共研究雜誌社社論，〈中共「十四大」前黨內兩派的動向〉，《中共研究》，第26卷第8期，1992年8月，頁7。

「改革開放」理論作為基石，²²⁴這都顯示出鄧小平路線成功擊退以陳雲為首的保守派之「鳥籠經濟」理論，也代表著改革派在此次會議取得優勢地位。

225

「十四大」的召開除了要確立中共未來政治和政策路線的發展，另一個重點是人事上的安排。鄧小平曾說：「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關鍵在人。」²²⁶基於政治路線確定後必須有組織路線來確保政治方針能夠得以貫徹執行，加上這可能是鄧小平最後一次主導黨的代表大會，故中共對於「十四大」的人事安排極為謹慎。²²⁷針對過去中共政治傳承的不順和經濟改革搖擺不定的政治經驗，「十四大」的權力安排有幾項主軸：（一）穩固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階層，讓江澤民從「形式接班」到「實質接班」，確保後鄧小平時期的政局能夠趨向穩定，避免動盪；（二）選拔一批能夠切實執行鄧小平路線的執政班子，以便鞏固和發展以經濟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三）完成世代傳承、新老交替的任務，以期克服過去兩次權力繼承安排失敗和改革遭受阻礙的困境。²²⁸1992年10月19日的十四屆一中全會，甄補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朱鎔基、劉華清、胡錦濤等7人為政治局常務委員，包括上述7人在內的政治局委員為丁關根、田紀雲、李嵐清、李鐵映、楊白冰、吳邦國、鄒家華、陳希同、姜雲春、錢其琛、尉健行、謝非、譚紹文等，溫家寶、王漢斌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十四大」時，黨、政、軍各系統的領導人重新進入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表3-1)，在此之後，總書記、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固定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已成慣例。²²⁹

²²⁴ 方國平，〈中共「十四大」述評〉，頁4-5。

²²⁵ 阮銘，《鄧小平帝國30年》，頁213。

²²⁶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380。

²²⁷ 康橋，〈對中共「十四大」中共領導人事調整之分析〉，頁25。

²²⁸ 趙建民，〈對中共「十四大」的權力構想〉，頁243。

²²⁹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141。

表 3-1 中共第十四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 姓名 | 出生年/年齡 | 學歷 | 重要職務 | 原職 |
|-----|---------|----------------|--------------------------|---------|
| 江澤民 | 1926/66 | 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 | 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 | 政治局常委 |
| 李鵬 | 1928/64 | 莫斯科電力學院水力發電系 | 國務院總理 | 政治局常委 |
| 喬石 | 1924/68 | 華東聯合大學文學系肄業學習 |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 政治局常委 |
| 李瑞環 | 1934/58 | 北京建築工程業餘學院 | 全國政協主席 | 政治局常委 |
| 朱鎔基 | 1928/64 | 清華大學電機系 | 國務院副總理 | 候補中委 |
| 劉華清 | 1916/76 | 蘇聯海軍指揮學院 | 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 | 中顧委 |
| 胡錦濤 | 1942/50 | 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 | 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 | 中央委員 |
| 丁關根 | 1929/63 | 交通大學運輸管理學系 | 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 政治局候補委員 |
| 田紀雲 | 1929/63 | 商業會計專科學校(中學程度) |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 政治局委員 |
| 李嵐清 | 1932/60 | 上海復旦大學企管系 | 國務院副總理 | 候補中委 |
| 李鐵映 | 1936/56 | 捷克布拉格卡里士大學物理系 | 國務委員兼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 | 政治局委員 |

| | | | 員會主任 | |
|-----|---------|------------------|-------------------------|-------|
| 楊白冰 | 1920/72 | 延安抗日軍政大學 | 無其他重要職務 | 中央委員 |
| 吳邦國 | 1941/51 | 清華大學電子學系 | 上海市委書記 | 中央委員 |
| 鄒家華 | 1926/66 | 莫斯科包曼高等工業學院機械製造系 | 國務院副總理 | 中央委員 |
| 陳希同 | 1930/62 | 北京大學中文系肄業 | 北京市委書記 | 中央委員 |
| 姜春雲 | 1930/62 | 大學函授學習，自修中國語言文學 | 山東省委書記 | 中央委員 |
| 錢其琛 | 1928/64 | 蘇聯中央團校結業(大學程度) | 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 | 中央委員 |
| 尉健行 | 1931/61 | 大連工學院機械系 |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 中央委員 |
| 謝非 | 1932/60 | 高中文化程度 | 廣東省委書記 | 中央委員 |
| 譚紹文 | 1929/63 | 西北工學院紡織工程系 | 天津市委書記 | 中央委員* |
| 溫家寶 | 1942/50 | 北京地質學院地質構造專業研究生 |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 中央委員 |
| 王漢斌 | 1925/67 | 西南聯大歷史系 | 全國人大常委會 | 中央委 |

| | | | | |
|--|--|--|------|---|
| | | | 副委員長 | 員 |
|--|--|--|------|---|

註1：粗體字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按排名順序呈現，其餘為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劃排列，後兩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另外，譚紹文的中央委員身分是在當屆取得。註2：中國共產黨5年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在進行人事改組後，也會牽動隔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全國政協）之政府機關人事調整，因此本表所呈現的職務，時間點以1993年3月31日「兩會」結束後為準。

資料來源：整理自吳安家，〈中共「十四大」後的政治動向〉，《中國大陸研究》，第35卷12期，1992年12月，頁7-8；王玲玲，〈中共政權機構人事改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36卷5期，1993年5月，頁16-20。

二、人事佈局之意涵分析

（一）確立「江李體制」

江澤民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後，臨危受命由地方首長躍升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一直以來被視為過渡性的政治領袖，由於和華國鋒有不少相似之處，甚至被認為有可能是華國鋒第二(表3-2)。

表3-2 華國鋒與江澤民相似處比較表

| | 華國鋒 | 江澤民 |
|-----|------------------------------|-----------------------------|
| 相似處 | 在毛澤東搞掉了親自挑選的兩個接班人之後成為第三個接班人 | 在鄧小平罷黜了自己指定的兩個接班人之後成為第三個接班人 |
| | 原為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從地方領導人躍升到中央接班 | 原為上海市委書記，從地方領導人躍升到中央接班 |
| | 在1976年為悼念周恩來的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後確立接班地位 | 在1989年為悼念胡耀邦的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確立接班地位 |
| | 曾經身兼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 | 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共中央軍 |

| | |
|----------------------|-------------------|
| 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等黨政軍最高領導人 | 委主席、國家主席等黨政軍最高領導人 |
|----------------------|-------------------|

資料來源：吳國光，王兆軍，《鄧小平死後的中國—解析十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台北：世界書局出版，1995年），頁7。

江澤民初期權力基礎的不穩固，必須倚靠鄧小平登高一呼「江澤民為第三代核心」，以弭平黨內強硬派不服氣的氣氛，未料江澤民上台之後一度向強硬派靠攏，啟用思想傾「左」的人士為智囊，左派人士掌握組織宣傳大權，這些人提倡「反和平演變」。²³⁰有「左」王之稱的鄧力群等左派人士肆無忌憚地批評鄧小平的「不管黑貓白貓，能抓到老鼠就是好貓」理論，他們認為：「貓論的根本要害是不講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讓資產階級的實施和平演變戰略有可乘之機。」²³¹之後《人民日報》在江澤民、李瑞環要求修改後，仍舊刊出一篇內容強調改革開放中要問「姓資姓社」的文章，²³²江澤民也曾指責《人民日報》未能精準傳達他的語意，也未能準確地宣傳和體現黨的路線和方針。²³³鄧小平對此情形非常不滿意，在南巡期間直言不諱地說出：「誰不改革誰下台」之重話，但鄧小平也明白「六四事件」後，保守勢力崛起，掌握意識形態部門，組織大權旁落，致使情勢所迫，並非江澤民真正是一位思想極度保守，路線傾「左」者。²³⁴加上「南巡」之後江澤民急速轉彎緊跟鄧小平路線，不僅化解了此次政治繼承危機，也讓鄧小平明白加速協助鞏固江澤民為第三代領導核心是當務之急。「十四大」後一些保守派人士如《人民日報》社長高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王忍之、國務院文化部代部長賀敬之等人都被排除在中央委員會之外。²³⁵

²³⁰ 吳國光，王兆軍，《鄧小平死後的中國—解析十個生死攸關的問題》，頁10-12。

²³¹ 韓文甫，《鄧小平傳—治國篇》，頁847。

²³² 李久義，〈中共十四大後的權力結構述析〉，共黨問題研究編輯委員會主編，《中共十四大綜合研究》（台北：法務部，1993年），頁32。

²³³ 韓文甫，《鄧小平傳—治國篇》，頁847。

²³⁴ 阮銘，《鄧小平帝國30年》，頁212。

²³⁵ 吳安家，〈中共「十四大」後的政治動向〉，頁13。

李鵬 1928 年生於上海，父親李碩勳是中共早期領導人，曾與周恩來、朱德等人一起領導和參與南昌暴動。1989 年的天安門學潮運動越演越烈，身為國務院總理的李鵬簽署戒嚴令和將其視為動亂和支持武力鎮壓的看法，一直讓李鵬有形象不佳的問題，但如果沒有當時中共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最後拍板定案，軍隊是不可能進入北京執行戒嚴鎮壓行動。²³⁶因為其和鄧小平採取一致的立場，使得「六四事件」既是他的包袱，也是他的保護傘，當時海外盛傳李鵬因形象不佳，將被撤換的可信度令人存疑，²³⁷因為對中共而言，如果推翻原本定調天安門學潮為動亂的論調，將會付出相當大的代價。雖然李鵬為保守派，對改革開放不夠積極，但鄧小平「南巡」之後，情勢轉變，李鵬在出席日內瓦世界經濟論壇和聯合國首腦會議上，強調「絕不會改變十多年來由鄧小平所倡導的改革開放方針，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經濟發展、社會繁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精神面貌的巨大變化。」²³⁸此外，李鵬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平衡點，由李鵬續任總理是鄧小平和陳雲考量派系平衡彼此妥協折衷下的結論，以求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²³⁹

雖然「十四大」前，有關江澤民和李鵬將下台的傳聞甚囂塵上，但最終「十四大」仍然維繫了江、李的實質權力架構，這或許是鄧小平有鑑於權力繼承安排的不易，不願再次見到如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垮台的局面。²⁴⁰即使鄧小平對第三代領導階層所表現出「穩定有餘，開創不足」的情形不甚滿意，但兩人並未犯下大錯，加上黨內暫時也無替代人選，最終在權力平衡的考量下，「十四大」仍維持「江李體制」的不變。²⁴¹

²³⁶ 許志嘉，〈六四天安門事件決策過程與大陸民主化前景〉，《東亞季刊》，第 31 卷第 2 期，2000 年 4 月，頁 34。

²³⁷ 高新、何頻，《誰領導中國：最有權力的 24 個人》（香港，明鏡，1998 年），頁 193。

²³⁸ 中共研究雜誌社社論，〈改革論揭開「十四大」序幕戰〉，頁 4。

²³⁹ 韓文甫，《鄧小平傳—治國篇》，頁 868；吳安家，〈中共「十四大」前的政治情勢〉，頁 10。

²⁴⁰ 趙建民，〈對中共「十四大」的權力構想〉，頁 244。

²⁴¹ 王玲玲，〈中共「十四大」人事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36 卷第 1 期，1993 年 1 月，頁 23。

(二) 新老交替

「十四大」在逐步建立幹部退休制度的背景下，同意不再設立由政治老人盤據的中央顧問委員會，是實現新老交替，世代傳承的重要發展。十三屆的政治局委員姚依林、宋平、萬里、李錫銘、楊汝岱、吳學謙、楊尚昆、秦基偉等人皆因年齡因素退出權力核心。²⁴²十四屆政治局的人數也出現變動，和1989年6月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後的政治局相較，²⁴³政治局常委會的人數由6人增至7人，全體政治局成員的人數(包含候補委員)由15人增至22人，22人之中除江澤民、李鵬、喬石、李瑞環、丁關根、田紀雲和李鐵映外，其餘15人為新任者，新人比例高達68.2%，有相當大的換血幅度。十四屆和十三屆的政治局常委會平均年齡相差無幾，分別為63.7歲和63.6歲，但若從整體政治局平均年齡來看，則由十三屆的64.1降至62.1歲，政治局常委中超過70歲者僅劉華清1人，為76歲，最低齡的是年僅50的胡錦濤，²⁴⁴政治局委員吳邦國及候補委員溫家寶也在50歲上下，3人屬於「年富力強」的第四代。



(三) 協助江澤民鞏固權力

「十四」大的人事安排另一個受矚目的便是「楊家將」勢力的削弱。楊尚昆因年齡因素退出政治局，楊白冰雖然名義上竟升為政治局委員，但他卻接連被解除中央軍事委員會秘書長、總政治部主任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等三項職務，已經無法再掌握軍權。1989年的「六四事件」後，楊氏兄弟的勢力迅速膨脹，在軍中大搞派性，而楊白冰在軍內無實質功績卻能掌握大權以軍委秘書長身分，控制軍中人事安排，大量調整和安插自己的親信，已經引起許多老紅軍的不滿與不服氣，消息自然傳到鄧小平耳裡，鄧小平驚覺「楊家將」有野心，除了順應老紅軍的要求外，也有平衡軍中派系的考量，加上鄧

²⁴² 王玲玲，〈中共「十四大」人事之分析〉，頁17。

²⁴³ 1987年11月的十三屆一中全會原本選出的5人為政治局常務委員，分別是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姚依林。但1989年的「六四事件」後，趙紫陽和胡啟立被免去職務，1989年6月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政治局常務委員，之後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變為6人。

²⁴⁴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141。

小平不願意見到在他百年之後出現第二個林彪，把持軍權進而干預政事，決定削弱「楊家將」在軍中的勢力。²⁴⁵

在中共提倡新老交替、幹部年輕化的背景下，卻安排年齡高達 76 歲的軍事將領劉華清進入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特別引人關注。若是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組成分子來看，主席為江澤民，兩位副主席一是劉華清，另一位是年齡也高達 78 歲的張震，顯然有其特別的意涵。劉華清出身於「第二野戰軍」，和鄧小平關係深厚，是鄧小平的親信，接受過現代化軍事教育，對軍隊事務極為熟悉，個人政治色彩不濃，原為中央顧問委員會的一員；張震長期擔任中共國防大學校長，負責培育軍事幹部，對共產黨有極高的忠誠度。²⁴⁶兩人在「十四大」被委以重任，有著諸多意義：（一）兩人皆為鄧小平信賴的人，在「黨指揮槍」的原則下，是鄧小平為協助江澤民鞏固權力之安排；（二）有別於楊氏兄弟，強調軍中不搞宗派，不擴大自身權力；（三）取代楊氏兄弟在中央決策的力量；（四）由於兩人皆年事已高，且不具政治野心，未來不會有出現軍事強人的可能性。²⁴⁷

（四）提拔改革勢力

隨著在經濟政策上緊跟陳雲的宋平和同屬保守派的姚依林離任，十四屆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李鵬是明顯的保守派外，江澤民傾向為中間溫和派，新面孔中的胡錦濤、朱鎔基和劉華清皆是服膺於鄧小平改革開放理念的幹部，另外其餘兩人是李瑞環和喬石，他們也都具改革思想，形成保守勢力頓減，改革勢力上升的局面。²⁴⁸胡錦濤原本是中央委員，在「十四大」直接連跳兩級，躍至政治局常務委員，在施行幹部年輕化政策的背景和兩次接班失敗的陰影下，加上地方工作經驗良好和宋平的推薦而受到賞識，是中共特意提拔的「跨世紀接班人」，在「十四大」的權力安排中特別引人注目。

²⁴⁵ 韓文甫，《鄧小平傳—治國篇》，頁 873。

²⁴⁶ 龍飛，〈從中共「十四大」看中共軍事未來走向〉，《中共研究》，第 26 卷第 11 期，1992 年 11 月，頁 84。

²⁴⁷ 吳安家，〈中共「十四大」後的政治動向〉，頁 16；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 144。

²⁴⁸ 王玲玲，〈中共「十四大」人事之分析〉，頁 14。

另一位值得關注的是朱鎔基。朱鎔基原本只是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在「十四大」一舉躍過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等職務，直接連升三級被提拔為政治局常務委員，是鄧小平為成就改革開放特意拔擢的人選。朱鎔基長期在中共國家經濟委員會工作，1987年任上海市市委副書記，1988年任上海市市長，1989年「六四事件」後，江澤民接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朱鎔基接任其原先的上海市委書記一職，1991年的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中被補選為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的「上海經驗」對其仕途有相當大的幫助，上海一直是中共的經濟重鎮，中央財政有很大的部分來至上海，在鄧小平實行改革開放後，透過優惠財政稅收等其他措施，以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上海是中國經濟的門戶，對於在上海施行改革開放有著不容失敗的壓力，因此中共決定借助朱鎔基的經濟長才，來發展上海經濟。朱鎔基在上海的諸多作為都頗受好評，其中包括浦東開發計劃，以技術人才、教育人才和良好的基礎建設成功吸引外資，在上海期間也與江澤民保持一定的默契，都為朱鎔基的仕途打下良好的立基。²⁴⁹

1991年3月，上海《解放日報》接連刊出兩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分別為〈改革開放應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義要更強些〉，內容直接引用鄧小平的話，與「六四」以來保守言論充斥形成強烈的對比，保守派認為「皇甫平」文章的發表是鄧小平的旨意，但上海《解放日報》如果沒有取得當時為上海市委書記朱鎔基的認可，是不可能刊出這樣的文章，在這之中朱鎔基勢必扮演這相當重要的角色，²⁵⁰「皇甫平」的文章成為之後鄧小平「南巡」的開路先鋒。鄧小平對朱鎔基的工作和能力也頗為讚賞，鄧小平曾公開稱讚朱鎔基是懂經濟的人，²⁵¹因此，朱鎔基在「十四大」的晉升，躍過了鄒家華，成為國務院的第一副總理，被認為將和李鵬分掌國家經濟工作，甚至當時許多人也開始探討起朱鎔基將在「十四大」隔年的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取代李鵬成為總理的可能性。²⁵²

²⁴⁹ 鄭永年，《朱鎔基新政—中國改革的新模式》（新加坡：八方文化，1999年），頁30及42。

²⁵⁰ 韓文甫，《鄧小平傳—治國篇》，頁842。

²⁵¹ 王玲玲，〈中共「十四大」人事之分析〉，頁16。

²⁵² 龍飛，〈中共「十四大」重要人事安排預測〉，《中共研究》，第26卷第8期，1992年8月，頁

(五) 地方勢力進入中央

「十四大」的人事安排有另一項趨勢，就是地方黨政領袖進入中央決策體系。總計有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天津市委書記譚紹文、山東省委書記姜春雲、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和廣東省委書記謝非。沿海城市因為改革開放取得績效而進入權力核心體系，顯示出中央對地方經濟發展的重視，亦有鼓勵其他省份加強經濟建設之用意。²⁵³對中央而言，這些地方首長有著從事對外開放和經濟改革的實際經驗，對改革與開放的經濟問題有較清楚的認識，有助於提升中央處理經濟事務的能力和改善中央與地方長期緊張的關係。²⁵⁴

中共在推行經濟上的開革開放後，使得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開始產生變化，權力下放後，地方的自主權大增，在財政上，中央必須仰賴地方的稅收，使得地方有了較大的發言權，中央對地方的規範也相對減弱，在中央要控制地方，地方要中央分權的情況之下，將地方幹部拔擢至中央，不僅可以顯示出中央對地方關係的重視，也有著相互平衡的用意存在。²⁵⁵

第二節 中共「十五大」之人事安排

一、政治情勢與人事安排

中共內部意識形態的分歧並未隨著鄧小平「南巡談話」和「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後而消弭。強如鄧小平具有高度政治威信的領袖，也不免遭逢路線之爭，到了江澤民時期，自然也無法避免。對中共而言，將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人民的思想觀念、行為規範、價值體系也將隨之改變，勢必會對中共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領域造成影響，這是一場深刻的社會大變動，必須揚棄舊思維、舊方法才能做到。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私營經濟的成分必然會逐漸增加，對一直以來堅持公有制的中共而

²⁵³ 吳安家，〈中共「十四大」後的政治動向〉，頁 14。

²⁵⁴ 王玲玲，〈中共「十四大」人事之分析〉，頁 17。

²⁵⁵ 趙建民，〈對中共「十四大」的權力構想〉，頁 255。

²⁵⁶ 方國平，〈中共「十四大」述評〉，頁 6。

言，是一道必須解決的難題，²⁵⁶這也讓「左」派勢力找到機會，想藉此趁勢回潮反撲。

鄧力群在1995年11月發表一篇「萬言書」，他對當時中國大陸的財產制提出質疑，呼籲中央要小心私有制的過度膨脹，對資產者和資產階級自由化份子有合流傾向的情形提出警告，他還大力抨擊中共幹部只知道發展經濟，以為一切資本主義方式都是好的，而忽略了政治辨別能力和敏感性的重要，內容多所否定改革開放。²⁵⁷屬中共意識型態領域元老的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繩也提出一篇名為〈關於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幾個問題〉的文章，他說：「有人否定馬克思主義是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說現在沒有階級和階級鬥爭了，這是不對的，從過去的分析來看，歷史是離不開階級的，分析世界形勢也不能離開歷史，否則就會變成赫魯雪夫和戈巴契夫，這是不對的。」他還說：「我們要弄清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問題。社會主義總是不斷發展，不會停止。共產主義是有意義的，公有制比私有制高，公有制還要向前發展，我們的目標是共產主義，並向全世界推行公有制。」他還對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意見，他說：「現在有人說社會主義社會出現了一個新階段，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不能視而不見，認為沒有問題。」²⁵⁸對此，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邢貴思說：「有些同志寫了一些長篇東西對我們的現行政策進行批評，特別是對鄧小平理論不以為然，這顯示出黨內外對於當前所處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之認識還不是很一致，這是一個很深刻的問題。」²⁵⁹雖然這股「左」派勢力對意識形態的挑戰，不如過去路線鬥爭那樣激烈，但有鑑於過去胡耀邦和趙紫陽皆受「左」、「右」之害，中箭落馬，使得江澤民也不得不謹慎應付。

²⁵⁶ 吳安家，〈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後的政治動向〉，《中國大陸研究》，第37卷第1期，1994年1月，頁14-15。

²⁵⁷ 郭錫蝦，〈「江核心」權力結構面臨挑戰〉，《共黨問題研究》，第23卷第2期，1997年2月，頁10。

²⁵⁸ 龍飛，〈江澤民能否穩妥順利接班？—從中共歷次安排接班人失敗談起〉，《中共研究》，第30卷第3期，1996年3月，頁15。

²⁵⁹ 趙建民，〈評中共「十五大」〉，《共黨問題研究》，第23卷第9期，1997年9月，頁2。

江澤民為了鞏固他在詮釋意識形態和穩固自身權力的核心地位，必須採取一些措施。首先，他在1995年9月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後，發表名為〈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中談到在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必須以鄧小平同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妥善處理改革、發展和穩定的關係、速度和效益的關係、經濟建設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係、不同產業的關係……等十二項，²⁶⁰用以解決發展過程中所遭遇的矛盾和問題，作為重新建構意識形態的第一步，後被視為江澤民論「十二大關係」，有人將之看作宣告江澤民時代的來臨。²⁶¹

另外，面對「左」派勢力不斷對其理論和思想的挑戰，江澤民則強調幹部要首重「講政治」。他說所謂「政治」指的是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紀律、政治鑑別力和政治敏銳性。他要求黨員要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要保持頭腦清醒，以免在鬥爭中迷失了方向。²⁶²江澤民要求幹部「講政治」頗有統一思想的意涵，加強「江核心」的權威，並期望壓制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漸抬頭的地方主義，建立個人理論權威體系，並以政治手段控制軍隊，以期能夠落實組織路線和提升黨中央權威。

²⁶³

江澤民自「十四大」以來一直遵循鄧小平「惕右防左」的原則，不斷強調要高舉鄧小平理論奮勇前進，在「十五大」召開前，1997年5月29日在中央黨校的談話更說：「除了鄧小平理論，沒有別的理论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²⁶⁴事實上在1997年2月中，鄧小平去世後，中共黨內出現了一股反思鄧小平理論的思潮，對江澤民而言，為了使「十五大」能夠順利召開，以助於權力結構調整能夠平順，確保改革開放的不變和穩定發展，他必須在「十五大」前盡可能的統一黨內思想，消除干擾的雜音。「五·

²⁶⁰ 江澤民，〈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新華網》，1995年9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3/15/content_2700833.htm〉。

²⁶¹ 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頁129。

²⁶² 江澤民，〈幹部一定要講政治〉，《共產黨新聞網》，1995年9月27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86/4494287.html>〉。

²⁶³ 龍飛，〈江澤民能否穩妥順利接班？—從中共歷次安排接班人失敗談起〉，頁16。

²⁶⁴ 方靜，〈中共十五大與黨的團結〉，《中共研究》，第31卷第8期，1997年8月，頁26。

二九」長篇談話中，圍繞著四項要點：（一）鄧小平的旗幟不能丟、不能改；（二）中國仍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會有很多問題發生是很自然的；（三）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要繼續；（四）黨內要維持團結一致，保持「不爭論」的狀態。²⁶⁵這篇在「十五大」召開前的「五·二九」談話也成為「十五大」政治報告的主軸。1997年9月12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十五屆全國黨員代表大會，江澤民在會中報告的主題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報告內容強調鄧小平理論作為思想指導的重要性，並正式將「鄧小平理論」²⁶⁶抬升至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同等的地位，並寫入黨章。

「十五大」上還有一項重大的變革，就是打破一直以來的公有制和私有制之爭，並為長期虧損的國營企業導入股份制，這些措施被譽為是中共「第三次思想解放」。江澤民在「十五大」的報告中雖然仍舊強調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但也承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過程中，必須接受多種所有制的存在，制定公有制和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的方針。對於導入股份制，他認為：「這是一種現代企業的資本組織形式，不僅有助於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更有利於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這些變革頗有為鄧小平去世之後黨內再度存在路線的分歧，作一總結性的澄清，若從這個角來看，「十五大」無疑具有正本清源的效果。

事實上，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高速成長，個體工商戶、私有資本型企業也跟著快速發展，它們所創造的產值和上繳的稅金也都急遽增加，這些屬於非計劃經濟活動發展的趨勢已經越來越不可能扭轉，也改變了原本的社會結構，形成「計劃」和「市場」二元體系並立的混合秩序結構。²⁶⁷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在堅持實行「計劃經濟」的情形下，未能自主經營，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社會需求，而非創造利潤，在抱著「吃大鍋飯」的經營態度

²⁶⁵ 龍飛，〈從「北戴河會議」看中共「十五大」部署〉，《中共研究》，第31卷第8期，1997年8月，頁31。

²⁶⁶ 「十四大」時，只是將鄧小平長期以來的思想論述納入黨章，但內容並未出現「鄧小平」三個字，「十五大」時則是正是使用「鄧小平理論」為名寫入黨章。

²⁶⁷ 楊開雲，〈中共十五大之後的制度改革與社會變遷：一個「新制度論」的觀察分析〉，陳永生主編，《十五大後中國大陸的情勢》（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8年），頁313。

下，出現了發展停緩、生產效率低落、勞動效率低落的情形，²⁶⁸長期下來使得國營企業普遍虧損連連，在不堪負荷的情形下，爆發工人失業和下崗數量暴增的問題。這些隨著經濟發展所衍生的一連串問題，都與主張社會主義公有制，以及強調無產階級工人之崇高地位的共產黨教義理念格格不入，迫使中共在面臨路線受質疑的情形下，不得不提出變革來宣示和澄清。²⁶⁹

在人事方面，自江澤民上任以來，即透過人事調整來鞏固權力。尋求政局穩定和團結一直是江澤民自「十四大」以來為了鞏固接班地位的首要目標，中共中央不斷的呼籲要「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全黨要緊跟「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來加強江澤民統治的地位。同時，江澤民也透過人事改組的過程中，來穩固他在中央的領導地位。原十四屆政治局委員譚紹文在1993年2月逝世，使得政治局出現空缺，隨後1994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十四屆四中全會，會議上進行人事調整，決議增補黃菊為政治局委員，增補吳邦國和姜春雲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其中黃菊、吳邦國兩人和江澤民一樣來自上海，分別為上海市市長和上海市委書記，如同先前所述，江澤民在此時期提拔了一批他在上海的舊部屬到中央任職，逐漸成形的上海勢力已不容忽視。

1995年4月底，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因其部屬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涉入周北方的經濟犯罪案並飲彈自盡而引咎辭職，這是江澤民藉「反腐肅貪」打擊政敵，進而鞏固權力，樹立威信的重要作為。北京向來有「獨立王國」之稱，毛澤東在和劉少奇的權力鬥爭時，一篇意有所指的「海瑞罷官」被視為文革導引線之文章在毛澤東的授意下，華東各省皆有轉載，惟獨在北京受到冷落，長達十幾天沒有刊載，劉少奇和當時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反而對全黨提出：「學術批判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軍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令毛澤東相當惱火，他批判彭真的作為具有「反黨」思想，他說：「北京市委一根針也插不進去，一滴

²⁶⁸ 葉章美，〈中共十五大後之國有企業改革〉，陳永生主編，《十五大後中國大陸的情勢》(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8年)，頁153。

²⁶⁹ 趙建民，〈中共十五大的政治經濟分析〉，陳永生主編，《十五大後中國大陸的情勢》(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8年)，頁56。

水也滴不進去」。²⁷⁰事實上，這和中共過去缺乏一套完整且透明公正的幹部選拔、考核制度有關，由於地域意識和封建思想的關係，使得地方領袖用人唯親，依靠人際關係形成盤根錯節的權力關係網路，時間久了不免存在結黨營私的現象，加上中央對地方實施分權，使得地方勢力逐漸壯大，有了和中央抗衡的力量，中央對地方的約束也就不那麼有效。

陳希同早年在北京從副市長秘書做起，在北京的經歷已長達 40 餘年，尤其是北京市委書記當了 10 年，許多幹部都是由他一手提拔，加上 1989 年的「六四事件」時，和鄧小平、李鵬採取一致的立場，在權力關係網路中和中央有了連結，都逐漸壯大陳希同的勢力，進而出現挑戰江澤民權威的情形。對於江澤民啟用多位和他一樣來自上海的幹部，陳希同說：「黨向來是搞五湖四海的，不能成為一個地方的幫派。」另外，江澤民自「十四大」後不斷地透過黨的機器，向全黨宣傳「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以鞏固領導地位，陳希同對此情形又曾意有所指的說：「個人領導權威不是靠人為樹立起來的，而必須得到大多數人的擁護和承認。」對江澤民來說，陳希同儼然成為他的頭號政敵，因此江澤民藉陳希同涉入貪汙案來對其整肅，不僅可以藉反貪樹立個人權威，也對長期以來的「反江勢力」作殺雞儆猴的效果，進而鞏固江的領導權威。²⁷¹

隨著陳雲、姚依林、鄧小平、彭真等政治老人逐漸凋零，使得 1997 年 9 月的「十五大」權力重組受到關注。因為這是首次在沒有政治老人的「協助」下進行人事改組，尤其是沒有政治強人鄧小平的主導，讓人們開始關心鄧小平之後的中國該往哪走？大多數人都認為「十五大」是一個新時代的開起，但也因為對新時代的不確定性而讓「十五大」的政治方向和高層權力結構重組特別引人注目。²⁷²另外，「十五大」的權力重組還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必須對之後的權力繼承作預先安排，同時又要兼顧穩定第三代的統治地

²⁷⁰ 中共黨史網，〈點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中共黨史網》，〈<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4/5206586.html>〉。

²⁷¹ 龍飛，〈中共政權爭奪戰提前曝光—從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辭職說起〉，《中共研究》，第 29 卷第 5 期，1995 年 5 月，頁 23。

²⁷² 吳國光，《逐鹿十五大：中國權力棋局》（台北：遠景，1997 年），頁 90。

位，使得人事上的安排，所要考量的因素更加複雜，也更受重視。²⁷³1997年9月19日的十五屆一中全會選出江澤民、李鵬、朱鎔基、李瑞環、胡錦濤、尉健行、李嵐清等7人為政治局常委，包含上述7人在內的政治局委員為丁關根、田紀雲、李長春、李鐵映、吳邦國、吳官正、遲浩田、張萬年、羅幹、姜春雲、賈慶林、錢其琛、黃菊、溫家寶、謝非等22人，曾慶紅和吳儀兩人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表3-3)。從職務分工來看，如同「十四」大時，總書記兼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全國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皆擔任政治局常委，此外，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也依循「十二大」模式，重新進入政治局常委會。²⁷⁴

表 3-3 中共第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 姓名 | 出生年/年齡 | 學歷 | 重要職務 | 原職 |
|-----|---------|------------------|--------------------------------------|-----------|
| 江澤民 | 1926/71 | 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 | 中共中央委員 會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共中央 軍委主席 | 政治局常 委 |
| 李鵬 | 1928/69 | 莫斯科動力學院水 力發電系 | 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長 | 政治局常 委 |
| 朱鎔基 | 1928/69 | 清華大學電機系 | 國務院總理 | 政治局常 委 |
| 李瑞環 | 1934/63 | 北京建築工程業餘 學院 | 全國政協主席 | 政治局常 委 |
| 胡錦濤 | 1942/55 | 清華大學水利工程 系 | 中央書記處常 務書記、中共中 央黨校校長、國 | 政治局常 委 |

²⁷³ 楊開煌，《新政：胡錦濤時代的政治變遷》(台北：海峽學術出版，2007年)，頁118。

²⁷⁴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151。

| | | | | |
|-----|---------|----------------------|--------------------------|-----------|
| | | | 家副主席 | |
| 尉健行 | 1931/66 | 大連工學院機械系 | 中共中央紀律 檢查委員會書 記 | 政治局委 員 |
| 李嵐清 | 1932/65 | 上海復旦大學企管 系 | 國務院副總理 | 政治局委 員 |
| 丁關根 | 1929/68 | 交通大學運輸管理 學系 | 中共中央宣傳 部部長 | 政治局委 員 |
| 田紀雲 | 1929/68 | 商業會計專科學校 (中學程度) | 全國人大常委 會副委員長 | 政治局委 員 |
| 李長春 | 1944/53 | 哈爾濱工業大學電 機工程系 | 廣東省委書記 | 中央委員 |
| 李鐵映 | 1936/61 | 捷克布拉格卡里士 大學物理系 | 中國社會科學 院院長 | 政治局委 員 |
| 吳邦國 | 1941/56 | 清華大學無線點子 學系 | 國務院副總理 | 政治局委 員 |
| 吳官正 | 1938/59 | 清華大學動力系研 究生 | 山東省委書記 | 中央委員 |
| 遲浩田 | 1929/68 | 解放軍軍事學院合 成系 | 中共中央軍委 副主席 | 中央委員 |
| 張萬年 | 1928/69 | 解放軍南京軍事學 院基本系 | 中共中央軍委 副主席 | 中央委員 |
| 羅幹 | 1935/62 | 民主德國富萊堡礦 冶學院機械鑄造系 | 國務委員、中共 中央政法委員 會書記 | 中央委員 |
| 姜春雲 | 1930/67 | 大學函授學習，自 修中國語言文學 | 全國人大常委 會副委員長 | 政治局委 員 |

| | | | | |
|-----|---------|---------------------|-----------------|---------|
| 賈慶林 | 1940/57 | 河北工學院電力系 | 北京市委書記 | 中央委員 |
| 錢其琛 | 1928/69 | 蘇聯中央團校結業 (大學程度) | 國務院副總理 | 政治局委員 |
| 黃菊 | 1938/59 | 清華大學電機系 | 上海市委書記 | 政治局委員 |
| 溫家寶 | 1942/55 | 北京地質學院地質 構造專業研究生 | 國務院副總理 | 政治局候補委員 |
| 謝非 | 1932/65 | 高中文化程度 | 全國人大常委 會副委員長 | 政治局委員 |
| 曾慶紅 | 1939/58 | 北京工業學院自動 控制系 | 中共中央辦公 廳主任 | 中央委員* |
| 吳儀 | 1938/59 | 北京石油學院石油 煉製系 | 國務委員 | 中央委員 |

註1：粗體字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按排名順序呈現，其餘為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劃排列，後兩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曾慶紅的中央委員身分是在當屆取得。

註2：職務以1998年3月「兩會」結束後為準。

資料來源：新華網，〈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網址：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1/content_698625.htm(檢索日期2012/10/27)；國立政治大學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網址：

<http://ics.nccu.edu.tw/chinaleaders/index.htm>(檢索日期2012/10/27)。

二、人事佈局之意涵分析

(一) 穩定為主的人事改組主軸

此屆的政治局人數再次出現異動，政治局委員(不包含政治局候補委員)人數由20名增加2名，為22名，但政治局常委依舊維持7人，候補委員依舊是2人。十四屆的喬石、劉華清、鄒家華、楊白冰、王漢斌(候補委員)，皆因年齡因素退出政治局，另外，陳希同也因案去職，未能連任。全體政治

局成員 24 人中僅 8 人為新人，新人比例僅 33.3%，與十四屆新人比例的 68.2% 相差甚遠，此外，這屆的政治局常委也都是原先十四屆的政治局委員連任或升任，沒有出現「破格拔擢」的情形，這都顯示出十五屆的政治局人事改組趨向保守，以穩定為優先考量。

在年齡方面，「十五大」閉幕後，日本媒體旋即以「年輕化」為主軸來報導黨員代表大會上所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委員，但隨即的十五屆一中全會選出政治局成員後，「年輕化」的字眼就悄悄地消在報導之中，這是因為此屆的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齡為 65.4 歲，反而高於十四屆的 63.7 歲，包含候補委員的全體政治局委員平均年齡為 63.1 歲，也是高於十四屆的 62.1 歲。²⁷⁵ 其中除胡錦濤外，其餘政治局常委皆在 65 歲以上，也造就「十六大」必須大幅改組的結果。在「知識化」方面，和十四屆相同，具有大專以上的文化程度皆在 90% 以上，比較明顯的差異是在專業背景方面，具高級工程師職稱或工程師職稱佔全體政治局成員 62.5%，高於十四屆的 45.4%，頗有「專家治國」的形勢。²⁷⁶ 若以學識領域來看，除兩位軍事將領外，具有大學學歷的政治局委員，幾乎清一色皆出身自然科學背景。另外，在中國高等院校林立的情形下，政治局中，竟然有 5 人來自清華大學，使得「清華幫」的成形令人矚目。²⁷⁷

（二）朱鎔基出任總理

朱鎔基在「十四大」後就一直被視為國務院總理的熱門人選，但是 1993 年 3 月的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國家主席江澤民的提名下，全國人大的表決下，李鵬依舊順利連任國務院總理一職，維持「江李體制」的不變。但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1982 年所制定的憲法規定：「國務院總理任期

²⁷⁵ 根據日本學者垂水健一的探究，事實上，十五屆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平均年齡也與十四屆相差無幾，僅略為年輕，之所以會出現強調「年輕化」的形容，是因為在年齡結構上的變化，十五屆的中央委員，45 歲以下有 21 人，比十四屆多了 7 人。詳見垂水健一，〈第十五屆中國共產黨大會後的情勢：向中央反映地方意見的趨勢〉，陳永生主編，《十五大後中國大陸的情勢》（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8 年），頁 35-36。

²⁷⁶ 高新，何頻，《誰領導中國：最有權力的 24 個人》，頁 29。

²⁷⁷ 楊開煌，《新政：胡錦濤時代的政治變遷》，頁 125。

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相同，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也就是說，自 1988 年就開始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到 1998 年 3 月的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已經連續任職滿兩屆，必須卸下國務院總理一職改由他人擔任。

事實上，自「十四大」後，江澤民、李鵬和朱鎔基三人就處在一種既緊張又合作的微妙關係之下。首先是江澤民和李鵬的關係變化，江澤民在 1989 年開始將任總書記初期，正值保守派當道，處於弱勢領導的江澤民不得不向其靠攏而必須向同屬保守勢力的李鵬尋求結盟，因為在這個時期，李鵬是威脅江澤民地位的頭號人物；但是到了「十四大」後，情勢改觀，江澤民在鄧小平的協助下，逐漸掌握黨政軍等系統，統治地位也漸趨穩固，反而是李鵬必須維持跟江澤民的統一戰線來穩固地位。²⁷⁸在朱鎔基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之後，就逐漸代替李鵬掌管經濟事務方面的權力，一般認為朱鎔基意志堅強，處事風格嚴肅又嚴謹，為了維護中央經濟權威採取不受歡迎的措施，不畏觸怒地方官僚體系，也因此使得他得罪各方利益團體，但他在清理三角債、遏止泡沫經濟、提升外匯存底及在不影響經濟成長率下，有效地控制通貨膨脹等事務都足以證明他的經濟能力，也使得他獲得各界的贊賞，²⁷⁹這也使得朱鎔基被視為李鵬卸任後，國務院總理的不二人選。

而江澤民對朱鎔基則呈現「既重用又防範」的情形，兩人在上海共事時，雖然談不上關係融洽，但也不至於交惡。1993 年李鵬在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繼任國務院總理不久後，出現身體微恙，休養了一段時間，這時整個國務院的日常工作皆由朱鎔基負責，當時中國正處於經濟各方面發展過熱，不斷加劇通貨膨脹，造成金融秩序混亂，朱鎔基在江澤民的支持下，在地方勢力出現反彈的情況下，果斷的對中國經濟採取「宏觀調控」，經過一段時間的整頓之後，終於使得過熱的經濟成功「軟著陸」。²⁸⁰這件是足以證明兩人是可以合作的。回顧當時的情勢，朱鎔基出任國務院總理對江澤民而言是利大於弊，一方面江澤民可以依靠朱鎔基的經濟長才來提升其執政體系

²⁷⁸ 吳國光，《逐鹿十五大：中國權力棋局》，頁 26。

²⁷⁹ 鄭永年，《朱鎔基新政－中國改革的新模式》，頁 49。

²⁸⁰ 任慧文，《中南海跨世紀領導層》（台北：遠景，1998 年），頁 174。

處理經濟問題的能力，也可以顯示出江澤民對經濟改革的決心；²⁸¹另一方面，若從菁英互動的角度來看，讓朱鎔基擔任總理可以制衡李鵬在國務院的勢力，同時朱鎔基是由鄧小平提拔的，但鄧小平已經逝世，朱鎔基的權力基礎相對脆弱，再加上當時中國面臨許多發展經濟後所產生的一連串問題，對於已經處於主導地位的江澤民來說，讓朱鎔基擔負第一線的工作，所有風險皆加注在朱鎔基身上，一旦發生經濟危機，朱鎔基可能會成為江澤民的犧牲品。²⁸²朱鎔基在1998年3月的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國務院總理，原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轉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依舊是第二，形成「江李朱」體制。

（三）「石落江更平」，建立「七十歲劃線離退」先例

雖然喬石在「十四大」後，轉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並將原先主持的政法工作交由尉健行和任建新負責，一度被認為權力遭到削弱，但尉健行和任建新都曾在喬石領導下政法系統下工作，若從權力關係網路來看，喬石反而是權力擴大，²⁸³再加上喬石在黨內資歷完整，過去長期主持政法工作，而政法工作掌有情治公安系統，是共產國家施行高度控制式社會所不可缺少的統治工具，不僅如此，喬石還曾擔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中共中央黨的建設工作小組組長，負責組織和思想事務，他建立的權力關係網路不容小覷，所以一直被視為江澤民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但他在「十五大」連中央委員都沒被提名，是這屆權力核心人事改組最受關注的變動。

喬石在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時，便不時強調「依法治國」的重要性，似乎有意擺脫全國人大只是黨的橡皮圖章之角色。喬石在1996年12月接受美國《費城詢問報》的採訪時，談到黨和全國人大的關係時，他特別引用過去鄧小平的論述，喬石認為黨的工作和國家機關的工作應該有所界線，黨組織關於國家事務的重大決策，凡事應由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事

²⁸¹ 趙建民，〈中共十五大的政治經濟分析〉，頁59。

²⁸² David Bachman 著，張鐵志、林葦芸譯，〈鄧後中國的政治衝突模式〉，頁73。

²⁸³ 李久義，〈中共十四大後的權力結構述析〉，頁30。

項，都要經全國人大或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法定程序變成國家意志。事實上，自喬石上任全國人大委員長以來，便採取多項措施來突顯全國人大的法制和監督功能。²⁸⁴另一方面，身為全國政協主席的李瑞環也有意強化「政協」的作用，他提倡「政協」應該充分發揮功能，進一步行使參政議政和監督執政黨、政權的工作。²⁸⁵針對這種情形，江澤民曾說：「要注意防止把政協變成西方國家上議院的傾向，鄧小平同志在1982年就說過，我國絕不能搞成兩個權力、監督機構。」²⁸⁶江澤民也在「十五大」政治報告中，再次強調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不管如何，喬石和李瑞環皆有意提升其所職掌的機構之功能定位，挑戰「江核心」所強調之「黨的領導」，期望發揮制約「江李體制」的功能。²⁸⁷

喬石在擔任全國人大委員長期間的作為，顯示出他是江澤民的主要競爭對手，但他在「十五大」的離退引發諸多揣測，主要可以分為權力鬥爭和自願引退兩個切入點。首先，從權力鬥爭的角度來分析，喬石對江澤民一直存有挑戰關係，在「十五大」前的「北戴河會議」因為對高層人事的調動無法取得共識而使得兩人之間的衝突更加白熱化。原因在於任職連續滿兩屆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因為受到憲法規定而必須離任，但李鵬又不願離開權力核心，所以他覬覦喬石全國人大委員長的職務，遂使江李兩人便聯手以「年輕化」為題，逼退已經73歲的喬石，但喬石在這次的權力鬥爭並非沒有收穫，由他推派的改革者田紀雲繼續保有政治局委員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職位，另一方面，原先江澤民想讓自己的親信擔任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但最後依舊由屬於喬石系統的尉健行擔任，同時尉健行在「十五大」進入政治局常委會。²⁸⁸另一方面，從自願退休的角度來看，喬石曾表示有意繼續擔

²⁸⁴ 任慧文，《鄧後權力交班內幕》（台北：書華出版社，1997年），頁128。

²⁸⁵ 郭錫嘏，〈江澤民與大陸反對勢力的鬥爭〉，《中共問題研究》，第23卷第12期，1997年12月，頁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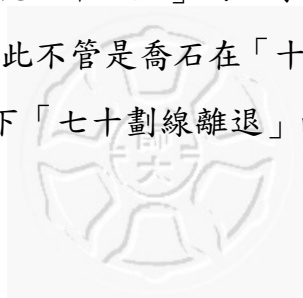
²⁸⁶ 龍飛，〈中共政權爭奪戰提前曝光—從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辭職說起〉，頁30。

²⁸⁷ 吳國光，《逐鹿十五大：中國權力棋局》，頁50。

²⁸⁸ Lowell Dittmer 著，張鐵志、林葦芸譯，〈中國新領導—從分工、政治背景、與政策傾向評量〉，頁57-58。

任全國人大委員長，但是若不能繼續擔任，則希望自己「全退」。²⁸⁹曾經傳言將恢復的黨主席、副主席制沒有成真，喬石本身也反對個人凌駕於黨的情形再次出現，在高層對於李鵬在「十五大」的出路找不到共識的情況下，喬石為顧全大局，自願從權力核心退下同時他以「年紀因素」離退也將對在「十六大」時，面臨年事已高的權力核心人物如江澤民、李鵬、朱鎔基等人產生約制，使他們無法再尋求下一任。²⁹⁰最後，若喬石沒有意願退休，過程不會如此平和，加上喬石的支持者也無明顯的反對動作，使得是喬石主動去職也具說服力。²⁹¹

早在「十五大」前，就有香港媒體率先披露「北戴河會議」對領導人年齡規範達成共識，會中決議「黨政軍領導同志，年齡在 65 歲或以上，原則上不擔任十五屆中央委員；年齡在 70 歲或以上，原則上不擔任十五屆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²⁹²在檢視「十五大」的人事安排後，顯示出年齡限制的規範應該是具體存在的，因此不管是喬石在「十五大」的離退是因權力鬥爭或是自願退休，他的確立下「七十劃線離退」的先例，是中共政治繼承制度化的重要發展。²⁹³



(四)軍人退出政治局常委會

原本的政治局常委兼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華清因年事已高，再加上已經完成輔佐江澤民鞏固權力的「階段性任務」，因此在「十五大」時退出政治局，但令人關注的是，並未在政治局常委會補進同樣具備軍人身分的委員，而是只讓具軍人身分的張萬年和遲浩田擔任政治局委員，使得「十五大」的政治局常委會沒有軍人代表，這是中共建政以來，首次出現的狀況。

²⁸⁹ 龍飛，〈從「北戴河會議」看中共「十五大」部署〉，頁 37。

²⁹⁰ 楊開煌，《新政：胡錦濤時代的政治變遷》，頁 126。

²⁹¹ 垂水健一，〈第十五屆中國共產黨大會後的情勢：向中央反映地方意見的趨勢〉，頁 44。

²⁹² 在 1997 年 9 月的「十五大」政治局委員當中，江澤民是 71 歲，為唯一一位超過 70 歲的人，針對此種情形，出現兩種解釋：一是據說江澤民曾在 1997 年 9 月會見日本首相竹下登時作出解釋，江澤民說：「1 月到 6 月止，上半年出生的領導人算實足年齡，7 月以後的下半年出生者則減一歲計算，若按照這個算法他是 70 歲」；另一種解釋是，江澤民雖然超過 70 歲，但江澤民是第三代的核心理人物，為了政局穩定，江澤民不宜在此時變動職務。同上註，頁 44。

²⁹³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 151。

對江澤民而言，他沒有如毛、鄧二人那樣的個人特質、過去也無實質的革命成就，加上他是文人出身，過去和軍方也沒有什麼淵源，致使他無法掌握軍權，就「槍桿子出政權」的角度來看，也讓他的權力地位一直處在不穩固的狀態。就個人特質、革命經歷和關係網路三項之中，唯一能夠改變的就屬最後一項，當江澤民集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於一身時，他可以利用這些職位所賦予他的權力來改善他和軍方的關係。²⁹⁴自「十四大」後，江澤民便不斷要求軍隊要堅持服從黨的絕對領導，並對軍隊加強宣傳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建軍思想，企圖利用毛、鄧兩人在軍中的威信，以樹立自己在軍隊的領導地位，同時他也透過對軍人授予軍銜、提高軍人待遇和軍事預算，頻繁地視察部隊以收攬軍心、調動軍事將領以建立在軍中的勢力等實際作為來掌握軍權。²⁹⁵「十五大」中沒有軍人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使得江澤民以中央軍委主席身分成為軍方在政治局常委會的唯一代表，一方面顯示出中共「以黨領軍」的傳統，也足以說明江澤民已經能夠掌控軍權，已經不需要軍權扶持，²⁹⁶另一方面，雖然這是中共建政以來首次沒有軍人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但有助於釐清軍人和文職人員的「軍文關係」，避免軍人過度介入國家事務，也可以進一步確立「文人領軍」的原則。²⁹⁷

此外，這次江澤民拔擢張萬年和遲浩田進入政治局，並且擔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更是在1999年6月由江澤民授予上將軍銜，在人際關係網絡上，他們是江澤民的「扈從者」，更有利於江澤民掌控軍隊勢力。另外，由張萬年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而遲浩田擔任國防部長，加上兩人資歷相若，可以相互制衡，避免出現軍事強人，也有助於改善「十四大」時兩位軍委副主席地位不對等的情况。²⁹⁸

²⁹⁴ Ellis Joffe 著，張鐵志、林葦芸譯，〈人民解放軍和政治〉，田弘茂、朱雲漢編，《江澤民的歷史考卷》（台北：新新聞文化，2000年），頁118。

²⁹⁵ 文沁，〈對江澤民營植共軍領導地位之研析〉，《中共研究》，第27卷第9期，1993年9月，頁59。

²⁹⁶ 趙建民，〈中共十五大的政治經濟分析〉，頁58。

²⁹⁷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頁155。

²⁹⁸ 「十四大」時的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為劉華清和張震，劉華清在黨內的職務是政治局常務委員，但張震在黨內沒有內何重要職務，出現權力不平衡的現象。

(五) 地方代表增加

原本「十四大」政治局的地方代表有上海市委書記吳邦國、天津市委書記譚紹文、山東省委書記姜春雲、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和廣東省委書記謝非，但譚紹文在 1993 年過世，吳邦國和姜春雲兩人在 1994 年的十四屆四中全會上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翌年皆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已經不再擔任地方黨委書記，而陳希同在 1995 年因貪汙案辭職下台，使得十四屆中政治委員出任地方黨委書記的僅剩廣東省委書記和途中增補的上海市委書記黃菊，地方勢力大幅消退。而在十五屆一中全會上，「兩會」召開進行人事異動之前，以地方黨委書記出任政治局委員的有河南省委書記李長春、山東省委書記吳官正、北京市委書記賈慶林、上海市委書記黃菊和廣東省委書記謝非。²⁹⁹其中新任政治局委員的李長春、吳官正和賈慶林更具有兩地的省級行政經驗（省委書記、省長）。³⁰⁰



第三節 中共「十六大」之人事安排

一、政治情勢與人事安排

中共長期以來是依靠「經濟成長」和「意識形態」作為其政權統治的合法性來源基礎。前者容易受世界經濟情勢的影響，加上發展經濟的過程也會產生諸多問題，因此要持續維持高速的經濟成長是不太容易的；而後者對中共而言則是「兩面刃」，它既可以形成很大的合法性來源基礎，但有時候也會轉變成對政權的挑戰。³⁰¹因此，中共必須在政治實踐層面不斷地調整現存的統治合法性基礎，根據客觀情勢的變化也迫使他們必須這麼做，誠如上面所說的，決定經濟是否能夠持續高速發展的因素非常複雜，往往也不是人為

²⁹⁹ 1997 年「十五大」後的隔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委（全國政協），進行人事調整，謝非因為年齡限制，不再擔任廣東省委書記，轉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而廣東省委書記一職改由原河南省委書記李長春轉任。

³⁰⁰ 李長春在「十五大」召開之前，曾任遼寧省長和河南省長、省委書記；吳官正曾擔任江西省長、省委書記和山東省委書記；賈慶林曾任福建省委書記、北京市市長。

³⁰¹ 徐斯儉，〈十六大前後中國的政治改革動向〉，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文化，2003 年），頁 139。

所能操控，加上中共也似乎無意透過政治民主化來做為其統治合法性的基礎，因此唯一能夠調整的便是「意識形態」層面，對中共而言，一旦「意識形態」瓦解，將會出現統治危機。³⁰²

一直以來，中共的意識形態總是在「共產主義」和「發展經濟」兩者之中，產生左右為難的困境。共產主義有礙於經濟發展，但又不能拋棄，因為它是中共「統治的理論合法基礎」；但也不能不發展經濟，因為自改革開放後，發展經濟就做為中共「統治的現實合法基礎」。另一方面，大力執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後，資產階級急遽增加，在結構上，改變了原先以工、農為主的無產階級社會；同時，發展過程產生的經濟利益，也伴隨著貪污、腐敗、官僚主義和功利主義盛行等問題；加上，中共在「十五大」後實行「第三次思想解放」，為私營經濟找到合法的出口，這都使高舉「共產主義」大旗的中共面臨統治上的困境，不得不對思想論述做出解構和重新建構，以希冀維持黨的統治地位。³⁰³

面對這種情形，江澤民首先在 1995 年 11 月提出領導幹部要「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的「三講」，他認為：「要不斷地透過學習，汲取知識，才能夠充實精神層面，不受誘惑；講政治是要抵禦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西方思想的侵蝕；發揮正氣精神，抑制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的滋長。」³⁰⁴隨即展開以「三講」為主要內容的大規模黨性黨風教育，以企圖消除黨內普遍存在的消極層面，但是「三講」並未完全發揮此種效果，2000 年 2 月，江澤民首次提出「三個代表」來彌補「三講」的不足。³⁰⁵他認為：「提出三個代表的出發點和著眼點在於隨著時代的發展，形勢也跟著不斷變化，黨必須緊跟世界發展進步的潮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

³⁰² 鄭永年，〈江澤民的遺產：在守成和改革之間〉（美國：八方文化，2002 年），頁 51。

³⁰³ 王嘉州，〈論「三個代表」與政治繼承〉，頁 26。

³⁰⁴ 江澤民，〈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共產黨新聞網》，1995 年 11 月 8 日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86/4494279.html>>。

³⁰⁵ 鄭永年，〈江澤民的遺產：在守成和改革之間〉，頁 68。

前進方向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才能不斷地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決地解決黨內存在的突出問題」。³⁰⁶

自 1989 年 6 月，江澤民擔任總書記以來，為了鞏固權力，他一直高舉「鄧小平理論」大旗，確立「鄧小平理論」作為黨的思想指導論述，似乎成為了他的首要任務，但是，鄧小平已經逝世，在「十五大」時，也正式將「鄧小平理論」寫入黨章，作為黨的最高思想指導論述。如今，不僅是為了解決發展過程中，意識形態所遭遇的困境，也是為了為自己留下「歷史定位」，所以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作為自己的思想論述。這是因為，身為一個最高領導人，如果沒有像毛澤東和鄧小平一樣，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辯證論述，就會如同華國鋒一樣，若只是延續前人的論述，縱使在名義上取得所有的領導職務，最後也會被取而代之，終就只是成為一個過渡時期的人物。³⁰⁷

2001 年 7 月，江澤民在中共建黨八十周年紀念會上，更進一步拋出將接納私營企業入黨的議題，隨即引發爭論。黨內「左」派人士對此大肆抨擊，認為此舉會瓦解黨的階級、組織和思想基礎；另一方面，外界則期待中共是否要藉此突破無產階級政黨的局限，轉型為「全民黨」，成為具有社會民主黨性質的組織。不過，對此，中共則是進一步論述，開放私營企業入黨的目的是為了擴大黨的代表性，體現現代政黨的意涵，把社會各階層的優秀份子吸收入黨，並不意味中共將變成「全民黨」，如同「三個代表」所述，中共將始終代表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³⁰⁸中共之所以會接納私營企業入黨，主要是由於隨著改革的深化，經濟的發展，過去中共一直所標榜的革命角色，也就越來越與現實相互衝突。過去強調以革命奪取政權，強調階級對立和鬥爭，都和改革開放以來的諸多作為相互矛盾，使得中共必須從革命黨轉型為執政黨，以加強執政能力和確保能夠長期執政。而做為執政黨，中共不能不對階級理論有重新的認識，不能不正視私營企業主等新興社會階層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角色，不能不承認社會階層結構與利益多元分化的事實。

³⁰⁶ 人民日報，〈中國道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歷程〉，《新華網》，2012 年 6 月 26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6/26/c_112287084_4.htm>。

³⁰⁷ 黃清賢，〈中共領導人的辯證思維研究〉，頁 292。

³⁰⁸ 吳仁傑，〈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意涵和未來發展〉，頁 37。

讓私營企業入黨不僅可以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也可以使黨的「先進性」和「代表性」更為堅實，更重要的是，避免讓這些新興階層站在黨的對立面。³⁰⁹

自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後，便不斷地動員國家機器，加強宣傳力道，將之作為教育幹部的思想理論和選拔幹部的基本要求，和外界期待中共可能藉此轉型為「全民黨」的差距越來越遠，至此，「三個代表」似乎僅是領導人為了符合現實需求，在轉化的過程中，將之作為統治合法性的理論工具，並藉此約束繼任者的思想、政策路線。³¹⁰最終，在200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六大」政治報告中提到，「三個代表」是總結過去十三年的經驗所得，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反映了當代世界和中國的發展變化對黨和國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全黨集體智慧之結晶，是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是中國共產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至此也讓「三個代表」成為貫穿過去以至未來的重要思想指導原則。³¹¹

「三個代表」在「十六大」上正式被載入黨章，一時之間，有人注意到，「三個代表」做為江澤民主政以來最重要的思想論述，但在黨章中並沒有冠上「江澤民」的名號，這明顯異於黨章中的「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不過必須注意的是，「鄧小平理論」是在鄧小平逝世後，在「十五大」上正式冠上「鄧小平」的名號，在江澤民仍健在時，便冠上他的名號，不僅犯了中國人的傳統忌諱，也可能召來鼓吹個人崇拜之非議。³¹²

在人事方面，2002年11月8日，中共召開題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鬥」的第十六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除了將可從政治報告中窺探往後5年中共的施政方面，主要的焦點，依舊是集中在權力核心的人事安排。尤其是江澤民

³⁰⁹ 林琳文，〈中共意識形態的轉型與變遷〉，高長、陳德昇主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評價與反思》（台北：遠景，2008年），頁29。

³¹⁰ 鄭永年，〈江澤民的遺產：在守成和改革之間〉，頁77。

³¹¹ 楊開煌，〈對江澤民「十六大」政治報告之研析〉，《中共研究》，第36卷第12期，2002年12月，頁27。

³¹² 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頁178。

將卸下總書記職務，進行權力移轉，完成世代交替，使得外界特別關注這次會議的召開。但是會前，中共官方媒體，以及軍方勢力不斷釋放出擁護江澤民為核心的訊息，頗有對江澤民主政以來的作為，作「歌功頌德」的意味，加上，這次的會議異於常態，延遲至 11 月才召開，使得外界紛紛揣測是否在權力重新劃分上出現問題，也開始對江澤民是否會在「十六大」後，正式退出政治舞台產生疑問。

2002 年 11 月 14 日，「十六大」正式閉幕，隔天隨即召開十六屆一中全會，進行權力核心的人事改組，全會選出胡錦濤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順利及平和地完成黨的權力交接，政治局常委為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曾慶紅、黃菊、吳官正、李長春和羅幹等 9 人，包括上述 9 人的政治局委員為王樂泉、王兆國、回良玉、劉淇、劉雲山、吳儀、張立昌、張德江、陳良宇、周永康、俞正聲、賀國強、郭伯雄、曹剛川和曾培炎等 24 人，王剛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從政治局常委職務分工的情形來看(表 3-4)，扣除軍方代表以外，中共國家機器的重要領導人都進入決策核心，排名也和十五屆相同，依序分別為總書記、全國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表 3-4 中共第十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 姓名 | 出生年/年齡 | 學歷 | 重要職務 | 原職 |
|-----|---------|-----------------|-----------------------|-------|
| 胡錦濤 | 1942/60 | 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 |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 | 政治局常委 |
| 吳邦國 | 1941/61 | 清華大學無線電子學系 |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 政治局委員 |
| 溫家寶 | 1942/60 | 北京地質學院地質構造專業研究生 | 國務院總理 | 政治局委員 |
| 賈慶林 | 1940/62 | 河北工學院電力系 | 全國政協主席 | 政治局 |

| | | | | |
|-----|---------|----------------------|------------------------|---------|
| | | | | 委員 |
| 曾慶紅 | 1939/63 | 北京工業學院自動控制系 | 國家副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央黨校校長 | 政治局候補委員 |
| 黃菊 | 1938/64 | 清華大學電機系 | 國務院常務副總理 | 政治局委員 |
| 吳官正 | 1938/64 | 清華大學動力系研究生 |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 政治局委員 |
| 李長春 | 1944/58 | 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機工程系 | 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主任 | 政治局委員 |
| 羅幹 | 1935/67 | 民主德國富萊堡礦冶學院機械鑄造系 | 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 | 政治局委員 |
| 王樂泉 | 1944/58 | 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 | 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委員會書記 | 中央委員 |
| 王兆國 | 1941/61 | 哈爾濱工業大學動力機械系 |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 中央委員 |
| 回良玉 | 1944/58 | 吉林省黨校函授班黨政幹部基礎專業(大專) | 國務院副總理 | 中央委員 |
| 劉淇 | 1942/60 | 北京鋼鐵學院冶金系煉鐵專業研究生 | 北京市委書記 | 中央委員 |
| 劉雲山 | 1947/55 | 中央黨校函授學院黨政專業 | 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 | 中央委員 |
| 吳儀 | 1938/64 | 北京石油學院石油煉製系 | 國務院副總理兼衛生部部長 | 政治局候補委員 |

| | | | | |
|-----|---------|----------------------------|-------------------------------|----------|
| 張立昌 | 1939/63 | 北京經濟函授大學 經濟管理專業在職 學習 | 天津市委書記 | 中央委 員 |
| 張德江 | 1946/56 | 朝鮮金日成綜合大 學經濟系 | 廣東省委書記 | 中央委 員 |
| 陳良宇 | 1946/56 | 解放軍後勤工程學 院建築系 | 上海市委書記 | 中央委 員 |
| 周永康 | 1942/60 | 北京石油學院勘探 系 | 中央政法委員會 副書記兼公安部 部長、國務委員 | 中央委 員 |
| 俞正聲 | 1945/57 |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 院導彈工程系 | 湖北省委書記 | 中央委 員 |
| 賀國強 | 1943/59 | 北京化工學院無機 化工系 | 中共中央組織部 部長 | 中央委 員 |
| 郭伯雄 | 1942/60 | 解放軍軍事學院學 習 | 中央軍委副主席 | 中央委 員 |
| 曹剛川 | 1935/67 | 蘇聯炮兵軍事工程 學院學習 | 中央軍委副主席 | 中央委 員 |
| 曾培炎 | 1938/64 | 清華大學無線電電 子學系 | 國務院副總理 | 中央委 員 |
| 王剛 | 1942/60 | 吉林大學哲學系 | 中共中央辦公廳 主任、中央書記處 書記 | 中央委 員 |

註 1：粗體字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按排名順序呈現，其餘為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劃排列，最後一位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註 2：職務以 2003 年 3 月「兩會」結束後為準。

資料來源：新華網，〈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網址：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1/content_698625.htm；國立政

治大學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網址：

<http://ics.nccu.edu.tw/chinaleaders/index.htm>(檢索日期 2012/11/1)。

二、人事布局之意涵分析

(一) 「胡溫體制」成形

胡錦濤因為受到政治恩人宋平的推薦，並且在中共推行幹部「四化」的背景下，胡錦濤在學識、年齡和工作經歷等方面的優勢都成為他可以獲得鄧小平賞識的條件，並將其栽培為第四代的接班人選，逐漸進入權力核心，到「十六大」召開之前，胡錦濤已經是國家副主席兼中央軍委副主席，縱使江澤民有意讓自己的嫡系人馬繼任大位，但顧及政治情勢，讓胡錦濤接班似乎也已經到了「不可違逆」的地步了。³¹³但胡錦濤作為接班人選，也有其困難之處，首先，胡錦濤處在一個角色尷尬的地位，在江澤民主政時期，他如果毫無作為、毫無主見，則會被視為難以承擔接班大任，如果過於積極、表現太過搶眼，則會出現「功高震主」的情形，也不利於接班，分寸之間的拿捏實屬不易；其次，就中共傳統政治文化來看，作為接班人選，自然就會成為權力鬥爭的對象，同儕之間或派系扈從者之間對於權力的爭奪，可能會影響到接班地位。³¹⁴再加上，記取鄧小平時期，兩次接班失敗的經驗教訓，因此胡錦濤在江澤民主政之下，刻意保持相當程度的低姿態，從不鋒芒畢露，在「十六大」後，胡錦濤正式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外國媒體在報導時，曾經出現以「Who is Hu Jintao?」為標題來介紹新一代的中共最高領導者，外國媒體的不熟悉也無疑說明胡錦濤長久以來的「低調」作風，但這也是其之所以能夠順利接班的關鍵之一。

³¹³ 對於胡錦濤是否為鄧小平指定接班的人選，有學者有不一樣的想法。俞雨霖認為胡錦濤只是鄧小平屬意接班的人選之一，鄧小平並沒有隔代指定他接班，江澤民也沒有。江澤民屬意的接班人是曾慶紅，但是因為曾慶紅一直無法獲得黨內的認同，江澤民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才讓做為接班人選之一的胡錦濤順勢出線。詳見俞雨霖，〈胡溫體制的統治結構與權力挑戰〉，朱新民主編，《2003年胡溫體制權力與政策總體檢》(台北：遠景，2004年)，頁2。

³¹⁴ 楊開煌，〈中共「十六大」之接班與人事安排--內在邏輯之探討〉，《遠景基金會季刊》，第3卷第3期，2002年7月，頁111。

溫家寶 1942 年 9 月生於天津市，1965 年 4 月便加入中國共產黨。1968 年取得北京地質學院研究生學歷後，便開始在地方工作。1985 年在王兆國的推薦之下，出任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隔年由副轉正，以非中央委員身分出任中央辦公廳主任，顯示其擢升之快。出任中央辦公室主任時，歷經兩任總書記被罷黜，卻對其仕途無太大影響，尤其是 1989 年發生「六四事件」時，在軍隊鎮壓之前，他曾經陪同時任總書記的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對學生喊話，事後未因「六四事件」而受到牽連。³¹⁵在江澤民出任總書記時，繼續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在 1992 年的「十四大」時，溫家寶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中央書記處書記，那時他和胡錦濤一樣，年僅 50 歲，被視為是「年富力強」的第四代。自 1993 年溫家寶就開始輔助朱鎔基處理農業問題，1997 年的「十五大」進入權力核心，擔任政治局委員，並在隔年的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國務院副總理，正式在朱鎔基底下工作。溫家寶在農業和金融這兩個中國經濟最主要的部門中協助朱鎔基工作，事實上，中國當時在這兩個領域正遭逢困境，一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對農業所造成的衝擊；另一則是調整經濟結構轉變，以促使金融市場能夠自由化，而溫家寶卻依舊展現出苦幹實幹的工作態度，認真學習的工作精神，都讓朱鎔基頗為讚賞。³¹⁶

與其他三位國務院副總理相較，溫家寶是分管部門最多的副總理，也顯示出主政者對其工作能力的肯定和信賴。1998 年夏天，長江流域洪水氾濫，身為國家防汛抗總指揮的溫家寶對分洪問題判斷得宜，再加上他一貫以來的溫和平實施政風格，都使得他的政治聲望與日俱升。³¹⁷這些都成為他在仕途上繼續往上晉升的優勢，除此之外，一般認為他能夠在吳邦國和黃菊等競爭者中脫穎而出，獲得朱鎔基的支持最為關鍵，2003 年 3 月的第十屆全國人大，溫家寶正式被選為國務院總理。³¹⁸

³¹⁵ 高新、何頻，《誰領導中國：最有權力的 24 個人》，頁 511。

³¹⁶ 李成，〈十六屆中委會人事構成及其權力均衡〉，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文化，2002 年），頁 40。

³¹⁷ 劉鈺聲，《中國最有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美國：明鏡，2010 年），頁 192-196。

³¹⁸ 陳梓龍、柳金財，《胡溫體制的治國理論與政策走向初探》（台北：遠景，2004 年），頁 22。

(二) 「鄧小平模式」的權力交接

1987年11月的中共「十三大」，將原本黨章中規定「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產生」修改為：「黨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由中央委員會決定」，隨後的十三屆一中全會，鄧小平被推選為中央軍委主席，當時的他，既非中央委員，也未在中央其他機關擔任領導職務。1989年6月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原本的總書記趙紫陽因「六四事件」被罷黜，全會推選江澤民繼任總書記，但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仍在鄧小平手中，這是因為中共未對中央軍委組成人員做出年齡或任期限限制所致，直至1989年11月和1990年3月才分別在十三屆五中全會和第七屆全國人大，分別卸下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和國家軍委主席職務。2002年11月的「十六大」後，江澤民卸下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但卻仿效鄧小平「半退」，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一職。事實上，在「十六大」之前，就對於江澤民將「全退」或「半退」就有諸多臆測。江澤民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致使胡錦濤在鞏固權力方面遭受阻礙。

對於江澤民留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決定，則可做「一體兩面」的解讀：一方面，對中共而言，軍隊穩定就是國家穩定的保證，在權力交接之際，為了政局和社會的穩定，不宜出現太大的變動；再者，胡錦濤雖已在十五屆四中全會被選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但中央軍委會是採主席制，胡錦濤無法建立和強化跟軍隊的關係，又依據軍隊傳統文化，一位非軍人出身又尚無威信的人來領導軍隊，很可能會不被「認可」，因此由江澤民續任中央軍委主席，發揮「扶上馬，送一程」的功用，待胡錦濤在黨、政樹立起權威後，再接任中央軍委主席，對胡錦濤和政局穩定都是比較有利的安排。

另一方面，若江澤民是「有意」留任中央軍委主席，繼續發揮影響力，有違中共向來強調的「黨指揮槍」之原則，同時破壞黨的體制，不僅使政治局常委會無軍方勢力代表，有違職務分工原則，也讓黨形成兩個權力中心。

³¹⁹ 直至2004年9月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江澤民辭去中央軍委主席，改由胡

³¹⁹ 沈明室，〈中共十六大權力繼承與軍隊角色〉，《展望與探索》，第1卷第2期，2003年2月，頁

錦濤接任，延續中共最高領導人身兼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三位一體」的慣例，也讓「黨軍關係」正常化。

(三) 世代交替的權力移轉

十六屆政治局的組成人數有些微調整，其中政治局常委由 7 人變為 9 人，政治局委員由 22 人變為 24 人，政治局候補委員則為 1 人。十五屆的政治局委員江澤民、李鵬、朱鎔基、尉健行、李嵐清、丁關根、田紀雲、遲浩田、張萬年、姜春雲、錢其琛等 11 人皆因年齡因素退出政治局，而李瑞環和李鐵映雖未屆齡，但也退出政治局，而謝非則是在 1999 年 10 月去世。其中年僅 66 歲的李鐵映退出本屆政治局更是被認為形成領導高層「有限任期制」的不成文規範，意即同一職務連任 2 屆 10 年而未晉升者，雖未達離退年齡的規範，也須退下，唯獨被視為最高權力接班人者不受此限。³²⁰ 大規模的離退，也造就此屆政治局呈現「世代交替」的情形。其中，政治局常委僅胡錦濤 1 人留任，其餘包括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黃菊、吳官正、李長春和羅幹等 7 人都是由政治局委員升任政治局常委，而曾慶紅則是從政治局候補委員升任政治局常委，且排名第 5，最受矚目。但就政治局常委會的新人比例來看，高達 88.9%，全體政治局成員(包含候補委員)的新人比例則是 60%。

在年齡方面，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年齡為 62.1 歲，遠低於十五屆的 65.4 歲，是 1977 年十一屆以來年齡最低的一屆。包含候補委員的全體政治局委員平均年齡為 60.6 歲，也低於十五屆的 63.1 歲。全體政治局成員皆不超過 70 歲，也使得「十五大」的「七十歲劃線離退」規範再次得到確立。在學歷方面，此屆政治局常委皆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其中溫家寶和吳官正更是取得研究生學歷，其餘政治局委員也都具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這都足以顯示此屆政治局的人事安排，在「年輕化」和「知識化」方面做了相當程度

45。

³²⁰ 吳仁傑，〈中共政治局組成及升遷趨勢探討〉，《中共研究》，第 41 卷第 8 期，2007 年 8 月，頁 50。

的努力。值得注意的是，從年齡結構來看，此屆政治局並未安排「年富力強」的第五代做為接班的預備人選，胡錦濤、溫家寶和吳邦國皆是在年僅 50 左右就進入十四屆的政治局，歷經兩屆 10 年的磨練，才正式做為第四代的領導班子。所以，在十六屆的政治局人事中，未對接班預做安排，也致使「十七大」再次出現越級晉升的情形。在專業方面，9 名政治局常委皆具有「工程師」頭銜，也曾被譽為「工程師治國」。

(四) 「江派人馬」在常委會佔多數

一般認為，中共權力核心的人事改組總是和「派系」脫不了關係。這是因為追求權力不僅是派系形成的主要原因，也是派系的重要目標，派系力量的成長與衰退就導致政治的變遷。³²¹儘管外界無法窺探中共派系的運作情況，鄧小平也曾經說：「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但派系政治與人脈網路的連結確實存在。

關於以江澤民為領導者的派別，最常被提到的便是「上海幫」或稱「新海派」。所謂「上海幫」並非是以出生地作為分別的基礎，而是指藉由與江澤民在上海時期擔任市長或市委書記期間建立的扈從關係而獲得晉升的各級領導人，因此這些人必定都曾在江澤民主政上海期間，在其領導下擔任某種職務。³²²而「新海派」則是進一步擴大「上海幫」的定義，其指的是江澤民在擔任總書記期間，受到重用的上海幹部，這些人之所以獲得晉升，多少都與江澤民的關愛和提拔有關。³²³不論是「上海幫」或是「新海派」，兩者有一個極度重要的共同點，就是這些人都和江澤民建立起某種程度的「關係」，因此根據這種「關係」作為基礎而存在的人際網絡就可將之通稱為「江派人馬」。根據此種定義，十六屆政治局常委 9 人之中的吳邦國、曾慶紅、黃菊、賈慶林和李長春被認為「江系」色彩濃厚，是十六屆政治局常委中的

³²¹ 朱新民，《一九七八至一九九〇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八十年代後中國的政治發展》，頁 322。

³²² 李成，〈十六屆中委會人事構成及其權力均衡〉，頁 31。

³²³ 「舊海派」與「新海派」是香港學者丁望所提出的觀點，前者指的是 1980 年代以來在上海地區較具影響力的人物包括陳國棟、汪道涵和胡立教等；而後者指的是江澤民擔任總書記期間，受到重用的上海幹部，包括吳邦國、黃菊、曾慶紅...等人。詳見丁望，《曾慶紅與夕陽族強人》（香港：當代名家，2002 年），頁 167。

「江派人馬」。³²⁴吳邦國、曾慶紅和黃菊曾在江澤民主政上海期間，在其領導之下擔任幹部，是標準的「上海幫」成員(表 3-5)；賈慶林在第一機械工業部工作時，與在外事局工作的江澤民是同事關係，1995 年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因貪汙案辭職下台，北京市進行人事改組，賈慶林在江澤民的支持下先出任北京市代市長，在 1997 年升任北京市委書記；而李長春也與江澤民保持不錯的關係。這些人之中，以曾慶紅和江澤民關係最密切，是「江派人馬」中最具指標性的人物。

表 3-5 十六屆政治局中的「上海幫」成員

| 姓名 | 十五屆 | 十六屆 | 在上海的主要經歷 |
|-----|-------------|-------|------------------|
| 吳邦國 | 政治局委員 | 政治局常委 | 市委副書記、市委書記 |
| 曾慶紅 | 政治局候補 委員 | 政治局常委 | 組織部部長、秘書長、市委副書記 |
| 黃菊 | 政治局委員 | 政治局常委 | 秘書長、副市長、市長、市委書記 |
| 陳良宇 | 中央候補委 員 | 政治局委員 | 副秘書長、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 |
| 曾培炎 | 中央委員 | 政治局委員 | 第一機械工業部研究中心主任 |

資料來源：李成，〈十六屆中委會人事構成及其權力均衡〉，收於丁樹範主編，
《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文化，2002 年)，頁 34。

曾慶紅 1939 年 7 月生於江西省吉安，其父曾山是中共老黨員，曾擔任上海市副市長，工業部、商業部、內務部的部長。曾慶紅在 1984 年便開始在上海工作，擔任市委組織部副部長。1985 年江澤民到上海擔任市長，開始兩人在上海的共事關係，曾慶紅在上海歷經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部長、市委常委兼市委秘書長和市委副書記等職。曾慶紅在擔任上海市委副書記期間直接受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的領導，因為工作關係，曾慶紅和江澤民的

³²⁴ 郭瑞華，〈中共十六大之人事布局分析〉，頁 18。

關係也越來越密切，也越來越受江澤民的信任。³²⁵1989年江澤民出任總書記一職時，便立即將曾慶紅拔升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使得他成為第一位受江澤民提拔的「上海幫」成員，足以顯示曾慶紅對江澤民的重要性。

「十四大」後，曾慶紅由副轉正，出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更顯示出江澤民對其信賴之重。因為，中央辦公廳是中共工作的核心機構，集機要、智囊和祕密警察功能於一體。不僅必須為最高決策權提供會議工作的情報和建議，也須負責傳遞最高層的機密文件和聯絡中央各部委黨組及地方黨委、解放軍部門..等任務，因為掌管的事務太過重要，所以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般都是總書記最信任的人出任，而且過去出任該職者，無一不進入權力核心³²⁶。曾慶紅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除了負責中共中央日常事務，在江澤民視察或到國外訪問等一些重要場合，都可以看見曾慶紅陪同的身影，使得曾慶紅有「中南海管家」之稱。³²⁷

另外，曾慶紅不僅政治智慧和政治手腕受到江澤民的肯定，江澤民也相當看重曾慶紅具備的政治關係網絡。³²⁸如同先前所述，曾慶紅其父曾山是中共老黨員，在中共建政後擔任部長及等職務，其母鄧六金曾在長征時期加入共軍，使得曾慶紅的出身「根正苗紅」。中共元老級人物余秋里曾和曾山共事過，因為這層關係，後來曾慶紅也曾擔任余秋里的秘書。「舊海派」中的陳國棟和汪道涵都曾在曾山的領導下工作，他們在主政上海期間，提拔曾慶紅擔任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隨後由副轉正；後來上海的「第一把手」改由芮杏文擔任，在他的提名下，曾慶紅升任市委秘書長。這些關係網絡，都成為曾慶紅在仕途上的重要政治資本。³²⁹曾慶紅在江澤民擔任總書記期間的刻意提拔下，出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組織部部長等重要職務，最終在「十六大」得以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並接

³²⁵ 丁望，《曾慶紅與夕陽族強人》，頁164。

³²⁶ 「十四大」前出任過中央辦公廳主任的分別有楊尚昆、汪東興、姚依林、胡啟立、喬石、王兆國和溫家寶。詳見高新、何頻，《誰領導中國：最有權力的24個人》，頁533。

³²⁷ 任慧文，《中南海跨世紀領導層》，頁416。

³²⁸ 李成，〈十六屆中委會人事構成及其權力均衡〉，頁31。

³²⁹ 高新、何頻，《誰領導中國：最有權力的24個人》，頁514。

替胡錦濤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家副主席和中央黨校校長等重要職務。

(五) 地方勢力大幅提升

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簡稱全國政協)和黨中央組織進行人事改組之前,以地方首長身分進入「十六大」的政治局分別有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委員會黨委書記王樂泉、江蘇省委書記回良玉、北京市委書記劉淇、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天津市委書記張立昌、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四川省委書記周永康、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山東省委書記吳官正和廣東省委書記李長春等,共計10人,比十五屆的5人還多一倍,這是前所未有的情況,如果再加上「十六大」召開之前的一個月才離開地方首長職位的賈慶林、黃菊和賀國強3人,則超過政治局總數的一半。另外,政治局常委中,僅溫家寶1人無地方領導工作經驗,這都顯示出,中央在甄補政治局委員的過程之中,具備地方首長工作經驗已經成為優勢條件。

在人事調動之後,由政治局委員出任地方黨委書記的省市僅剩廣東省、北京市、天津市、³³⁰上海市、湖北省和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其中前四個省市在「十五大」時,均在政治局有代表,因此,湖北省和新疆自治區在「十六大」時的地位提升明顯提升。其中湖北省為中部地區的唯一代表,地處西部地區旁,可作為支援西部大開發的前哨,另外,當時正值三峽大壩的最後趕工階段,而中央又調任具有建設部首長經驗的俞正聲出任該省省委書記,足以顯示中央對該工程的重視;而新疆的入選除了顯示中共中央對大西部開發的重視,同時,新疆也是西部地區的唯一代表,和湖北為中部地區的代表一樣,有平衡區域的效果,調整一直以來的重沿海輕內陸的策略。³³¹

³³⁰ 十五屆政治局委員中雖無人兼任天津市委書記,但十五屆政治局委員中的李瑞環和譚紹文曾任天津市委書記,因此將之視為天津市的代表。

³³¹ 王嘉州,〈中央與地方政經權力關係之轉化〉,高長、陳德昇主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評價與反思》(台北:遠景,2008年),頁82。

第四章 中共「十七大」之政治繼承

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胡錦濤上任之後第一次主導的黨員大會。在面臨SARS危機、貧富差距、城鄉發展失衡、群體事件劇增..等嚴峻的社會情勢之際，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來對黨內的意識形態做解構和建構，以圖穩固政治局勢和執政地位。「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用意是為了導正過去黨內領導幹部只注重經濟層面的發展而忽略其他領域的均衡發展之現象，胡錦濤強調發展必須在「又好又快」的前提之下進行。

另一方面，關注的焦點依舊是人事上的安排，因為這是中共首次在沒有政治強人之下，來決定接班人選，縱使中共精英甄補已經受相關制度性條件的制約，但亦不可以忽略「非正式政治」在其中的影響力。此屆政治局常委會中甄補了兩位1950年代出生的領導幹部，作為胡錦濤之後接班人的用意明顯，因此本章也將探討中共精英甄補的發展。

第一節 意識形態的繼承與更新

一、「科學發展觀」的理論背景

中共過去一直藉由統領意識形態、掌控輿論導向，通過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使得社會成員對現有的體系產生強烈認同的政治心理及政治思想，進而對現有的政治體系產生維繫作用。但在改革開放之後，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新興階層的崛起，中國社會出現了利益分化和思想多樣化的情形，致使中共的主流意識形態受到衝擊，社會階層意識相對獨立，讓政治社會化的功能難以完全發揮，導致政治認同度降低，也讓中共黨的思想基礎受到削弱。³³²因此，這對將意識形態視為統治合法性基礎與實踐政策路線之依據的中共

³³² 中共中央黨校編寫，《執政黨建設若干問題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4年），頁106-107。

而言，它必須隨著改革的深化與轉折、政治權力的轉移來重新解構和建構意識形態，以符合現實情勢。

自 1978 年 12 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將經濟建設做為工作重點後，中共即實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將中央集權式的「計畫經濟」轉向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中共透過建立經濟特區、開放沿海城市和地區來大規模的吸引外資和引進技術、大量派遣出國留學人員，以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積極鼓勵出口增長和擴大國際貿易等一連串的措施，讓中國經濟進入高速成長的階段，³³³讓改革開放有了初步的成果，對此，鄧小平曾說：「三十幾年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的」。

³³⁴

為了盡速改變中共落後於西方世界的面貌，也為了打破當時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平均主義」心態，鄧小平主張「讓一部份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快一點，帶動大部分地區，這是加速發展，達到共同富裕的捷徑」。³³⁵改革開放對中國經濟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但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沒有同時兼顧其他社會問題，致使其成為發展失衡的原因之一。

在 1992 年的「南巡談話」中，可以發現鄧小平已經注意到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貧富差距，地區發展不均的問題，但他當時認為「現階段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³³⁶因此有條件的地區應該堅持「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原則，來加速發展，暫時不應將發展成果支援發展較慢的地區，以免影響其發展速度。關於合理分配的問題，必須等到生產力達到更高階段時再來解決，因此這也讓區域間的不均衡發展變成是發展過程中暫時須付的代價。³³⁷

但是中國在擺脫「計畫經濟」的枷鎖後，隨即迅速成長，大量資本湧入經濟特區，讓中國出現沿海發展優於內陸、東部發展優於西部、城市發展優

³³³ 胡鞍綱，《挑戰中國—鄧後中南海面臨的機遇與選擇》（台北：新新聞文化，1995），頁 13。

³³⁴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64。

³³⁵ 鄧小平，〈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149。

³³⁶ 鄧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頁 374。

³³⁷ 陳述之、江衍良，〈改革開放時期中共意識形態的結構與演變：由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學發展觀的發展過程〉，《中國大陸研究》，第 55 卷第 3 期，2012 年 9 月，頁 13。

於鄉村的情形，社會上貧富差距兩極化亦趨明顯，這也讓鄧小平原先冀望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的目標越來越遠。中國國情專家胡鞍鋼在1994年6月針對30多名的中共省地級領導人做問卷調查時，所有人皆認為自80年代以來，中國各地區經濟差距不斷擴大；有93.9%的人認為發達地區與低度開發地區每人平均收入差距已經過大；83.9%的人認為地區收入差距過大可能導致社會出現不穩定的情況。³³⁸這項數據顯現出，早在十幾年前，中國社會就存有收入分配不均和發展不均的隱憂。

而江澤民時期的發展觀，主要是依循「鄧小平理論」，延續「發展才是硬道理」原則，且為了避免步上蘇聯和東歐的後塵，大量的引進資本主義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等長處來改善中國經濟。³³⁹而為了加速經濟發展，在「十四大」時確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了「十五」大時，更是打破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爭議，承認和接受私有制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份子。中共一次又一次突破意識形態的禁區，讓政治情勢有利於經濟的發展。

2000年2月，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即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國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做為其執政時期最重要的思想論述，內容主要是涉及黨的性質和黨的發展，用以回答「要建設什麼樣的黨，怎麼樣建設黨」，³⁴⁰隨後中共更進一步做出接納私營企業入黨的決定，雖然成功的擴大其政權的社會基礎，但無法掩蓋貧富差距和發展不均惡化的情形。前中國社科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蘇紹智就認為：「江澤民之所以提出讓資本家加入黨，是因為屬於中共統治基礎的工、農群眾並未享受到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成果，反而在發展的過程中，使得工人大量失業下崗和農民日益貧困的情形持續惡化，加上貪污腐敗問題日趨嚴重，造成社會動盪，民心盡失，讓中共的統治基礎動搖，讓中共急欲尋求其他社會力量的支持。」³⁴¹

³³⁸ 胡鞍鋼，《挑戰中國—鄧後中南海面臨的機遇與選擇》，頁101。

³³⁹ 吳安家，《中共意識形態的變遷與持續 1949-2003》(台北：國史館，2004年)，頁640。

³⁴⁰ 楊開煌，〈發展戰略思考之評述〉，高長、陳德昇主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評價與反思》(台北：遠景基金會，2008年)，頁55。

³⁴¹ 蘇紹智，〈中共向何處去？江澤民允許資本加入黨之後〉，《BBC中文網》，2001年8月29日，

2002年，胡錦濤上台之初，他面臨的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因分配不平等所導致之失業、腐敗、三農、收入差距失衡、生態環境惡化和自然資源持續耗損等嚴峻的社會情勢。2003年的「SARS事件」發生時，隨著疫情失控式的蔓延，更突顯出中共政權倉皇失措的應變能力，也暴露了中國社會體制的脆弱體質，這些都讓中共的執政地位和執政能力受到質疑，讓中共再次陷入統治「合法性」的危機中，³⁴²迫使中共不得不重新檢討過去「重經濟、輕社會」所造成的失衡發展問題。2003年4月，胡錦濤在視察廣東時，指出要堅持「全面的發展觀」，他認為在努力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同時，也要注意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同年7月，胡錦濤在出席「全國防治非典工作會議」時強調：「我們要更好地堅持協調發展、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發展觀，堅持在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堅持促進人和自然的和諧」。同年8月底至9月初，胡錦濤在江西考察期間時指出：「要牢固樹立協調發展、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這是胡錦濤首次完整的使用「科學發展觀」一詞。³⁴³

二、「科學發展觀」之分析

胡錦濤在「十七大」上的政治報告中闡述「科學發展觀」的意涵即「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其中內容具有幾層含意。

第一，由於「鄧小平理論」的核心概念「思想解放，實事求是」和「三個代表」的核心價值「與時俱進」都同樣具有科學精神，因此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是具有傳承前人理論的意涵。³⁴⁴

第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並不否定「發展」，因為經濟成長向來是中共維持統治的最大基礎，但是，過於強調經濟發展，因而忽略其他相應

<http://news.bbc.co.uk/hi/chinese/china_news/newsid_1515000/15152491.stm>。

³⁴² 宋國誠，〈科學發展觀—中國第三次社會轉型〉，《中國大陸研究》，第51卷第2期，2008年6月，頁100

³⁴³ 韓振峰，〈科學發展觀形成與發展的歷程〉，《人民網》，2012年8月27日，<<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0827/c49150-18839025.html>>。

³⁴⁴ 鄭海麟，〈「科學發展觀」之我見〉，《海峽評論》，第207期，2008年3月，頁23。

發展，將會引發許多社會問題，這個問題在鄧小平和江澤民時期未獲適當的重視。³⁴⁵中共認為一直以來，領導幹部沒有清楚的認知「發展」的涵義，把「發展才是硬道理」曲解成「只有經濟成長才是硬道理」；把「發展是執政興國第一要務」曲解為「經濟增長是執政興國唯一要務」；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曲解為「以GDP為中心」；把「GDP」曲解為「單一的社會發展指標」....等，一切「以物為中心」的發展觀念，才會導致中國社會出現一系列的失衡問題。³⁴⁶「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就是要導正這種情形，領導幹部在秉持「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原則時，必須破除單純追求物質的、見物不見人的、短視近利的片面發展觀，要實現「又快又好」的全面發展。

第三，以人為本的核心發展概念。胡錦濤自上任以後，便不斷強調「人民」的重要性。包括多次提及「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的「三個為民」、「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並將「三個代表」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定義為「實現人民的願望、滿足人民的需求、維護人民的利益」，以及將「心裡裝著群眾、凡事想著群眾、工作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作為中共幹部思想與行動的準則。「以人為本」不僅是對毛澤東「為人民服務」思想的延伸和具體化，也符合「胡溫體制」一直以來秉持的「親民愛民」原則。³⁴⁷

中共認為「以人為本」不僅符合黨的根本宗旨，也是體現黨的執政理念。在治理國政時除了把解決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放在首位外，也要充分體現和代表人民的意願，堅持發展是為了人民、發展要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透過不斷讓人民群眾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來讓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³⁴⁸溫家寶指出也：「以人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提高人民群

³⁴⁵ 趙建民，〈科學發展觀與胡錦濤路線〉，《展望與探索》，第5卷第12期，2007年12月，頁44。

³⁴⁶ 王偉光，〈科學發展觀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2004年），頁1-2。

³⁴⁷ 宋國誠，〈科學發展觀—中國第三次社會轉型〉，頁104。

³⁴⁸ 經濟日報，〈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新華網》轉載，2006年7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7/21/content_4862102.htm>。

眾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並且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利，透過不斷地提高人們的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健康素質，來創造一個平等發展的社會環境。」³⁴⁹

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之所以要特別強調「以人為本」的核心發展概念，主要是由於中共向來宣稱建黨奮鬥的目標在於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換句話說，人民群眾的支持是中共建政的基礎，人民是立黨之基、建國之本。然而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雖然在經濟上獲得重大的成就，但財富卻只集中在少數的利益階層，貧富差距的擴大，使普羅大眾逐漸對中共執政喪失信心。³⁵⁰面對此一形勢，胡錦濤的切入點，明顯有別於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透過拉攏利益階層來穩固黨的群眾基礎，胡錦濤企圖以「民主主義」的思想來化解社會上的矛盾問題，並為共黨執政找尋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³⁵¹

第四，「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中共認為要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必須同時發展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彼此是相互連繫和依存的關係，缺一不可。過去鄧小平到江澤民時期的發展觀比較傾向單一向度的經濟發展，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則除注重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外，也同時兼顧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諧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和人的全面發展，並在發展的過程中，相互協調，達到均衡發展的狀態。

³⁵²

而可持續發展則是對過去「重經濟、輕環保」的反思，胡錦濤在「十七大」的報告中，將「經濟增長所付出的環境資源代價過大」列為中國前進中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改革開放後，在經濟發展優先的考量下，中國儼然成為「世界工廠」，許多因環保意識高漲而無法在先進國家生存的高污染製造工業紛紛進駐中國，加上中國沒有完整的規畫、配套和防護措施，使得空氣、

³⁴⁹ 中國網，〈溫家寶：堅持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中國網》，2004年2月29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4/Feb/507198.htm>〉。

³⁵⁰ 王德立，《胡錦濤的戰略—科學發展觀的意涵》（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9年），頁101。

³⁵¹ 楊開煌，〈解讀中共「十七大」〉，《中共研究》，第41卷第11期，2007年11月，頁52。

³⁵² 楊開煌，〈發展戰略思考之評述〉，頁53。

水和土壤受到污染情形日趨嚴重。³⁵³另外，根據調查，2006年中國的GDP僅佔世界總量的5.5%左右，但消耗的煤、鋼材和水泥卻分別占世界總量15%、30%和54%，顯示出中國為了快速發展而不計成本，已經違背了正常的發展規律。中共冀望透過「科學發展觀」來尋求「經濟發展」和「自然環境」的平衡點。³⁵⁴

第五，統籌兼顧是正確處理經濟社會發展中重大關係的方針原則，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堅持的根本方法。這主要是延續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決議未來發展策略將統籌城鄉發展、區域發展、經濟社會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國內和對外開放發展，而前三項都和中國社會長期存在「分配不均」的情形息息相關，而造成社會不平等的現象。

自施行「改革開放」後，在解放生產力與迅速從事現代化建設的訴求下，使得整體社會與經濟領域均呈現出快速的高度發展，然而由於資源的有限性以及資源分配選擇的差異性，讓中國社會出現一種不均衡發展的特性和面貌。在這樣長期不均衡的發展策略下，各領域產生明顯的落差現象，在整體上集中且突出地表現在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和東西差距，也就是所謂的「三差問題」，³⁵⁵而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最終都會反映在貧富差距上。

1980年代以來，為了改善中國「一窮二白」的狀況，中共收入分配的思維由毛澤東時期的「平均主義」轉向鄧小平時期的「先讓一部份人與地區富起來」，這也使得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急遽擴大，根據中國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的估算，被普遍用來評斷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³⁵⁶

³⁵³ 唐彥博，〈中共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之挑戰〉，《中共研究》，第41卷第7期，2007年7月，頁69。

³⁵⁴ 張旭東、韓潔、林紅梅，〈十七大代表清醒看待中國未來面臨的五大挑戰〉，《新華網》，2007年10月19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19/content_6907538.htm〉。

³⁵⁵ 張國聖，〈「三差問題」對於中國國家發展的挑戰〉，《通識研究集刊》，第6期，2004年11月，頁4。

³⁵⁶ 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是20世紀初，義大利統計學家基尼(Corrado Gini)所創，該指數普遍被用來評斷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0.3以下為平均狀態，0.3到0.4之間為正常狀態，而0.4是國際公認的警戒線，超過0.4的話，容易出現明顯的社會階層。詳見林宗弘，〈市場轉型與社會不平等〉，王振寰、湯京平、宋國誠主編，《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研究》(高雄：巨流圖書，2011年)，頁267。

從改革初期的 0.29 左右，到 90 年代初期已經超過 0.4 的警戒線，到 2006 年此一數值更逼近 0.5 大關，為 0.496。³⁵⁷ 姑且不論中國公布的官方數據是否能切實的反應實際狀況，但貧富差距的情形，的確持續惡化中。³⁵⁸

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的原因很多，而最主要的根源包括市場不健全所形成的壟斷性與非法性的收入，以及因為賦稅制度的不公平而使財富分配不符比例的情形日趨嚴重，這種貧富差距惡化的現象是不利於社會穩定的淺在危機。若非法致富以及貪污腐敗的情形加劇，將使人民開始質疑國家體制的公平和公益性，以及人群在比較利益法則下所產生的社會心理落差，將使得人們容易對社會產生不滿的情緒，逐漸產生「仇富」心態，出現社會階級對立和衝突，將容易使穩定的社會秩序走向裂解。³⁵⁹

數據顯示中國大陸的群體性事件(包括妨礙公務、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聚眾鬥毆、滋事等)從 1993 年的 8,700 起，到 2005 年已經高達 8.7 萬起，13 年增加 10 倍，平均每 6 分鐘就發生 1 起。而據中共國家統計局 2007 年 12 月公佈的「2006 年社會統計年度數據」顯示，2006 年公安機關受理「擾亂單位秩序」、「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滋事」、「阻礙執行職務」等 4 類案件有 59 萬 9,392 起。而貧富差距擴大是導致群體性事件發生的頻率呈現爆炸性成長的主因之一，這將對維持社會秩序和穩定國家發展形成重大挑戰，讓中國步入「高風險」的社會。³⁶⁰ 對此，胡錦濤在「科學發展觀」的論述下，於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來因應，將盡速解決分配不公、失業和教育問題，健全和完善社會組織和保障體系，建立社會醫療救濟制度..等，以期建立一個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和諧社會」的提出，一方面，突顯胡溫政

³⁵⁷ 王信賢，〈傾斜的三角：當代中國社會問題與政策困境〉，《中國大陸研究》，第 51 卷第 3 期，2008 年 9 月，頁 44。

³⁵⁸ 中國研究學者何清漣認為中國官方公布的數據往往和實際情況有所差別。詳見人民報，〈美國之音：中國社會貧富懸殊驚人〉，《人民報》，2001 年 8 月 25 日，〈<http://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1/8/25/15350b.html>〉。

³⁵⁹ 張國聖，〈「三差問題」對於中國國家發展的挑戰〉，頁 23。

³⁶⁰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中國大陸群體性事件頻繁，步入「風險社會」參考資料〉，《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官網》，2007 年 12 月 28 日，〈<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63867&ctNode=6451&mp=1>〉。

權對當前社會問題之重視，未來施政方向，將著重理順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矛盾關係；另一方面也顯示這些社會問題，已經成為「胡溫體制」在執政時，不得不面對的「重中之重」。

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用意是不僅是修正鄧小平「先富論」中的「梯度發展理論」，³⁶¹更重要的是，宣示中共將正確認知和處理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關係。³⁶²綜觀胡錦濤上台之後的思想論述，從「三個為民」、「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和諧社會」到「科學發展觀」，可以顯現出中共有鑒於蘇聯、東歐等共黨國家，失去群眾基礎而喪失政權，且在政治改革停滯不前的情況下，企圖將「意識形態」與人民生活做連結，除了提高執政能力外，更重要的是爭取群眾認同，以穩固和擴大中共統治的正當性基礎。³⁶³

2007年10月15日，中共舉行第十七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胡錦濤在以「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的報告中，一改過去將社會建設劃入經濟建設中的慣例，將其獨立列出，不僅符合胡錦濤一直以來重視社會建設的思想論述，也代表嚴峻的社會情勢已不容再被忽視。並將過去使用的加快「經濟增長」調整為加快「經濟發展」，用人民平均所得「翻兩番」取代過去著重經濟發展「總量」的目標。在報告中也首次提及「生態文明」議題，這些都顯示出胡溫政權不同以往的發展策略。「科學發展觀」在「十七大」上被視為是中共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於發展的重要思想之繼承和發展，是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不僅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也同時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最終在黨員代表的一致通過的情形下，被列入中共黨章。³⁶⁴

³⁶¹ 「梯度發展理論」將中國劃為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塊區域。中共早期認為政府投資應該發揮沿海的自然優勢，等到沿海地區足夠發達以後，再將注意力轉向中部，最後才是西部。

³⁶² 楊開煌，〈發展戰略思考之評述〉，頁 54。

³⁶³ 陳述之、江衍良，〈改革開放時期中共意識形態的結構與演變：由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學發展觀的發展過程〉，頁 21。

³⁶⁴ 新華社，〈十七大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新華網》，2007年10月21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1/content_6917972.htm〉。

第二節 政治局人事安排與分析

一、人事安排

為了配合「十七大」的召開，中共在 2006 年就開始展開「由下而上」的相關權力部屬工作。在全國黨員代表選舉方面，中共中央於 2006 年 11 月印發《關於黨的十七大代表選舉工作通知》，要求體現黨的「先進性」原則，全國 38 個單位選出的黨員代表，要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意即除了黨員領導幹部外，也要有經濟、科技、國防、政法、教育、文化、婦女、少數民族... 等各領域的代表。除此之外，中共還具體的規定「十七大」的黨員代表必須符合四項基本條件：（一）能夠模範遵守和貫徹黨章；（二）能堅決執行黨的路線和方針；（三）能嚴格要求自己，實踐社會主義榮辱觀；（四）能忠實履行代表職責，切實反映群眾意見。在經過集體討論、推薦提名、組織考察、確定候選名單等程序，且在各選舉單位不少於 15% 的差額比例下，將選出 2200 左右的黨員代表。³⁶⁵

另一方面，中共也在 2006 年下半年開始，進行兩階段的地方省級領導幹部換屆改選工作。在提高領導幹部執政能力、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樹立正確的用人導向及擴大黨內民主的前提下，透過民主推薦、民主測評、民意調查、實績分析、個別談話和綜合評價等具體方法，對領導幹部進行綜合考核評價。³⁶⁶

本屆省級黨委換屆改選有幾項特點：首先是實行人事精簡的措施。中共在 2004 年 9 月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就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該《決定》表示為了切實解決分工重疊的問題，用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將進行地方黨委、人大和政協領導幹部的人事精簡，以其徹底發揮集體領導的作用。³⁶⁷本屆的省級黨委改選工作也貫徹該《決定》

³⁶⁵ 黃碩，〈中共中央發出通知，部署黨的十七大代表選舉工作〉，《新華網》，2006 年 11 月 1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1/12/content_5319132.htm〉。

³⁶⁶ 柳奇，〈中組部印發實施地方領導班子和幹部考核試行辦法〉，《新華網》，2006 年 7 月 6 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7/06/content_480307.htm〉。

³⁶⁷ 中國網，〈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全文）〉，《中國網》，2004 年 9 月 27 日，

的要求，除了西藏和新疆保留四位副書記，內蒙古保留三位副書記外，其餘各省黨委副書記職數均為兩人，其中一人兼任政府行政首長，另一人則專職副書記。改選之後，各省的省級黨委書記普遍遵行「一正兩副」的規定。精簡之後，省級黨委副書記總數為 67 人，較上屆的 158 人減少了 91 人。³⁶⁸另外，省級常委會也同樣進行職數的精簡工作，除新疆和西藏可以擁有 15 名常委，青海可以擁有 14 名常委外，其餘省分皆只能有 12 至 13 名常委，精簡過後的全國省級常委總數為 403 人，較上屆減少 22 人。³⁶⁹

其次，改選後的領導幹部呈現年輕化、知識化的特徵。中共中央於 2006 年上半年就規定省委書記達 63 歲、副書記達 61 歲、紀委書記達 58 歲皆不再提名，並要求省級黨委班子中，50 歲以下的要有 3 名，45 歲左右的要有 1 名。換屆之後在全國三十一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 98 位黨委書記、副書記中，有 56 人生於 1950 年代，佔總數 57%，有 5 人年齡更是不到 50 歲。而在省級黨委「一把手」方面，平均年齡也僅 58.39 歲，且有 12 人是 1950 年代出生，佔省級黨委書記「一把手」總數的 39%。³⁷⁰ 在學歷方面，98 位省級黨委領導幹部皆具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其中擁有碩士、博士等研究生學歷多達 59 人，佔整體比例約六成，顯示中共對領導幹部知識層面的要求正逐漸提升(圖 4-1)。³⁷¹

最後，「團系」勢力在改選過後持續茁壯。在 2002 年時，團系出身擔任省委書記、省長的職務僅各 3 人，至 2006 年 10 月初止，已經有 9 人擔任省委書記、9 人出任省長職務，而經過本次換屆改選後，至 2007 年 3 月，

<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4/Sep/668376.htm> >。

³⁶⁸ 法制晚報，〈省級黨委換屆結束 年輕化成領導群體特徵〉，《新華網》轉載，2007 年 6 月 30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7-06/30/content_6310429.htm >。

³⁶⁹ 吳仁傑，〈2007 年中共黨政〉，《中共研究》，第 42 卷第 1 期，2008 年 1 月，頁 54。

³⁷⁰ 中國評論新聞網，〈新一輪省級黨政一把手調整 年輕化特點明顯〉，《中國評論新聞網》，2007 年 7 月 26 日，<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4/1/7/3/10041739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417398> >。

³⁷¹ 法制晚報，〈省級黨委換屆結束 年輕化成領導群體特徵〉，《新華網》轉載，2007 年 6 月 30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7-06/30/content_6310429.htm >。

團派擔任省委書記和省長職務的人數分別增長為 10 人、11 人，涵蓋了 31 個省級單位中的 20 個。³⁷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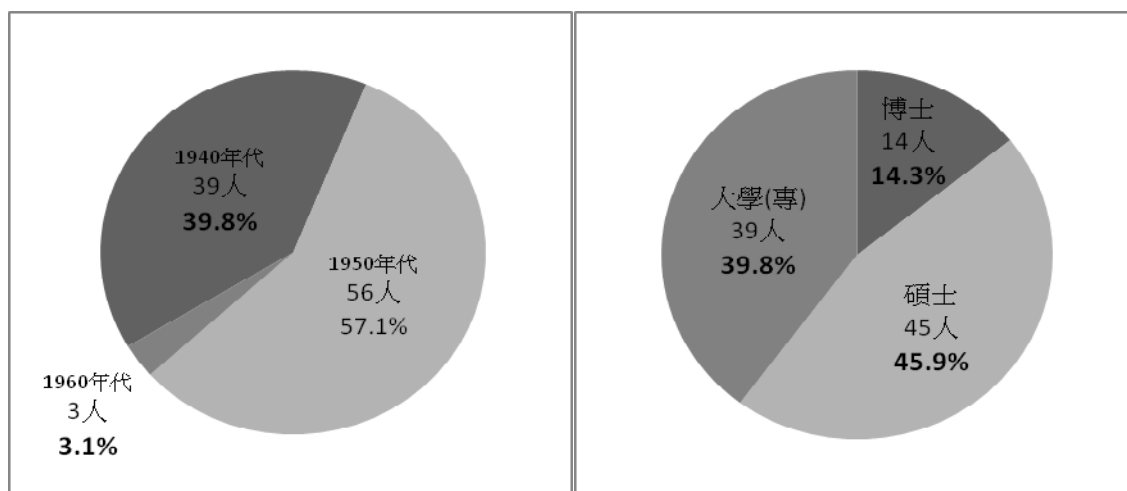


圖 4-1 2007 年省級黨委書記、副書記年齡和學歷結構圖

資料來源：自行繪製

2007 年 10 月 21 日，在「十七大」閉幕之前，2235 名的全國黨員代表和特邀代表在差額比例為 8.3% 的情況之下，選出了 204 名的新一任中央委員，其中有 107 名是新人，佔整體的 52.45%。31 個省市區的黨政「一把手」均當選中央委員，女性名額較上屆增加 8 人，共有 13 名女性委員。³⁷³2007 年 10 月 22 日，在外界猜測政治局常委將維持「9 人制」或變回「7 人制」的情況下，中共召開十七屆一中全會，推選新一屆的中央領導班子，會中選出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和周永康等 9 人為政治局常務委員，包含上述 9 人在內的政治局委員為王剛、王樂泉、王兆國、王岐山、回良玉、劉淇、劉雲山、劉延東、李源潮、汪洋、張高麗、張德江、俞正聲、徐才厚、郭伯雄、薄熙來等 25 人(表 4-1)。

³⁷²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台北：五南，2010 年)，頁 237。

³⁷³ 文匯報，〈新一屆中委 逾半新面孔〉，《文匯報》，2007 年 11 月 22 日，
<<http://paper.wenweipo.com/2007/10/22/CH0710220001.htm>>。

表 4-1 中共第十七屆中央政治局成員

| 姓名 | 出生年/年齡 | 學歷 | 重要職務 | 原職 |
|-----|---------|-----------------|------------------------|---------|
| 胡錦濤 | 1942/65 | 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 |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 政治局常委 |
| 吳邦國 | 1941/66 | 清華大學無線電子學系 |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 政治局常委 |
| 溫家寶 | 1942/65 | 北京地質學院地質構造專業研究生 | 國務院總理 | 政治局常委 |
| 賈慶林 | 1940/67 | 河北工學院電力系 | 全國政協主席 | 政治局常委 |
| 李長春 | 1944/63 | 哈爾濱工業大學電機工程系 | 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主任 | 政治局常委 |
| 習近平 | 1953/54 | 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法學博士 | 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家副主席、中央黨校校長 | 中央委員 |
| 李克強 | 1955/52 |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學位 | 國務院副總理 | 中央委員 |
| 賀國強 | 1943/64 | 北京化工學院無機化工系 | 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 政治局委員 |
| 周永康 | 1942/65 | 北京石油學院探勘系 | 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 | 政治局委員 |
| 王剛 | 1942/65 | 吉林大學哲學系 | 全國政協副主席 | 政治局候補委員 |
| 王樂泉 | 1944/63 | 中央黨校研究生學 | 新疆維吾爾族自 | 政治局委 |

| | | 歷 | 治區委員會書記 | 員 |
|-----|---------|----------------------|------------------|-------|
| 王兆國 | 1941/66 | 哈爾濱工業大學動力機械系 | 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 政治局委員 |
| 王岐山 | 1948/59 | 西北大學歷史系 | 國務院副總理 | 中央委員 |
| 回良玉 | 1944/63 | 吉林省黨校函授班黨政幹部基礎專業(大專) | 國務院副總理 | 政治局委員 |
| 劉淇 | 1942/65 | 北京鋼鐵學院冶金系煉鐵專業研究生 | 北京市委書記 | 政治局委員 |
| 劉雲山 | 1947/60 | 中央黨校函授學院黨政專業 | 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副主任 | 政治局委員 |
| 劉延東 | 1945/62 | 吉林大學行政學院政治學理論專業法學博士 | 國務委員 | 中央委員 |
| 李源潮 | 1950/57 | 中央黨校研究生部法學博士 | 中央組織部部長 | 候補中委 |
| 汪洋 | 1955/52 | 中國科技大學管理科學專業研究生學歷 | 廣東省委書記 | 候補中委 |
| 張高麗 | 1946/61 | 廈門大學經濟系 | 天津市委書記 | 中央委員 |
| 張德江 | 1946/61 | 朝鮮金日成綜合大學經濟系 | 國務院副總理 | 政治局委員 |
| 俞正聲 | 1945/62 |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導彈工程系 | 上海市委書記 | 政治局委員 |
| 徐才厚 | 1943/64 |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電子工程系 | 中央軍委副主席 | 中央委員 |

| | | | | |
|-----|---------|----------------------------|---------|-----------|
| 郭伯雄 | 1942/65 | 解放軍軍事學院學 習 | 中央軍委副主席 | 政治局委 員 |
| 薄熙來 | 1949/58 |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 際新聞專業研究生 學歷 | 重慶市委書記 | 中央委員 |

註1：粗體字為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按排名順序呈現，其餘為政治局委員按姓氏筆劃排列。註2：職務以2008年3月「兩會」結束後為準。

資料來源：新華網，〈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網址：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17da/index.htm>；

國立政治大學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網址：

<http://ics.nccu.edu.tw/chinaleaders/index.htm>(檢索日期2012/11/8)。

本屆政治局委員選任制度有兩項變革：首先，實行「民主推薦」制度，確立中委會有權推薦可新提名為中央政治局組成人員預備人選。2007年6月25日，中共召開黨員領導幹部會議，目的為對可新提名為政治局委員的預備人選作「民主推薦」，與會的人員包括十六屆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和有關負責人員共400餘人。總書記胡錦濤在會中表示，要成為預備人選必須符合幾項條件：(一) 政治堅定，要始終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將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作為重要思想指導，並能深入貫策落實「科學發展觀」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 領導能力強，實踐經驗豐富，有正確的政績關，工作業績突出，受到黨員和群眾的擁護；(三) 潔身自律，思想和工作作風夠硬，在黨內外有良好的形象。另外在年輕化的考量下，預備人選必須為63歲以下的正部長級幹部和軍隊正大軍區職幹部。經篩選過後，中共中央提供一份近200人的名單，供與會幹部推薦時參考。中共黨中央依民主推薦的結果，對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的組成方案多次進行醞釀、聽取意見和組織考察後，提報一份建議名單，經政治局

常委會、政治局委員會審議後，最後提請十七屆中央委員會選舉決定。中共認為這是發揚和完善黨內民主制度的重大突破。³⁷⁴

其次，是取消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設置。自「十四大」以來，政治局遇有人數出缺的情況，不是額外進行增補，就是完全不變動，顯示政治局候補委員未能發揮「遞補」的作用。³⁷⁵如原十四屆政治局委員譚紹文在1993年去世時，其名額並非由當時的政治局候補委員溫家寶或王漢斌遞任，而是在1994年9月的十四屆四中全會另外增補黃菊為政局委員。十四屆的陳希同和十六屆的陳良宇皆因貪汙案被免去政治局委員職務、十五屆的謝非和十六屆的黃菊皆因病去世，當時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皆未能直接遞任，因此取消候補委員的設置，顯然不會對政治局日常運作造成影響。³⁷⁶

二、人事布局之意涵分析

（一）離退年齡下修

十六屆的政治局委員曾慶紅、吳官正、羅幹、吳儀、張力昌、曹剛川和曾培炎皆因年齡因素未能連任，而黃菊和陳良宇則分別因病去世、因貪汙案被罷黜也退出本屆政治局。而論及離退年齡的下修，必須先回溯至「十六大」政治局委員甄補的情況，在「十六大」召開之前，除了江澤民確定得因「十五大」時建立的「七十歲劃線離退」規範而退出政治局外，還有另一人的政治動向最受關注，那就是在喬石離退後，就一直被視為江澤民最主要政治對手的李瑞環。李瑞環到「十六大」時，年齡為68歲，尚不受「七十歲劃線離退」的制約，但「十六大」後，李瑞環不僅退出政治局，也不在中央委員的名單中，許多未經證實的消息大多以權力鬥爭的角度來分析，指稱是江澤

³⁷⁴ 劉思揚、孫承斌、劉剛，〈為了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新華網》，2007年10月24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1498.htm〉。

³⁷⁵ 事實上，自中共「八大」以來，遇有政治局委員名額出缺時，皆非由政治局候補委員直接遞任，中共黨章也未明白規定，政治局候補委員有「遞任」的功用。詳見，丁望，《曾慶紅與夕陽族強人》，頁222-223。

³⁷⁶ 阿波羅新聞網，〈港評：中共十七大人事佈局四個為什麼〉，《阿波羅新聞網》，2007年10月23日，〈<http://www.aboluowang.com/news/2007/1023/60311.html>〉。

民為逼退李瑞環，而在「十六大」時，為其量身打造「七上八下」的年齡限制規範(意即年齡為 67 歲者可擔任政治局委員，但滿 68 歲者則必須退下)，³⁷⁷先不論李瑞環離退的原因為何，但隨著胡溫政權中第三號人物的曾慶紅也在 68 歲時退出政治局，似乎讓政治局委員年齡「七上八下」淺規則的存在更具可信度，也進一步將政治局委員的劃線年齡從 70 歲下修至 68 歲。自「十四大」以來，除了自然死亡和嚴重違法亂紀外，制度化的離退年齡規範儼然已經成為政治局委員最主要的退場機制。

本屆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年齡為 62.3 歲，而全體政治局成員的平均年齡為 61.8 歲，和十六屆政治局常委的平均年齡 62.1 歲及全體政治局成員平均年齡 60.7 歲相比，反而有微幅的增加，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十七屆政治局人員的變動幅度不大，政治局常委會 9 人之中，只有 4 人為新任者，新人比例為 44.4%，而全體政治局委員 25 人中，僅有 9 人為新任者，新人比例更只有 36%。因為新人之中的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李源潮、汪洋、薄熙來等 6 人年齡皆不到 60 歲，才使政治局委員平均年齡不至於明顯老化。

本屆最受關注的人事變動，是在政治局常委會甄補了兩位越級晉升且年齡不滿 55 歲的新人，顯然是為了「十八大」的政治接班作準備。若將「十四大」視為江澤民的第一個完整的任期來看，似乎只有在「改朝換代」之際，政治局才會出現較大幅度的人員變動(圖 4-2)，「十六大」胡錦濤接班時尤其明顯，當時政治局常委會中僅胡錦濤一人為連任狀態，其餘人員皆是新任，若檢視「十七大」政治局常委會人員的年齡，也將出現類似狀況，除了為接班人選的習近平和李克強外，其餘常委在「十八大」皆受離退年齡的限制，必須退出政治局。這是中共為了政局穩定所作的安排，由於現在的中共領導人都不是政治強人，讓繼任者在接班時成為政治局常委會中最資深和最熟悉常委會運作的人，將有利於領導權威的樹立。³⁷⁸

³⁷⁷ 邱平，《第四代爭權內幕》(香港：夏菲爾出版社，2003 年)，頁 44。；金鐘，〈十八大徘徊歧路〉，《開放雜誌網》，2012 年 11 月 2 日，〈<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1012>〉。

³⁷⁸ 柯宇倩，〈寇健文：汪洋至少二十大不任常委〉，《明鏡新聞網》，2012 年 9 月 26 日，〈http://www.mingjingnews.com/2012/09/blog-post_6166.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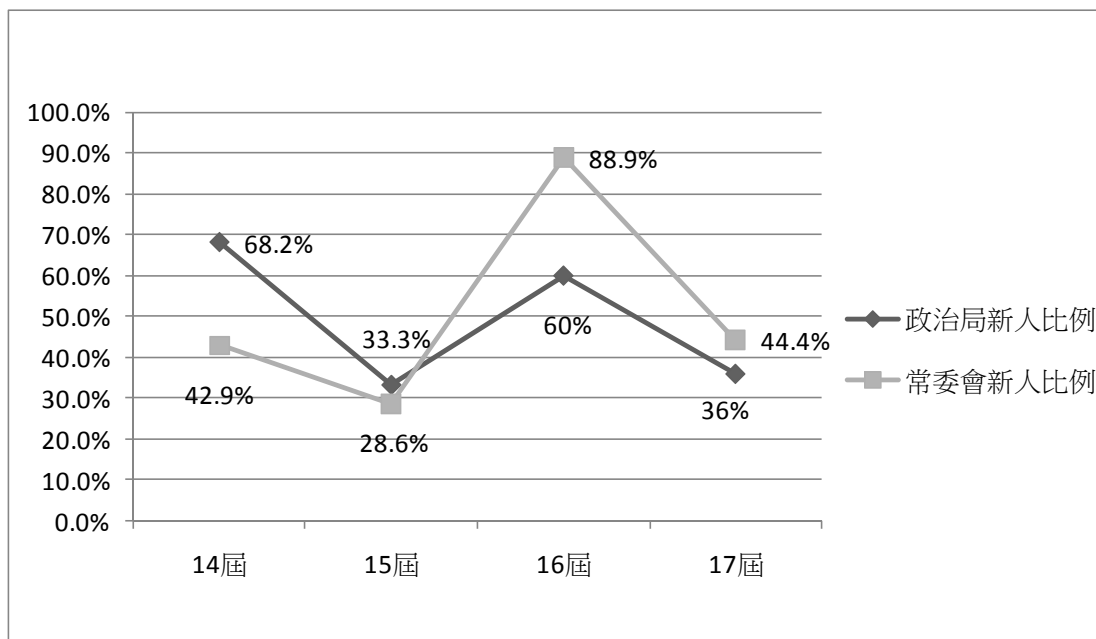


圖 4-2 十四屆以來政治局新人比例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二) 政治局常委「職務分工」的延續

政治局常委會是中共的權力核心，常委會的委員皆分別擔任國家機器各系統的領導職務，讓政治局常委在集體領導的原則下，更具「功能性」，分工負責黨務、政務、人大、政協、軍事等五大職務。十七屆的政治局常委也依循過去政治局常委職務分工的慣例，分別擔任或兼任總書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紀委書記、政法委書記、國家正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常務副總理、全國人大委員長、全國政協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等重要領導職務(表 4-2)，其中除政法委書記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的時間過短，尚無法判斷是否已成規律外，其他職務由政治局常委擔任已是不成文的慣例。³⁷⁹

³⁷⁹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頁 328。

表 4-2 十四屆至十七屆政治局常委的重要職務分工與排名

| 排名 | 十四屆 | 十五屆 | 十六屆 | 十七屆 |
|----|----------------------------|--------------------------------------|----------------------------|--------------------------------------|
| 1 | (江澤民, 連任) 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 | (江澤民, 連任) 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 | (胡錦濤, 連任) 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 | (胡錦濤, 連任) 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 |
| 2 | (李鵬, 連任) 總理 | (李鵬, 連任) 人大委員長 | (吳邦國, 新任) 人大委員長 | (吳邦國, 連任) 人大委員長 |
| 3 | (喬石, 連任) 人大委員長 | (朱鎔基, 連任) 總理 | (溫家寶, 新任) 總理 | (溫家寶, 連任) 總理 |
| 4 | (李瑞環, 連任) 政協主席 | (李瑞環, 連任) 政協主席 | (賈慶林, 新任) 政協主席 | (賈慶林, 新任) 政協主席 |
| 5 | (朱鎔基, 新任) 常務副總理 | (胡錦濤, 連任) 常務書記、國家副主席、軍委副主席(1999~) | (曾慶紅, 新任) 常務書記、國家副主席 | (李長春, 連任) 中央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主任 |
| 6 | (張清華, 新任) 軍委副主席 | (尉健行, 新任) 中紀委書記 | (黃菊, 新任) 常務副總理 | (習近平, 新任) 常務書記、國家副主席、軍委副主席(2010~) |
| 7 | (胡錦濤, 新任) 常務書記 | (李嵐清, 新任) 常務副總理 | (吳官正, 新任) 中紀委書記 | (李克強, 新任) 常務副總理 |
| 8 | | | (李長春, 新任) 中央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主任 | (賀國強, 新任) 中紀委書記 |
| 9 | | | (羅幹, 新任) | (周永康, 新任) |

| | | | | |
|--|--|--|-------|-------|
| | | | 政法委書記 | 政法委書記 |
|--|--|--|-------|-------|

資料來源：整理自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台北：五南，2010 年），頁 334。

另外，從上表來看，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亦出現規律化的趨勢。有別於早期基於權力鬥爭來決定排名，在「十四大」之後，政治局常委主要是依照常委資歷和職務分工兩大原則來排序。除總書記固定排列第一外，其餘常委的排名規則依序是連任者在前，新任者在後。其中新任者又依職務排序，依序為全國人大委員長、總理、全國政協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而常務副總理、中紀委書記尚未出現固定排名，中央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主任則非屬重要職務。³⁸⁰

（三）知識化的領導班子

十七屆政治局人員的組成結構雖然未在「年輕化」有所突破，但是在學歷背景方面則是展現相當高程度的「知識化」。全體政治局 25 位委員之中，除了回良玉和郭伯雄為大學專科畢業外，其餘委員皆有大學本科以上的學歷，其中溫家寶、王樂泉、劉淇、汪洋和薄熙來等 6 人為碩士學歷，而習近平、李克強、劉延東和李源潮等 4 人更是具有博士學歷，這是首次在政治局之中出現具有博士學位者。而在學識領域方面，習近平、李克強、王剛、王樂泉、王岐山、回良玉、劉雲山、劉延東、李源潮、張高麗、張德江、薄熙來等 12 人為社會人文專業背景，已經佔了整體政治局人數的 48%，一改過去由理工背景佔絕大多數的情況。³⁸¹ 對此情形，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劉啟云和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徐湘林認為：「發展中的國家，多傾向於學理科的工程人員治國，但到了一定時期，隨著社會管理的複雜化，國家對社會人文背景的官員需求量將會提升」。³⁸²

³⁸⁰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頁 334。

³⁸¹ 陳德昇、陳陸輝，〈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策略〉，頁 55。

³⁸² 法制晚報，〈省級黨委換屆結束 年輕化成領導群體特徵〉，《新華網》轉載，2007 年 6 月 30 日，〈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7-06/30/content_6310429.htm〉。

若統計「十二大」以來政治局委員教育程度的變化，則可清楚顯示中共對「知識化」的要求益趨嚴格(表 4-3)。中共「十二大」時，正值推行「幹部四化」政策的起步階段，因此政治局委員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中學以下程度占了大多數，為整體的 57.1%，「十三大」之後，政治局委員的教育水平則有明顯的提升，開始以大學本科為主體，「十四大」時，首次出現具有研究生學歷，到「十六大」時，所有委員已經皆具有大學專科以上的學歷，而「十七大」時，不僅研究生以上學歷明顯增加，具有大學本科學歷以上的委員更是已經高達 92%，這樣的趨勢也顯示出學歷已經成為中共考察幹部的重要依據之一，未來具備大學本科(含)以上學歷，將是成為競逐政治局委員職務的基本條件。

表 4-3 十二大以來歷屆政治局成員教育程度

| | 十二大 | 十三大 | 十四大 | 十五大 | 十六大 | 十七大 |
|------|----------------|----------------|----------------|----------------|----------------|----------------|
| 博士 | 0 | 0 | 0 | 0 | 0 | 4 (16%) |
| 碩士 | 0 | 0 | 1 (4.5%) | 2 (8.3%) | 4 (16.7%) | 6 (24%) |
| 大學本科 | 8 (28.6%) | 11 (61.1%) | 15 (68.2%) | 16 (66.7%) | 17 (70.8%) | 13 (52%) |
| 大學專科 | 4 (14.3%) | 2 (11.1%) | 4 (18.2%) | 4 (16.7%) | 3 (12.5%) | 2 (8%) |
| 中學以下 | 16 (57.1%) | 5 (27.8%) | 2 (9.1%) | 2 (8.3%) | 0 | 0 |
| 總計 | 28 人 (100%) | 18 人 (100%) | 22 人 (100%) | 24 人 (100%) | 24 人 (100%) | 25 人 (100%) |

資料來源：根據歷屆政治局成員名單，至國立政治大學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進行交叉檢索，網址：<http://ics.nccu.edu.tw/chinaleaders/index.htm>。

(四) 具省級行政經驗者多

十七屆一中全會時，以地方省級黨政「一把手」身分進入政治局的有上海市委書記習近平、遼寧省委書記李克強、新疆黨委書記王樂泉、北京市長

王岐山、北京市委書記劉淇、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重慶市委書記汪洋、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和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等 10 人。經過 2008 年 3 月「兩會」的人事調整後，仍由政治局委員兼任省級黨委書記的有新疆黨委書記王樂泉、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天津市委書記張高麗、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和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等 6 人。其中北京市、上海市和廣東省三地的省市委書記，自「十四大」開始就一直由政治局委員兼任，且經歷過該職務的領導幹部，無一不進入權力核心。而重慶市委書記一職自 1997 年恢復設立直轄市政府後，首次由政治局委員兼任，形成中國四地直轄市市委書記皆由政治局委員出任的情況，有明顯平衡地方勢力的作用。

十七屆政治局委員 25 人中，先扣除固定的兩位軍方代表後，23 位文人中，僅溫家寶、王剛、劉雲山和劉延東無地方正省部級的工作經驗，其餘 19 人皆有省籍行政經驗(省委書記、省長)。事實上，自「十四大」後，歷屆全體政治局成員(除軍職代表外)，具備省級黨政一把手歷練的比例就逐屆提高，從十四屆的 47.6%、十五屆的 50%、提高到十六屆的 69.6%，到十七屆更是高達 82.6%，除此之外，中共也越來越重視領導幹部的省際交流、部門交流和中央與地方交流的經驗。³⁸³這都顯示改革開放後，省級領導人藉由處理地方經濟發展、失業、貧富差距、政治穩定等社會問題，得以累積豐富的行政經驗，在中共不斷要求提升執政能力的情形下，省級行政經驗已成為晉升政治局委員的優勢條件。

(五) 共青團經歷具競爭優勢

儘管中共在政治運作中相當忌諱拉幫結派，但在「人治」色彩濃厚及封閉式的政治參與之背景下，要僅憑個人學經歷在政治菁英之中脫穎而出，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因此派系政治和關係網路在權力運作與菁英甄補的過程

³⁸³ 寇健文、蔡文軒，《瞄準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領導菁英》(台北：博雅書屋，2012 年)，頁 41。

中，就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³⁸⁴隨著時代的變遷，派系之間的鬥爭不再只糾結於意識形態的爭辯，而是更注重政治權力、資源和利益的分配。³⁸⁵

十七屆政治局委員的派系分布趨勢呈現「團派勢力壯大，太子黨崛起，新海派弱化」的情形。首先，所謂「團派」，廣義來說指的是具有共青團經歷的幹部；狹義上指的是曾經在共青團擔任副局級以上領導職務的幹部。³⁸⁶共青團的組織架構和制度與中國共產黨極為相似，主要可區分為團中央和地方各級團委兩個層級。中國共產黨對共青團有絕對的領導權威，共青團中央委員會受黨的中央委員會領導，而共青團地方各級組織則行雙重領導體制，除了受同級黨的委員會領導，也同時受團的上級組織之垂直領導。³⁸⁷中國共產黨相當重視共青團組織，將之定位為黨的助手和後備軍，向黨輸送幹部，並讓它在青年中扮演政治代理者，負責推展思想教育和政治宣傳，是一個具有相當程度社會動員能力的組織。³⁸⁸

1980年代初期，在幹部任用「四化」的方針下，許多團系幹部在學歷高和年紀輕的相對優勢條件下，受到同樣出身於共青團系統、時任總書記的胡耀邦之提拔，紛紛出任黨政要職，其中曾任職於團中央書記處的胡啟立和王兆國更是曾以第三代和第四代接班人的身分進入中共中央書記處培養。³⁸⁹但隨著1987年胡耀邦下台和1989年胡啟立失勢的影響，使得團系幹部的升遷明顯受挫。

1992年的「十四大」，曾在團中央任職的胡錦濤以第四代接班人身分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並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分工主管共青團業務，並在「十五大」確立接班身分後，團系幹部才開始又有較多的晉升機會。儘管團系幹部之間並不具備共同的價值和利益，嚴格上很難聚成一個「政治派系」，但年輕時在共青團的共同工作經驗，容易讓他們建立起深厚的人脈關係，而

³⁸⁴ 陳陸輝、陳德昇、陳奕伶，〈誰是明日之星？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的政治潛力分析〉，頁18。

³⁸⁵ 林和立，〈中共「十八大」後的派系平衡與改革展望〉，陳德昇主編，《中共「十八大」菁英甄補：人事、政策與挑戰》（台北：印刻文學，2012年），頁58。

³⁸⁶ 寇健文，〈胡錦濤時帶團系幹部的崛起：派系考量 vs. 幹部輸送的組織任務〉，頁60。

³⁸⁷ 丁望，〈胡錦濤與共青團接班群〉（香港：當代名家，2005年），頁86。

³⁸⁸ 同上註，頁36。

³⁸⁹ 吳仁傑，〈中共積極培養「團系菁英」意涵及影響〉，《展望與探索》，第5卷第5期，2007年5月，頁18。

人脈關係是形成派系的重要依據，就胡錦濤而言，身在權力競爭激烈的環境中，他必須建立可以信任的嫡系人馬和執政班底來穩固權力地位，而從與他關係密切的共青團中找尋人才是他的最好選擇。³⁹⁰

2002年「十六大」胡錦濤正式掌權後，團系重要幹部在普遍擁有高學歷、年齡較同級黨政幹部輕及胡錦濤有計畫的培養等優勢條件下，³⁹¹同時，共青團做為黨的預備隊，本身就有為黨輸送幹部的任務，在這樣多重因素的影響之下，使得團派勢力開始又逐漸增長，³⁹²團系幹部多從地方省級領導首長開始歷練，再逐步進入權力核心。

十六屆政治局中的團系成員僅有胡錦濤、王兆國、王樂泉和劉雲山四人，而十七屆政治局中的團系人數則成長一倍，共有8人，佔全體政治局委員總數近三分之一，他們分別是胡錦濤、李克強、王樂泉、王兆國、劉雲山、劉延東、李源潮和汪洋。其中李克強、李源潮和汪洋3人不僅是第一次進入政治局，且都出生於1950年代，被視為第五代的領導班底(表4-4)。

表 4-4 十七屆政治局委員中的團派人物

| 姓名 | 共青團經歷、主要政治經歷 |
|-----|---|
| 胡錦濤 | 1982-1985年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1985-1988年任貴州省委書記；1988-1992年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1992-2002年期間任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中央黨校校長、國家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2002年任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政治局常委 |
| 李克強 | 1993-1998年任團中央第一書記；1998-2007年任河南省長、省委書記與遼寧省委書記；2007年任政治局常委兼國務院總理 |
| 王樂泉 | 1982-1986年任共青團山東省委副書記；1995-2002年任新疆黨 |

³⁹⁰ 寇健文，〈共青團與中共政治菁英的甄補：團中央常委仕途發展調查〉，《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9期，2001年9月，頁24。

³⁹¹ 吳仁傑，〈中共積極培養「團系菁英」意涵及影響〉，頁21。

³⁹² 由冀，〈中共「十七大」：承上啟下的人事政治〉，陳德昇主編，《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台北：印刻出版，2008年)，頁199。

| | |
|-----|--|
| | 委書記；2002 年開始兼任政治局委員和新疆黨委書記 |
| 王兆國 | 1982-1984 年任團中央第一書記兼團校校長；1984-1986 年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書記處書記；1987-1990 年歷任福建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省長；1992-1996 年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中臺辦、國臺辦主任；2002-2003 年任政治局委員、全國政協副主席；2003 年開始任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
| 劉雲山 | 1982-1984 年任共青團蒙古自治區委員會副書記；1993-1997 年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2002 年開始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 |
| 劉延東 | 1982-1991 年任團中央書記；1991-2007 年歷任中央統戰部副祕書長、副部長、部長；2007 年開始任政治局委員兼國務委員 |
| 李源潮 | 1983-1993 年任團中央書記；1996 年任文化部副部長；2000-2007 年歷任江蘇省委副書記、南京市委書記、江蘇省委書記；2007 年開始任政治局委員兼中央組織部部長 |
| 汪 洋 | 1981-1986 年任安徽省團委縣級幹部，共青團省委副書記；1993-1998 年任安徽省副省長、副書記；1999-2003 年任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副祕書長；2005-2007 年重慶市委書記；2007 年開始任政治局委員兼廣東省委書記 |

資料來源：陳德昇、陳陸輝，〈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策略〉，頁 26-27；寇健文、蔡文軒，《瞄準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領導菁英》，頁 298、303。

其次，所謂「太子黨」指的是與中共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有直接血緣關係或裙帶關係且佔據中國黨、政、軍、商各級領導職務的人，³⁹³後來被泛指中共高幹的子弟，或具有政治血緣網路者。十七屆政治局委員中，符合「太子黨」身分的有吳邦國、習近平、李克強、周永康、王岐山、劉延東、李源

³⁹³ 何頻、高新，《中共「太子黨」》(台北：時報文化，1992 年)，頁 10。

潮、張德江、俞正聲和薄熙來等 10 人，已經超過政治局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其中習近平、俞正聲和薄熙來 3 人之父更是中共開國元勳(表 4-5)。

中共元老陳雲推行的「血統論」曾是「太子黨」得以崛起的原因之一。文革結束後，中共清理處罰打砸搶分子和造反派，但卻赦免參與滋事的權貴子弟，因為陳雲認為「我們自己的子弟，將來是我們可靠的接班人，不是清查的對象」、「我們的子弟接班，至少不會反對我們」，以此為契機，許多「太子黨」開始受到提拔。³⁹⁴但隨著時代的演變，中共內部開始對憑藉父輩餘蔭而掌權者不滿，使得「太子黨」身分曾經是政治上的「負數」，³⁹⁵如陳雲之子陳元和鄧小平之女鄧楠皆在「十五大」代表選舉中落選，薄一波之子薄熙來在十五屆中央委員選舉中被差額淘汰掉，而鄧小平之子鄧樸方和習仲勛之子習近平則是名列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的倒數兩名。³⁹⁶

「十七大」後，「太子黨」的勢力再度崛起，或許和同為高幹之後的曾慶紅之提拔有關，³⁹⁷亦或許是受父輩餘蔭之影響，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幹部任用和提拔制度逐漸完善的情形之下，若自身不具備完整的學經歷、地方治理經驗、政績表現、風評等條件，是很難在權力競爭中脫穎而出。³⁹⁸

表 4-5 十七屆政治局中具「太子黨」身分的委員

| 姓名 | 政治血緣網路 |
|-----|-----------------------------------|
| 吳邦國 | 父吳忠性為解放軍少將、指揮學院院長 |
| 習近平 | 父習仲勛為中共元老，曾任國務院副總理、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

³⁹⁴ 蔡詠梅，〈老子革命兒接班〉，《開放雜誌》，第 251 期，2007 年 11 月，頁 36-37。

³⁹⁵ 包淳亮，〈對中共十七大權力接班的一些觀察〉，《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通訊》，第 17 期，2007 年 11 月，頁 11。

³⁹⁶ 蔡詠梅，〈老子革命兒接班〉，頁 37。

³⁹⁷ 蔡詠梅認為曾慶紅是陳雲「血統論」的奉行著，在人事上提拔和重用太子黨人物。且「太子黨」的興起不只存在政治局中，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和軍事將領都有不少具「太子黨」身分的人。詳見，蔡詠梅，〈老子革命兒接班〉，頁 38-39。

³⁹⁸ 陳有為，〈任重道遠的中國政壇新秀〉，《聯合早報》，2007 年 11 月 6 日；陳德昇，〈中共政治繼承轉型與精英甄補變遷〉，陳德昇主編，《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策略》(台北：印刻出版，2008 年)，頁 11。

| | |
|-----|---|
| 李克強 | 父李奉三曾任安徽省蚌埠市中級法院院長、安徽省委文史辦主任 |
| 周永康 | 父周一萍曾任國防科委副政委 |
| 王岐山 | 岳父為中共元老姚依林 |
| 劉延東 | 父劉瑞龍曾任農業部副部長 |
| 李源潮 | 父李幹成曾任上海市副市長 |
| 張德江 | 父張志毅曾擔任濟南軍區炮兵副司令員 |
| 俞正聲 | 父俞啟威(黃敬)為中共元老，曾任天津市市長、國務院第一機械部部長；母范瑾曾任北京市常委兼副市長 |
| 薄熙來 | 父薄一波為中共元老，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顧委副主任 |

資料來源：蔡詠梅，〈老子革命兒接班〉，頁 38。

而相較於「團派」和「太子黨」的興起，「新海派」在「十七大」的權力布局中，則出現逐漸式微的情形，僅剩吳邦國和賈慶林兩人。一方面，在政治現實上，隨著「新海派」領袖江澤民在「十六大」的退休，及之後陳良宇遭到整肅、黃菊病逝、曾培炎和曾慶紅的屆齡離退，都使得「新海派」已經沒有足夠的政治實力能夠和胡溫體制抗衡，³⁹⁹另一方面，在「十七大」前後兩次的上海人事布局中，皆是由中央空降兩位市委書記(習近平、俞正聲)至上海擔任領導職務，而非由上海代理市委書記韓正真除，這也顯示胡溫體制藉由「摻沙子」的方式，來清除上海幫的舊勢力。⁴⁰⁰

但是儘管如此，「十七大」的人事安排亦不乏出現派系妥協的痕跡，如在吳官正和羅幹離任後，接替其位的是賀國強和周永康，他們兩人同樣被視為江系色彩濃厚的人物，⁴⁰¹且屬胡錦濤親信的令計畫雖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卻未依循往例進入政治局。

³⁹⁹ 陳德昇、陳陸輝，〈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策略〉，頁 56。

⁴⁰⁰ 寇健文、蔡文軒，〈瞄準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領導菁英〉，頁 226。

⁴⁰¹ 許志嘉，〈中共十七大的幾點觀察〉，《銘傳一週網路版》，2007 年 11 月 26 日，〈<http://www.week.mcu.edu.tw/oldweek/685/speek.htm>〉。

綜觀「十七大」的權力安排，儘管中國政治在傳統上允許最高領導人有較大的派別份額，而團派幹部也因年輕幹練和學經歷完整容易受到重用和提拔，但在派系平衡的考量下，不至於出現「團天下」的局面。⁴⁰²一方面是因為啟用過多團系幹部，可能引發政治排擠效應，導致政治對立，將不利於穩定政局；另一方面，在政治治理和治國能力的考量下，團系幹部未必都是適任人選。⁴⁰³

第三節 中共政治繼承佈局之分析

一、習近平之政治經歷

習近平，1953年6月出生，陝西省富平縣人，其父習仲勛是中共革命元老，因此其出身屬「根正苗紅」，但他並未如同多數「太子黨」過著順遂的生活，習近平在童年時便遭遇家道中落。1962年9月，其父習仲勛因受「劉志丹事件」影響，⁴⁰⁴被打為反黨分子，除了被免去國務院副總理等黨內外一切職務，在1964年審查結束後，被貶至河南省洛陽縣的工廠，接受思想和勞動改造，文革期間因為遭到批鬥，而被周恩來接至北京保護，⁴⁰⁵直至1978年才得以復出工作。

習近平在遭逢家庭變故之際，於1969年1月響應毛澤東發起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活動，成為陝西省延川縣梁家河大

⁴⁰² 由冀，〈中共「十七大」：承上啟下的人事政治〉，193。

⁴⁰³ 陳德昇、陳陸輝，〈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策略〉，頁57。另外，曾任團中央常委的張祖樞指出，團系幹部通常能言善道，學習和組織能力強，思想開放，長於意識形態和政治宣傳工作，但較缺乏行政管理和經濟管理能力。詳見張祖樞，〈政改沒戲唱團派崛起有隱憂〉，《開放雜誌》，第250期，2007年10月，頁29。

⁴⁰⁴ 1960年代，中共在歷經高崗和饒漱石的反黨事件後，對意識形態和思想教育的工作特別謹慎，1962年，習仲勛因一本《劉志丹》小說被誣陷為反黨分子。劉志丹是中共的革命家，1956年左右其弟劉景範之妻李建彤開始撰寫以「劉志丹」為名的小說，由於內容事涉敏感的中共黨史問題，在習仲勛再三要求修改和審閱之後才得以出版。但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由康生率先發難，指該本小說中的虛構人物有影射高崗之嫌，是企圖為「高饒事件」翻案，全會在批判的基礎上，以文字獄方式認定該本小說不僅偽造中共黨史，且有鼓動反黨之實，並要曾經審閱該小說的習仲勛負責，毛澤東在全會上一席「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談話，致使習仲勛被打為反黨份子，直至1979年才得以平反。詳見何頻、高新，〈中共「太子黨」〉，頁197-199。

⁴⁰⁵ 楊中美，〈新紅太陽：中共第五代領袖〉，頁62-64。

隊知青，同農民一起工作，因受父親習仲勛政治事件之影響，直至1974年1月才得以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習近平於1975年開始在清華大學化工系學習，至1979年取得大學文憑後，被分到國務院辦公廳，擔任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國防部長兼政治局委員耿飆的秘書。在耿飆離開軍委職務之後，習近平也開始到地方工作。⁴⁰⁶

1982年，習近平到河北省正定縣任縣委副書記、書記。1985年，轉往福建工作，開始長達近18年的福建工作生涯，這期間他也利用工作之餘，進行在職進修，取得清華大學法學院博士學位。⁴⁰⁷ 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時，歷任廈門市副市長、寧德地委書記、福州市委書記，期間皆表現不俗，為自己增添了晉升的優勢條件。⁴⁰⁸

1999年至2002年間任福建省委副書記、代省長、省長。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因福建地處沿海的地利之便，使他能夠更加熟稔中央的「改革開放」政策，同時，他也大力倡導兩岸經貿合作事項，積極參與對台事務，協助台商在當地發展，這都讓他成為「知台派」的一員。此外，他提出「有限政府」的概念，強調政府職能應該有所轉變，有所為有所不為，應向社會提供更多公共服務，以滿足社會需求。另外，習近平在工作期間也相當重視「人和」，延續擔任耿飆秘書時的軍方淵源，相當關照當地軍方的利益，也重視和軍方打交道，另外也傳聞他在福建期間，與全國政協主席、前福建省委書記賈慶林保持不錯的關係，⁴⁰⁹ 這些作為，都讓他頗獲好評。

2002年11月至2007年3月，習近平調任浙江，任省委書記，為浙江「第一把手」。浙江為一經濟大省，有良好的建設基礎，自「改革開放」以來始終保持水準之上的經濟成長率，但也開始面臨高速發展過後，所帶來的

⁴⁰⁶ 宗多吉，《六虎相爭十八大》（美國：明鏡出版社，2009年），頁25-26。

⁴⁰⁷ 許多資料都對習近平的博士學歷有所質疑，主要原因是習近平並無碩士學歷，依規定無法攻讀博士學位；另外習近平的博士論文題目為《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似乎也與法學毫無相干。詳見同上註，頁57-59；寇健文、蔡文軒，《瞄準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領導菁英》，頁284。

⁴⁰⁸ 何頻、高新，《中共「太子黨」》，頁203-206。另外，習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間也曾有爭議事件傳出。1999年，廈門爆發涉及金額龐大的「遠華走私案」，因習近平常期在福建工作，曾一度被認為可能因此事受到牽連，但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以積極配合和協助中央調查的態度，安然度過此危機，以他日後的仕途來看，此事顯然對他無太大影響。詳見，高曉，《習近平－中國新領導人》（台北：高寶國際，2011年），頁207-208。

⁴⁰⁹ 寇健文、蔡文軒，《瞄準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領導菁英》，頁286-287。

問題，其中包括工業用地規劃不良、耕地銳減、能源瓶頸、環境汙染和投資代價區大..等問題，急需進行經濟成長方式的轉變。⁴¹⁰為了重新替浙江訂定發展戰略，習近平在浙江各地進行考察後，提出打造生態浙江、文化浙江、發揮深海資源優勢等 8 項措施，而且他認為浙江要主動接軌長江三角，與上海和江蘇合作，促進滬蘇浙三地資源共享、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打造長三角經濟一體化的局面。⁴¹¹

習近平更提出「騰籠換鳥」策略，他認為：「既不能增加資源和環境的消耗，又要以一定的速度把握戰略機遇，浙江唯一的出路就是轉變經濟成長方式，實現產業轉型」⁴¹²。在他主政之下，浙江實現「又好又快」的經濟發展方式，在 2006 年時，浙江生產總值 15,649 億元，5 年年均增長 13.6%，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 10.8%，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長 7.9%，地方財政收入年均增長 25.4%。另外，在基層選舉方面也有所突破，浙江的奉化、溫嶺、東陽等地先後進行了村級民主的試點工作，在制度方面做出新的嘗試，其中包括選舉方式、民主參與、代表問責、民主聽證等。⁴¹³

2006 年 7 月，中科院在組織大規模的研究和調查後，召開「浙江經驗與中國發展」課題成果彙報暨研討會，會中報告指出，浙江省成功的從經濟實力處於中等偏下水平的省分轉變為經濟大省，在文化建設方面取得後來居上的成就，不僅實現人口結構現代轉型，就業結構方面也逐步呈現高度的非農業化，浙江經驗的普遍意義在於領會了科學發展的核心是人的問題，形成一個經濟和社會發展相適應的階層結構。另外，中國社會科學院也與浙江省合作，組織「浙江經驗與中國發展」研究課題組，從 2005 年啟動，歷經一年半的研調後，將報告成果匯集出版成冊，題為《浙江經驗與中國發展—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建設在浙江》。該報告肯定浙江在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建構和諧社會的實踐中取得了新鮮經驗，不僅具普遍意義，也是浙江自改革開

⁴¹⁰ 高曉，《習近平—中國新領導人》(台北：高寶國際，2011 年)，頁 213。

⁴¹¹ 楊中美，《新紅太陽：中共第五代領袖》，頁 80。

⁴¹² 高曉，《習近平—中國新領導人》，頁 217。

⁴¹³ 寇健文、蔡文軒，《瞄準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領導菁英》，頁 287。

放以來的重大成就。⁴¹⁴至此，「浙江模式」儼然已經成為習近平在仕途上最大的政績和政治資本。

2006年，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因貪汙案被開除黨職和公職，上海市委書記一職先由上海市長韓正代理，2007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空降」習近平到上海任市委書記，顯然有穩定上海局勢、安定民心和派系平衡的考量，由習近平擔任上海市委書記一職，打破了過去20多年，該職都是由上海當地幹部直升的紀錄。依照慣例，上海市委書記一直都是政治局委員的當然人選，習近平出任該職，也已註定他在「十七大」時將會進入權力核心。

2007年3月24日，中央組織部部長賀國強向上海幹部介紹習近平時，他說：「政治上強，有較高的思想水平；熟悉黨務和經濟工作，宏觀決策能力比較強，領導經驗豐富，組織領導和駕馭全局能力強。」⁴¹⁵習近平到上海時的主要工作，就是在「陳良宇事件」後，上海要召開黨員代表大會之際，協助選出上海新的領導班子，確保黨員幹部在反腐問題上能和中央保持一致，以矯正貪瀆之風。另一方面，中共在積極營造上海「新人事、新氣象」的氛圍，2007年7月21日，《人民日報》一篇題為〈喜聽上海新濤聲〉的文章，該文讚揚習近平治下的「新上海」不再自私，而是顧大局的與鄰近省份合作發展，且更加重視照顧弱勢社群的需要，以及正視反腐倡廉的工作。⁴¹⁶但是未料，習近平僅在上海待了7個多月，便在「十七大」時，被選為政治局常委，離開上海，轉赴北京。

二、李克強之政治經歷

李克強，1955年7月生於安徽省定遠縣。1974年中學畢業後，到安徽省鳳陽縣農村插隊落戶，1976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該地的黨支部書記。1978年，中國恢復高考制度，李克強考進北京大學法律系，在求學期間，相當熱衷學生活動，曾經擔任北京大學學生代表和常代會主席，1982

⁴¹⁴ 宗多吉，《六虎相爭十八大》，頁69-70。

⁴¹⁵ 楊中美，《新紅太陽：中共第五代領袖》，頁88。

⁴¹⁶ 相江宇，《習近平李克強合傳》（香港，明鏡出版，2009），頁214-215。

年大學畢業後，留校擔任團委書記。1983年因受推薦至團中央工作，而放棄出國留學的機會，與此同時，胡錦濤在團中央擔任領導幹部，兩人曾有共事關係，李克強負責協助胡錦濤處理北京高等學校的團委工作，這一段經歷被視為李克強得以在日後仕途上平步青雲的原因。⁴¹⁷

李克強在團中央的資歷長達15年之久，團系色彩濃厚，期間歷經王兆國、胡錦濤、宋德福的領導，分別擔任過團中央學校部部長、候補書記處書記兼全國清聯副主席等職，在1993年正式被選為團中央第一書記，李克強在工作之餘，不忘進修，攻讀碩士、博士學位，其論文《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曾經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項—孫治方經濟論文獎。⁴¹⁸

1998年，李克強離開團中央，到地方工作，任河南省代省長，並於2002年升任河南省委書記，當時他年僅43歲，是中國最年輕的省級「一把手」。河南是人口和農業大省，李克強到河南後，致力於調整產業、產品、城鄉、和人才結構，以加快工業化進程、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推進農業現代化、鄉村城鎮化、積極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和提高教育水平。⁴¹⁹2003年時，河南的人均GDP從1998年的4976元、全國排名第21位，提昇到7590元、全國排名上升至第18名；此外，糧食產量在2004年突破歷史紀錄，居中國首位，也讓當地農民的收入到達2550元，年增長為14%，是河南8年來首次實現兩位數增長，也是首次超過城鎮居民收入的增幅；另外，河南在2003年時，國內生產總值突破7000億元大關，經濟總量連續7年居中國中西部之首。⁴²⁰這些數據再再都顯示李克強主政下的河南，經濟發展成績亮眼，讓河南成為「中原崛起」戰略中的領導者。

但李克強治下的河南，雖然在經濟方面有所成就，在治理方面也有不少爭議事件，其中最為人詬病的就是「愛滋村事件」和幾次的人為災害。1990年代初期，河南各級衛生部門放任民間賣血，致使助長「血液經濟」，在共

⁴¹⁷ 丁望，《胡錦濤與共青團接班群》，頁250。

⁴¹⁸ 艾仰樺、陳曉銘，《胡錦濤的團隊》（香港：明鏡出版，2007年），頁221。

⁴¹⁹ 楊中美，《新紅太陽：中共第五代領袖》，頁102-103。

⁴²⁰ 法悟、穆易，〈中原憑什麼崛起〉，《中國經濟週刊》，第7期，2005年2月，《人民網》轉載，〈<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1631/14124/1258892.html>〉。

用針頭的情況下，導致愛滋病氾濫且情況持續蔓延，1999年，由桂希恩醫生揭發此事後，河南當局不但未重視「愛滋村事件」，反而封鎖有關消息，後來，同樣注意到此事的高耀潔醫生也不斷向河南政府提出警告，呼籲正視該問題的嚴重性，但卻反而受到河南當局的打壓、跟蹤和脅迫，「愛滋村事件」的起源雖然在李克強赴豫工作之前，但李克強被認為須負相關責任，因其在任時沒有足夠重視和採取有效的杜絕措施，致使疫情不受控制而持續擴大。⁴²¹

另外，李克強在河南期間也發生幾次重大公安事件。2000年3月，河南焦作市發生大火，造成74人死亡，同年12月，洛陽市東都歌舞廳也發生火災，造成309人死亡，由於傷亡慘重，引起中共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重視，派員協助調查原因和處理善後工作，有消息指出，時任河南省長的李克強，在「問責制」下，被記大過處分。⁴²²2004年10月、11月又分別發生礦難事件，總計造成181人遇難，32人受傷，而礦難發生的主因是因為礦主行賄有關官員，在得不到安全認證的情況下，強行開採。⁴²³這幾次的重大人為災害，都致使李克強讓人留下政績不佳的觀感。

2002年11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李克強調任遼寧，任省委書記一職，擔負「振興東北」的任務。遼寧為一工業大省，不僅聚集了中國十分之一的國有企業，且居渤海和東北亞經濟圈的關鍵地域，但是在市場經濟的浪潮下，使得虧損企業年年增加。李克強從農業大省轉調工業大省，不僅顯示中共中央有意借重其在河南推動的產業結構轉型，也凸顯出中央有意讓其經由不同省份的歷練，來提昇執政能力和治理經驗。⁴²⁴

李克強在遼寧省委書記任內也有所表現，透過對傳統產業進行產業升級、發掘沿海地帶資源、整合國內外資金和技術、提出「五點一線」⁴²⁵策略

⁴²¹ 寇健文、蔡文軒，《瞄準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領導菁英》，頁294。

⁴²² 丁望，《胡錦濤與共青團接班群》，頁255。另外，也有資料顯示，當時的省委書記陳奎元和省長李克強在事後向中共中央自起處分，但最後不了了之。詳見，宗多吉，《六虎相爭十八大》，頁145。

⁴²³ 宗多吉，《六虎相爭十八大》，頁146。

⁴²⁴ 艾仰樺、陳曉銘，《胡錦濤的團隊》，頁227；楊中美，《新紅太陽：中共第五代領袖》，頁108。

⁴²⁵ 「五點一線」指的是將大連長興島、大連花園口岸工業園、營口沿海產業基地、錦州灣產業園

以發揮遼寧優勢、振興東北老工業區措施等措施，在經濟發展上，有所貢獻。在 2006 年時，遼寧的 GDP 增長了 13.8%、地方一般收入增長了 21%、外商投資增幅 66%、城市居民和農民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了 12.6%、9%。⁴²⁶

除此之外，李克強也相當重視民生議題。他成功地完成遼寧長期必須解決的棚戶改造工程，讓棚戶區的居民能夠有更安穩的住所，也使過去破舊不堪的棚戶區能夠獲得有效的管理。⁴²⁷同時他推出「一號民心工程」，來減少失業問題，強調每戶人家，至少有一人就業。⁴²⁸在「十七大」召開前夕的 2007 年 3 月，中共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刊出一篇題為〈李克強：在推進遼寧老工業基地振興中改善民生〉的文章，內容讚揚遼寧在李克強治理之下，不僅走上「又好又快」的發展軌道，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也切實解決群眾生活和生產的困難，成功地建構和諧的遼寧。⁴²⁹大大提升了李克強在「十七大」時政治行情。2007 年 10 月，如一般外界所預料，李克強順利進入政治局常委會。



三、接班布局之探討

李克強在仕途上一直領先於習近平與其他競爭者，在「十五大」時，李克強不僅已經晉升為正省部級幹部，擔任團中央第一書記，且被選為中央委員；於此同時，習近平擔任屬副部級職務的福建省委副書記，並名列十五屆中央候補委員的最後一名。2004 年，李克強調任遼寧省委書記時，也率先取得多個省份歷練的經驗，再加上他與胡錦濤的淵源，讓他一直被外界視為胡錦濤之後的接班人。另一方面，由於中共相當重視政局的穩定，會盡量避免頻繁的人事變動，而習近平在離「十七大」召開只剩半年左右，調任上海

區、丹東產業園區這五個地方作為重點發展區域並聯接起來，建設一個貫穿黃渤海沿岸的濱海公路，形成沿海經濟帶，以帶動遼寧中部城市的發展。

⁴²⁶ 宗多吉，《六虎相爭十八大》，頁 160。

⁴²⁷ 寇健文、蔡文軒，《瞄準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領導菁英》，頁 295。

⁴²⁸ 楊中美，《新紅太陽：中共第五代領袖》，頁 109。

⁴²⁹ 相江宇，《李克強班底》（香港：明鏡，2011 年），頁 82。

市委書記，顯示他不可能被胡錦濤視為接班的第一人選，而且媒體在分析和預測「十七大」政治局常委名單時，也大多忽略習近平。⁴³⁰

但是，2007年10月22日的十七屆一中全會後，習近平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不僅先於李克強，且在這之後依循「胡錦濤接班模式」，分別兼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家副主席和中央黨校校長，這已顯示此時習近平的接班順位明顯優於李克強。由於中共最高權力機關的人事安排仍屬黑幕決策，詳細的原因很難被外界得知，因此僅能從結果來推敲可能的原因。

在不斷要求幹部提升執政能力的情形下，中共精英甄補受制度化因素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作為接班人選，有幾項基本條件要求，其中主要可以歸納為年齡條件和經歷要求。

所謂年齡條件指的是必須在年紀方面具有優勢。隨著離退年齡下修至68歲，且在穩定政局的考量下，作為接班人，必須能夠在正式接班後，連任兩屆，而不受離退年齡的制約。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皆是1950年代出生，到了「十八大」時，年僅59歲和57歲，在離退年齡沒有變動的前提下，兩人在「十九大」尋求連任時，年齡分別是64歲和62歲，皆可順利渡過年齡限制。在經歷方面，根據前文所述，兩人都具博士學歷，且在「十七大」前皆是中央委員，也都曾任省級「一把手」，且皆具省際交流經驗。作為接班人選，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在制度性條件不相上下的情況，「非正式政治」似乎成為影響接班順位的關鍵。

隨著鄧小平時代的結束，也宣告了強人政治的終結，中國從毛澤東、鄧小平一人專權的強人治國轉向集體領導，而集體領導不免牽涉到人的「關係」，就某種程度而言，是助長了派系政治的活躍。⁴³¹但必須先體認的是，不同派系之間不必然只存在緊張的對立關係，雖然競爭之下，可能導致派系惡鬥，但亦有可能彼此合作和妥協，尤其是對中國這樣「人治」色彩濃厚的

⁴³⁰ 如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預測首次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的可能人選有李克強、張德江、王兆國、俞正聲和周永康；而《南華早報》則預測李源潮、張德江和俞正聲等人會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亞洲周刊》則推敲張德江、王剛、王兆國和李克強四人是政治局常委新人...等。詳見寇健文，〈中共十七大與政治菁英的新老交替〉，《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通訊》，第15期，2007年9月，頁6-7。

⁴³¹ 李成，《通往中南海之路》（紐約：明鏡出版，2012年），頁4。

國家，為了確保政治局勢的安穩和穩固中共的執政地位，維持派系和諧及相對下的派系平衡，就顯得相當重要。⁴³²

習近平在中共黨內的淵源，主要來自於兩大範疇：（一）他是習仲勳的兒子，且其父因為在文革時期遭貶，沒有得罪其他老幹部，反而在復出之後，協助平反文革期間的冤錯假案，讓習近平可以獲得較多老幹部的支持；（二）他曾任耿飆的秘書，具有其他競爭者所缺少的軍方淵源，讓他有可能較獲軍方勢力支持。⁴³³但是儘管如此，在團系勢力壯大，且有明顯支持對象的情勢下，要擠進最高權力核心，仍需要得到更多和更有力的支持。

香港《開放雜誌》、傳記作家楊中美和《多維新聞網》皆在各自文章中指稱習近平是在江澤民和曾慶紅的支持下，以黑馬之姿進入政治局常委會，並以此反制胡錦濤安排的接班計畫。⁴³⁴就中共政治的不透明性，外界很難求證此一消息的真實性，但若環顧上述客觀環境因素，此一論點似乎也有所依據。

另外，眾多資料也皆顯示，胡錦濤在「十七大」所推行的「民主測評」是讓習近平的接班順位先於李克強之關鍵。由於其為中共元老的後代、擁有不錯的政績、待人處事謙和等原因，讓他在黨內的支持度始終領先於李克強，這不僅凸顯出習近平在中共黨內擁有不錯的人際關係，也顯示在中共屢次面臨統治合法性危機的時刻，習近平的「紅」比李克強的「專」更讓老幹部放心。⁴³⁵

⁴³² 鄭永年，《胡溫新政：中國變革的新動力》（新加坡，八方文化，2004年），頁190。

⁴³³ 寇健文、蔡文軒，《瞄準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領導菁英》，頁285。

⁴³⁴ 俞文學，〈胡錦濤人事大敗記〉，《開放雜誌》，第251期，2007年11月，頁15；楊中美，《習近平：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中共新領導人》（台北：時報文化，2011年），頁183-185；多維新聞網，〈多維判斷：十七大政治局常委三下四上〉，《多維新聞網》，2007年10月5日，〈<http://politics.dwnnews.com/news/2007-10-05/3343463.html>〉。

⁴³⁵ 學者高輝在接受訪問時指出，習近平在共黨內部類似假投票的選舉中，取得接班位子；學者楊開煌和寇健文也都在其文章中，提到「民主測評」是影響習近平進入權力核心的原因。詳見寇健文、蔡文軒，《瞄準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領導菁英》，頁288；楊開煌，〈中共政治發展初探：以人事接班與重大政策之決策機制為例〉，發表於「中共十七大觀察報告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7年12月16日），頁21；陳奕廷，〈誰是胡錦濤接班人？團派李克強最受矚目！〉，《NOWNEWS新聞網》，2007年10月15日，〈<http://www.nownews.com/2007/10/15/10844-2171176.htm>〉。

另一方面，就胡錦濤而言，在黨內已經對於團派勢力壯大表示不滿的情形下，接受派系色彩不明顯的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競爭接班，不僅有助於消除其他派系給予的政治壓力，亦有助於平衡政治勢力，⁴³⁶事實上，胡錦濤在「十六大」正式接班時，必須在政治局常委會中「江派人馬」佔絕大多數的情形下，來建立和鞏固領導地位，為了保持政事運作順暢，他與其他派系人員一直保持著不錯的關係，因此，他更是深知維持黨內和諧和派系平衡的重要。⁴³⁷若在此時，強硬安排李克強一人接班，勢必將遭受更大的反彈。將接班安排交由民主評測或派系妥協的集體決定，將有助於制度的建立和降低自身所承受的政治風險。⁴³⁸

綜觀整個「十七大」的接班安排，不論是派系妥協或是民主推薦制度下的兩人並列接班安排，皆顯示指定接班已經無法繼續存於中國政治上，縱使胡錦濤在「十七大」時已達權力鞏固階段，在人事安排上，亦無法專斷獨行，必須與他人商量。是以鄧小平之後，中國難以再出現政治強人，競逐權力接班者必須先符合制度化的甄補條件，再通過黨內高層派系之間的競爭和妥協過程，將消除單憑領導人個人好惡決定政治繼承的弊端，習近平的出線，顯示他是各派系都較能接受的人選，而非單一派系的決定，這樣的發展，也宣告將使中共的權力競逐更加多元。

⁴³⁶ 何頻，〈胡錦濤接受習近平更有利〉，《看中國》，〈<http://m.kanzhongguo.com/node/215220>〉。

⁴³⁷ 學者鄭永年和由冀皆認為「十六大」時的人事安排，不僅讓胡錦濤成為首位在中共權力核心中，沒有明顯派系支持的總書記，也違反中共黨內派系平衡的準則。詳見，鄭永年，《胡溫新政：中國變革的新動力》，頁 188；由冀，〈中共「十七大」：承上啟下的人事政治〉，頁 195。

⁴³⁸ 楊開煌，〈中共政治發展初探：以人事接班與重大政策之決策機制為例〉，頁 21。



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寫作即將告一段落時，中共「十八大」已經在2012年11月初於北京召開，因此本論文立刻面臨一個必須說明的問題：何以在「十八大」召開之後，本論文仍有研究之價值？換言之，本論文的學術價值為何？

筆者認為將「十七大」作為主要的研究範圍仍有一定的價值，乃是基於以下原因：「十七大」在某種程度上是揭示胡錦濤時代的來臨。胡錦濤雖然在2002年的「十六大」就正式接班，但若從當時政治局常委會的名單和「扶上馬，送一程」的軍權交接過程來看，足以顯示江澤民對「十六大」的權力安排著墨甚深，致使胡錦濤在接任初期，必須受到江派勢力的掣肘，因而讓他曾被視為一個弱勢領導。在此之後，胡錦濤運用黨政正式職務所賦予的權力，以加強地方省級領導的人事安排和掌握意識形態的主導權來穩固自身的權力基礎，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進一步正式成為黨、政、軍的最高領導人後，更有利於他鞏固權威。至「十七大」時，隨著團系出身的政治局委員人數的增長和「科學發展觀」的寫入黨章，在在顯示胡錦濤的影響力已是今非昔比。換言之，「十七大」乃是研究胡錦濤執政時期必須關注的焦點。而且未來研究「十八大」，甚至是「十九大」的權力繼承和政治甄補也勢必要有對「十七大」的研究基礎。故而，吾人以為本論文雖發表於「十八大」已然召開之後，但仍有其價值。

因此，屬於中共權力核心的政治局，在進行人事更迭的時候，勢必參雜許多複雜因素，在這樣的出發點下，本文從歷史的回顧，以融合非制度性和制度性因素的方式，觀察和歸納非正式政治和甄補規範在人事運作中的影響力，並企圖釐清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本章將總結前文的論述，並提出研究之後的發現，同時也對研究不足的部分做出檢討和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復出，便有感於派系惡鬥和幹部新老交替的阻塞將嚴重影導到黨的執政地位和國家發展，此時的他，積極建章立制，為幹部人事制度提出改革，在他的努力之下，雖有初步的成效，但1987年和1989年時，接連兩位中共最高領導人在權力鬥爭之下，遭到罷黜，依舊顯示出權力繼承機制的不足，在這之後的鄧小平，持續發揮影響力，擔任建立政治繼承機制的推手，輔佐江澤民為第三代領導核心。1997年，鄧小平的死亡，也宣告了強人時代的終結，在無魅力型權威領袖的情況下，反而為中共的權力繼承機制開啟新的局面，本文從非制度因素與制度性因素的角度出發，探究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對中共菁英甄補的影響，而有以下結論：

一、中共政治菁英甄補的確有「制度化」之趨勢，其中包括年齡限制、任期規範、學歷要求、政治局常委會的職務分工和「循序漸進、逐級晉升」等規範。

首先，必須先說明的是，本文所指稱的「制度化」不等同「已經制度化」的概念，而是指政治菁英之間，對於權力分配、權力移轉的行為規範與程序，逐漸形成共識且願意遵守的過程，它是一個動態的演進過程，有別於「已經制度化」之靜態且用成文規定的意涵。⁴³⁹

(一) 年齡限制：根據本文第三章的論述，政治局委員的離退年齡規範，在「十五大」時正式形成，當時除了江澤民因是第三代領導核心，為了顧及政治局勢的穩定，而不受規範之約束外，其餘成員皆受「七十歲劃線」的制約。而自「十六大」開始，不論離退年齡是「七十歲劃線」或是「七上八下」的規定，年齡限制已經呈現「一刀切」的狀態，無人能夠被排除在外，這無

⁴³⁹ 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頁 71。

疑說明，離退年齡規範在政治菁英之間已具有高度的共識，且作為甄補制度的趨勢相當明顯。

另外，除了年齡限制外，自「十四大」開始，政治局成員的年齡結構，在老、中、青方面也一直維持著與最高領導人同世代為主，年輕世代為輔的比例，以利於接班梯隊的建制，⁴⁴⁰ 這樣安排的除了有適時地提拔年輕幹部以利權力核心的新陳代謝之用意外，也能夠在新老交替之際，讓經驗較豐富的領導幹部發揮傳、幫、帶的功能，以維持政局的穩定和提升執政能力(表 5-1)。

表 5-1 十四大以來政治局成員的年齡結構

| | 十四屆 | 十五屆 | 十六屆 | 十七屆 |
|---------|------------|------------|------------|------------|
| 71 歲以上 | 2 (9.1%) | 1 (4.2%) | 0 (0%) | 0 (0%) |
| 66~70 歲 | 4 (18.2%) | 9 (37.5%) | 2 (8.0%) | 3 (12.0%) |
| 61~65 歲 | 9 (40.9%) | 5 (20.8%) | 9 (36.0) | 15 (60.0%) |
| 56~60 歲 | 4 (18.2%) | 6 (25.0%) | 13 (52.0) | 4 (16.0%) |
| 51~55 歲 | 1 (4.5%) | 3 (12.5%) | 1 (4.0) | 3 (12.0%) |
| 50 歲以下 | 2 (9.1%) | 0 (0%) | 0 (0%) | 0 (0%) |
| 總計 | 22 人(100%) | 24 人(100%) | 25 人(100%) | 25 人(100%) |

資料來源：自行整理

(二) 任期規範：若將政治局常委和不具常委身分的政治局(包含候補)委員分為兩個層級來看，檢視自「十四大」以來，政治局常委和委員的任職時間後，發現常委任期超過十年的僅有江澤民、李鵬、李瑞環和胡錦濤，而習近平和李克強在「十八大」正式接班後，若順利連任至「二十大」時，擔任政治局常委的任期也將超過十年；另一方面，不具常委身分的政治局委員任期超過十年的有田紀雲、李鐵映和丁關根。這其中江澤民、李鵬、李瑞環、田紀雲、李鐵映和丁關根皆是在「十四大」之前就進入政治局擔任常委

⁴⁴⁰ 吳仁傑，〈中共權力繼承機制探討與展望〉，頁 61。

或委員職務；而胡錦濤、習近平和李克強均是被視為接班培養的人選，意即儘管中共在 2006 年 8 月頒布的《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未明白說明中央政治局層級的人員是否適用，但自「十四大」開始，新任政治局常委或不具常委身分的政治局委員，除了被視為接班培養的人選外，無人能在同一職務，任職超過十年。⁴⁴¹ 這也顯示「同一(層級)職務，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十年」的任期規範也逐漸在政治局中形成。另外，根據觀察，自「十四大」以來，新任不具常委身分的政治局(包含候補)委員者，在此一層級連續任職兩屆，而未達離退年齡時，皆能順利晉升為政治局常委，如吳邦國、溫家寶和黃菊等人。⁴⁴²

(三) 學歷要求：儘管中共未明文規定政治局委員須具備的教育水平，但在本文第四章的表 4-3「自十二大以來歷屆政治局成員的教育程度」中，可以清楚的看出政治局成員的知識水準已逐漸提升，且於黨政領導幹部「知識化」的趨勢下，在「年齡是個寶，學歷不可少」的中國官場文化中，未來除了軍職代表外，具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將成為競逐政治局委員職務的基本條件。

(四) 政治局常委會的職務分工：自「十四大」開始，固定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的職務有總書記(包含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的「三位一體」、全國人大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常務副總理和中紀委書記。然而在「十六大」後，常委會雖然因為從「七人制」變為「九人制」，使得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的職務增加了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主任和政法委書記兩職，但若將時間往前推移，可以發現這兩項職務並非經常性地由政治局常委擔任，且若輔以 2012 年 11 月召開的「十八大」來看，常委會又變回「七人制」，在功能性重疊的考量之下，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主任和政法委書記兩職應該會退出政治局常委會。另外，由政治局常委擔任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之「三位一體」的職務也

⁴⁴¹ 政治局(常委)委員任職時間無法超過十年的主要因素還是受制於離退年齡的規範。

⁴⁴² 這三人之中，黃菊的情況較為特殊。黃菊是在十四屆四中全會才被增選為政治局委員，並連任至「十五大」，在「十六大」時，晉升為政治局常委，其任政治局委員的時間雖未滿十年，但確實是歷任兩屆。

有所爭議，因為過去曾發生鄧小平和江澤民以普通黨員身份長時間擔任軍委主席一職，不過，在胡錦濤於「十八大」時，以「裸退」的方式交出軍委主席職務後，應該有助於釐清這部分職權不清的問題。

此外，不具常委身分的政治局委員，其職務也有些許的固定模式，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慶等四地直轄市，在平衡地方勢力的考量下，未來該地的市委書記都將是由政治局委員出任，此外，廣東省委書記也一直是政治局委員的當然人選，因該地長久以來是施行改革開放政策的重要指標省份。最後，自「十四大」以來，政治局中固定會有兩名的軍職代表。

(五) 循序漸進、逐級晉升：自「十四大」以來，不具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歷就晉升至政治局常委的僅有劉華清、朱鎔基、胡錦濤、習近平和李克強，在這之中的前兩位是於「十四大」時當選，而後三位則皆被視為是培養接班的人選；另一方面，自「十四大」以來，歷屆政治局成員，大多是先具中央委員會資歷(委員或候補委員)再擔任政治局委員。因此，自「十五大」開始，除了被視為接班培養的人選外，新任政治局常委者，都先歷任過政治局(候補)委員；而擔任政治局委員者，絕大多數都先有中央委員會的資歷。⁴⁴³這樣的發展，也使得當屆的政治局委員，在不受年齡和任期的制約下，且無重大違紀的情事發生時，其在下一屆的政治局中，將具有晉升的優勢條件。

中共權力繼承機制的制度化浪潮，始於1980年代左右，當時鄧小平有感於派系激烈鬥爭，以致於耗損政治菁英，以及文革過後，幹部年齡嚴重老化等問題不僅不利於黨和國家的發展，且幹部新老交替機制的不足，將有害於政治穩定之維持和執政能力之提升，因此他相繼推動幹部任用「四化」、梯隊接班、建立幹部退休制度、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和實行集體領導、分工合作等措施。在這時期，鄧小平具有的強大政治威望，有利於他扮演制度建立者的角色。⁴⁴⁴1990年代開始，隨著鄧小平的退休和死亡，中共領導人在普

⁴⁴³ 「循序漸進、按部就班」的晉升規律由學者寇建文所提出。另外，「十四大」以來的歷屆政治局成員中的劉華清、譚紹文和曾慶紅的情況較特殊。劉華清的中央委員資歷是在「十二大」時取得；而譚紹文和曾慶紅都是在當屆取得中委會資歷，就直接進入政治局。詳見寇健文，《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10》，頁 296-299。

⁴⁴⁴ Andrew J.Nathan 著，何大明譯，《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中國政治變遷之路》(Political Change

遍不具革命經歷的情況下，其權力來源從魅力型權威轉變成職務型權威，任何一位領導人不再具有先天高於同輩的權威基礎，致使中共菁英之間的關係相對平等，⁴⁴⁵這樣的發展，也有助於制度化的規範之穩固和持續，因為，一旦政治菁英之間對甄補規範達成共識後，任何一方皆不具備足夠的政治能量能夠在事後予以推翻，致使中共菁英甄補規範的制度化亦趨明顯。⁴⁴⁶

但是，本文也同時注意到，在省級(含)以下黨政幹部任用制度逐漸完善的情況下，屬於「黨和國家領導人」層級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其甄補規則卻僅是仰賴政治菁英間的協議、默契或慣例，不僅顯示出權力核心中，政治角力的複雜性和重要性，且一再出現「因人而異」的例外情事，也凸顯出甄補規範無法體現「制度」的普遍適用性和一致性之意涵，這也無疑是規範無法真正轉變為制度的原因之一。

二、一般認為中共菁英甄補的制度化，將使派系的活動空間相對窄化，因為一旦甄補規範在菁英之間形成共識後，就會對人事的安排產生制約，不再只是單憑派系因素來決定一切。但這並非意味著將會大大削弱派系在人事甄補過程中的影響力。本文在分析「十四大」以來的人事安排後，從「派系」和「制度」之間的互動情形來看，認為派系背景仍是影響中共菁英選拔的主要因素之一。

自「十四大」以來的歷屆人事安排，皆不脫派系角力的色彩。如鄧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談話」，改變了保守派自1989年「六四事件」後，佔居上風的情勢，並在之後的「十四大」上，提拔劉華清、朱鎔基和胡錦濤等具改革思想的人進入政治局常委會。「十五大」時，因為江澤民和喬石之間的權力角力，而有了「因人立制」的離退年齡規範，之後的「七上八下」年齡

in China: From Totalitarian Rule to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頁 55-56。

⁴⁴⁵ 徐斯儉,〈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精英與政策〉,徐斯儉、吳玉山主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精英與政策》,頁 4。

⁴⁴⁶ 寇健文,〈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軌跡、動力與影響〉,《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 3 期,2006 年 5、6 月,頁 66。

限制，一樣被視為是權力鬥爭下的產物，因為制度是用以約束人類的互動行為，其本質是人為制定的限制。⁴⁴⁷而「十六大」時，江澤民在離任前，安排大批江派人馬進入權力核心，使江派勢力在政治局常委會佔絕大多數，以及「十七大」時，共青團派勢力的壯大等情事，更是顯示派系依舊能夠通過甄補規範制度化的過程來影響人事運作，也無疑說明，派系衝突是中共政治變遷的主要動力。⁴⁴⁸

不過和以往相較，中共派系政治的生態也的確有所改變，在權力鬥爭之後，不再是經常性的出現整肅、解職、暴力和殺害等情況，如喬石和李瑞環都曾被認為是政治鬥爭中失敗的一方，但兩人也都能夠「安全下莊」。這是因為在甄補規範逐漸成形的情況下，不僅使中共派系之間的鬥爭轉趨於檯面下化，並且也不再是一場「勝者全得」的零和遊戲。尉健行(喬石)、吳官正(李瑞環)、羅幹(李鵬)和「十六大」的江派人馬等人的晉升，皆曾被認為是派系繼任者的角色。⁴⁴⁹

另一方面，在甄補規範制度化因素的影響之下，個別派系在權力核心的生命週期，已被縮短。這是因為在以職務為主要權力來源的派系領導人離任後，於失去實質權力基礎的情形下，且在年齡和任期規範逐漸成為退場機制後，他很難長久維持期派系在權力核心的勢力，致使派系無法結構化和組織化。⁴⁵⁰「十七大」時，新海派的弱化就是最好的例證。

事實上，就後革命世代的中共領導人而言，唯有透過正式政治和非正式政治之二元力量的相互支持，才能夠穩固權力基礎。自江澤民時代開始，雖然最高領導人的主要權威是透過職務的授予，但他也必須建構他自己的非正式政治之基礎，來讓權力運作更加順暢和穩定。在政治改革逐步不前的前提下，拉攏派系力量和建立嫡系人馬，將成為中共政治的常態，意即在權力分

⁴⁴⁷ Douglass C. North 著，劉瑞華譯，《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台北，時報文化：1994)，頁 7。

⁴⁴⁸ 朱新民，《1978~1990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八十年代以後中國政治的發展》，頁 327。

⁴⁴⁹ 括弧內的人，被認為是左側人物的提拔者。

⁴⁵⁰ 寇健文，〈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軌跡、動力與影響〉，頁 66。

配是派系鬥爭的本質之情況下，非正式政治將會在正式政治(規範、制度)的框架中，對中共的人事甄補，發揮著一定程度的影響力。

三、從政治繼承循環理論的觀點來看，胡錦濤在「十七大」前，已經先透過地方領導幹部的人事安排與繼承、解構和重構中共的意識形態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和「十六大」相較時，他的權力基礎已經相對穩固許多，但由於胡並非政治強人，在最高領導人的政治接班問題上，雖透過民主推薦方式來解決，但仍不脫遵循派系妥協與平衡的原則。

胡錦濤在上任初期，面對的是江派勢力在政治局常委會佔多數及無法立即掌握軍權的嚴峻情勢，其先透過營造「親民愛民」的形象、掌握「三個代表」的詮釋權和安排省級領導幹部的人事來堅固自己的權力基礎。2003年，「SARS事件」爆發時，胡錦濤在中共執政能力遭受質疑之際，以危機就是轉機之運作方式，順勢提出「科學發展觀」，重新解構並重構中共的意識形態。2004年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後，胡錦濤在接任中央軍委主席後，透過軍銜的授予，積極拉攏軍方勢力，以掌控軍權。2007年的「十七大」，將「科學發展觀」寫入中共黨章，作為貫徹和落實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的指導方針。胡錦濤僅花五年就建構了一套屬於自己的思想論述，其速度之快，曾被認為明顯優於江澤民，⁴⁵¹自此，胡錦濤的權力地位已經相對穩固許多。

但是，儘管如此，胡錦濤仍舊不具備足夠的政治能量，可以指定在其之後的接班人。習近平為革命元老後代和軍方的資歷，讓他有雄厚的政治資本能夠在競爭之中脫穎而出，並在「民主測評」中，排名先於李克強。另一方面，就李克強而言，在老早就被視為胡錦濤接班人的情況下，雖非自願高調，

⁴⁵¹ 中共研究學者林中斌和耿曙皆曾在各自的文章中，提出此一觀點。詳見林中斌，〈胡錦濤虛讓實贏〉，《中國時報》，2007年10月23日，A15版；耿曙、陳陸輝、涂秀玲、盧乃琳，〈胡錦濤時代財政資源分配的邏輯：經濟增長、社會穩定或均衡發展？〉，陳德昇主編，《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台北，印刻文學：2008年)，頁381。

但顯然違背接班文化中，低調行事的原則，以致可能遭受「棒打出頭鳥」的影響。而對胡錦濤來說，縱使習近平是江派勢力為反制李克強接班而提出的支持對象，也不代表習近平是江派勢力的人馬，事實上，習近平雖有太子黨的身分，但確無明顯的派系屬性，胡錦濤藉由「民主測評」的結果，接受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並列接班，不僅能夠提升其政治聲望，且或許在「恩庇侍從」的中國傳統文化中，能夠獲取更大的政治利益。

從「十七大」的人事安排顯現出，個人專斷獨行的「指定接班」已經不復存在。事實上，自中共建政以來，魅力型領袖憑藉個人意志安排在其之後的接班人，使接班人的統治正當性，更多層面是來自於魅力型領袖的政治權威，在權責劃分不清的情形下，接班人無疑僅是魅力型領袖在權力格局中的政治代理人，一旦出現有違魅力型領袖的政治利益之情事時，接班人往往會成為被犧牲的對象而遭到鬥爭、殺害或罷黜，如劉少奇、林彪、胡耀邦和趙紫陽等人。

1989年「六四事件」後的中共領導人，已開始慢慢退去前代領導人專斷獨行的「指定接班」之色彩。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接班安排，雖然鄧小平仍握有很大部分的主導權，但江澤民是先經由元老的推薦，後由鄧小平的同意，才能在危急之際，躍升為中共最高領導人；而胡錦濤的接班地位，雖然是源自於鄧小平的隔代指定，但也有一小部分是仰賴制度層面的力量，當時胡錦濤以逐步晉升的方式，一路從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家副主席到軍委副主席，當時胡錦濤的接班態勢在時勢所為在已儼然成形。

和以往相較，「十七大」用「民主測評」之方式來選拔接班人，可說是更仰賴正式政治層面的力量，不過必須注意的是，其依舊是一種「由上而下」的選任方式，因此，不能排除非正式政治在這過程中的影響力。總而言之，後革命世代的中共領導人，在政治菁英之間，權力平衡的發展模式中，在無重大政治情勢變動時，已難聚積強大的政治威信來指定在其之後的接班人，未來競逐接班者，必須先通過制度和非制度力量的磨合，才能夠脫穎而出。

四、從本文的觀點，來觀察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和未來發展。

2012年11月15日，中共召開第十八屆一中全會，會中選出習近平(59)、李克強(57)、張德江(66)、俞正聲(67)、劉雲山(65)、王岐山(64)和張高麗(66)為政治局常委。包含上述7人在內的政治局委員為馬凱(66)、王滬寧(57)、劉延東(67)、劉奇葆(59)、許其亮(62)、孫春蘭(62)、孫政才(49)、李建國(66)、李源潮(62)、汪洋(57)、張春賢(59)、范長龍(65)、孟建柱(65)、趙樂際(55)、胡春華(49)、栗戰書(62)、郭金龍(65)、韓正(58)。此名單一出，各方焦點大多集中在政治局常委的人事上，並以江派勢力大勝或胡錦濤在「十八大」上的人事大敗來報導。但是否真如所述，應該有更深入的探究。

「十八大」的常委名單，看起來胡錦濤似乎有所讓步，但單單僅此觀點來看待，可能過於獨斷。先排除早在「十七大」就確認接班地位的習近平和李克強兩人，而張德江、俞正聲和劉雲山等3人，皆是在「十六大」起就擔任政治局委員，並連任兩屆，在未達離退年齡的情況下，依據往例，且在論資排輩的文化中，本來就具有晉升的優勢。若加上王岐山和張高麗兩人，以年齡來看，這5人僅屬過渡性質的領導班子，在離退年齡不變(68歲)的情況下，都將在2017年的「十九大」時退出政治局。屆時，已連任兩屆政治局委員的團派人物李源潮和汪洋將可望順利進入常委會。

而除了李源潮、汪洋和軍職代表外，在「十九大」不受年齡限制的僅有劉奇葆、孫春蘭、趙樂際、胡春華、栗戰書、王滬寧、孫政才、張春賢和韓正等9人，其中前五人雖不盡然皆被視為團派，但都具有共青團的經歷。尤以年僅49歲且曾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春華最受注目，和一樣不到50歲的孫政才被視為中共第6代的接班人。以「十八大」的人事安排來看，在無重大政治變化的前提下，「十九大」時，政治局將會有不小幅度的人事改組，這樣的狀況，的確有別於過往第二屆任期，以穩定為主的改組型態。

在經過統整匯合之後發現，本文之研究成果，大致符合原先預期之研究目的。隨著強人時代終結，中共的政治繼承模式也隨之轉型，過去由強人獨裁主導的權力接班安排已經不復出現，是以後革命世代的政治菁英，其權力來源是透過黨政職務的授予，因此，在缺乏絕對的政治權威之情況下，已難再有獨排眾議的政治能量，對於政治接班的安排，和過去相較，有更大的層面是倚靠制度性的規範來解決這方面的爭議，其中包括年齡限制、任期規範、政治經歷..等，這也致使中共菁英甄補的制度化情形亦趨明顯。不過，雖然制度性的甄補規範已逐漸建立，也成為政治菁英間的共識，但我們依舊可以觀察出非制度性力量在人事運作中的影響力，如「十七大」的人事甄補，便是最好的例證。「十七大」時，「團系」出身之政治局委員人數的增長和「新海派」勢力的消退，顯見非正式政治仍舊可以通過甄補規範制度化的過程來影響人事安排。

另外，就胡錦濤而言，雖然他的影響力在「十七大」時已經逐漸顯見，並拔擢了一批同屬「團派」的政治菁英進入權力核心，但由於其非強人，在政治菁英間權力相對平衡的情形下，政治情勢已經不允許他能夠指定在其之後的接班人選，未來欲進入接班梯隊者，將須通過非正式政治和正式政治之間的磨合，才能夠脫穎而出，由此可見，中共在排拒西方民主政治之情形下，亟欲藉有意識的栽培政治菁英，來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菁英政治，在無重大政治體制改革之前提下，未來此一模式將可能繼續延續下去。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本文從歷史的角度，探究中共權力核心甄補規範的演進，研究後發現，中共政治菁英甄補的確逐漸受到制度性因素的制約，但亦不能忽略非制度性因素在這其中的影響力，在黨國體制的框架之下、黨管幹部的原則下，之後可以持續朝這方向來研究中共的人事安排，尤其是在現今派系共存、權力平衡的模式中，未來中共是否會更加倚重制度性規範來解決人事紛爭，以避免

派系爭權，是個相當值得關注的議題。以下將對本研究的不足提出說明和給予未來研究的建議。

首先，本文在時間點上，主要是自「十四大」起，來觀察政治局人事安排的演變，並探究左右人事佈局的因素。但未來研究者若將時間點往前推移，以及往後延續，則更可以看出中共權力機構人事演變的全貌，將更能全面性地解釋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性因素在甄補過程中的影響力。其次，中共權力繼承機制是「由下而上」的發展，意即在各個層級中，都可以看出接班梯隊的規畫，而本文是將焦點集中在中共權力核心—政治局，未來研究者，可以將研究目標往下移動，如中央委員會、省級領導幹部，或者是在研究中適時和適切融合這一部分，將使研究更加完善。

最後，本文是從派系主義結合歷史制度的觀點出發，主要是由於單以派系主義來探就中共菁英甄補有其侷限性。因為中共從不公開承認內部派系的存在，也不給予派系正當性和合法性的地位，加上人際關係與權力運作的複雜性、中共政治的不透明性，致使派系之間的權力關係網路通常是隱晦不明，難以讓外界得知，且派系成員並非鐵板一塊，在以交換最大利益為目的之前提下，也有可能出現轉向依附當權者的現象，這都再再增添政治菁英派系屬性認定的困難度，因此，在研究上，對派系的劃分通常是以「最大公約數」來看待，即從最沒有爭議的角度來認定，未來研究者若能對政治菁英的升遷過程加以深入研究，將可能有效地減少這方面的爭議，也會讓研究更有價值性。另外，本文觀察到，和當權者在關係網路有明顯連結者，似乎有較大的機會可以進入權力核心，如「十六大」時「上海幫」的壯大和「十七大」時「團派」的崛起，這樣的趨勢是否會持續下去，也相當值得關注。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一、專書及專書論文

- David Bachman 著，張鐵志、林葦芸譯，2000。〈鄧後中國的政治衝突模式〉，田弘茂、朱雲漢編，《江澤民的歷史考卷》。台北：新新聞文化，頁 68-86。
- Douglass C. North 著，劉瑞華譯，1994。《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成就》，(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台北，時報文化。
- Ellis Joffe 著，張鐵志、林葦芸譯，2000。〈人民解放軍和政治〉，田弘茂、朱雲漢編，《江澤民的歷史考卷》。台北：新新聞文化，頁 112-131。
- Lowell Dittmer 著，張鐵志、林葦芸譯，2000。〈中國新領導—從分工、政治背景、與政策傾向評量〉，田弘茂、朱雲漢編，《江澤民的歷史考卷》。台北：新新聞文化，頁 44-67。
- Lucian W. Pye 著，胡祖慶譯，1989。《中國政治的變與常》(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台北：五南。
- Nathan, Andrew J. 著，何大明譯，2007。《從極權統治到韌性威權：中國政治變遷之路》(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From Totalitarian Rule to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台北：巨流出版。
- 丁樹範，2003。〈黨還指揮槍？軍隊改革與黨軍關係變化〉，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文化，頁 96-119。
- 丁望，2008。〈中共「十七大」與權力景觀—以解構的視角分析政治局強勢競爭者〉，陳德昇主編，《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台北：印刻出版，頁 91-131。
- ____，2005。《胡錦濤宇共青團接班群》。香港：當代名家。

_____, 2002。《曾慶紅與夕陽族強人》。香港：當代名家。

中共中央黨校編，2004。《執政黨建設若干問題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組織部編，2003。《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人才》。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

_____，1997。《中國共產黨組織工作教程》。北京：黨建讀物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1991。《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偉光，2004。《科學發展觀研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

王官德、劉承宗、李化成，2003。《中國共產黨史》。台北：五南。

王躍生，1997。《新制度主義》。台北：揚智文化。

王嘉州，2008。〈中央與地方政經權力關係之轉化〉，高長、陳德昇主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評價與反思》。台北：遠景，頁 73-90。

艾仰樺、陳曉銘，2007。《胡錦濤的團隊》。香港：明鏡出版。

阮銘，2009。《鄧小平帝國 30 年》。台北：玉山社出版。

_____，1992。《鄧小平帝國》。台北：時報文化。

朱光磊，2004。《中國政府與政治》。台北：揚智文化。

朱新民，1991。《1978~1990 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八十年代以後中國政治的發展》。台北：永然文化。

朱宏源主編，1999。《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

任慧文，1998。《中南海跨世紀領導層》。台北：遠景。

_____，1997。《鄧後權力交班內幕》。台北：書華出版社。

吳玉山、林文程、江水平，1995。《後鄧時期對大陸及台灣的震盪》。台北，國家發展研究文教基金會。

吳安家，2004。《中共意識形態的變遷與持續 1949-2003》。台北：國史館。

- 吳國光，1997。《逐鹿十五大：中國權力棋局》。台北：遠景。
- 吳國光、王兆軍，1995。《鄧小平死後的中國—解析十個生死攸關的問題》。
台北：世界書局出版。
- 吳國光、鄭永年，1995。《論中央—地方關係：中國制度轉型中的一個軸心
問題》。香港：牛津大學。
- 李英明，2003。《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台北：生智
文化。
- _____，1999。《中國：向鄧後時代轉折》。台北：生智文化。
- 李久義，1993。〈中共十四大後的權力結構述析〉，共黨問題研究編輯委員會
主編，《中共十四大綜合研究》。台北：法務部，頁 23-41。
- 李成，2012。《通往中南海之路》。紐約：明鏡出版。
- _____，2003。〈十六屆中委會人事構成及其權力均衡〉，丁樹範主編，《胡錦
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文化，頁 16-52。
- 邵宗海、蘇厚宇，2007。《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共決策機制：中共中央工作領
導小組》。台北：韋伯文化。
- 邱平，2003。《第四代爭權內幕》。香港：夏菲爾出版社。
- 何頻、高新，1992。《中共「太子黨」》。台北：時報文化。
- 林宗弘，2011。〈市場轉型與社會不平等〉，王振寰、湯京平、宋國誠主編，
《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研究》。高雄：巨流圖書，頁 267。
- 林琳文，2008。〈中共意識形態的轉型與變遷〉，高長、陳德昇主編，《中國
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評價與反思》。台北：遠景，頁 19-36。
- 林和立，2012。〈中共「十八大」後的派系平衡與改革展望〉，陳德昇主編，
《中共「十八大」菁英甄補：人事、政策與挑戰》。台北：印刻文學，
頁 55-88。
- 易君博，1984。《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
- 胡鞍鋼，1995。《挑戰中國—鄧後中南海面臨的機遇與選擇》。台北：新新聞

文化。

胡績偉，1997。《從華國鋒下台到胡耀邦下台》。香港：明鏡出版社。

宗海仁，2002。《第四代》。香港：明鏡出版社。

宗多吉，2009。《六虎相爭十八大》。美國：明鏡出版社，2009年。

俞雨霖，2004。〈胡溫體制的統治結構與權力挑戰〉，朱新民主編，《2003年胡溫體制權力與政策總體檢》。台北：遠景，頁1-10。

垂水健一，1998。〈第十五屆中國共產黨大會後的情勢：向中央反映地方意見的趨勢〉，陳永生主編，《十五大後中國大陸的情勢》。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29-49。

洪志安、洪陸訓、郭雪真，2011。《中共的文武關係：以胡錦濤時期為例的因素分析》。台北：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相江宇，2011。《李克強班底》。香港：明鏡。

_____，2009。《習近平李克強合傳》。香港，明鏡出版。

耿曙、陳陸輝、涂秀玲、盧乃琳，2008。〈胡錦濤時代財政資源分配的邏輯：經濟增長、社會穩定或均衡發展？〉，陳德昇主編，《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台北，印刻文學，頁347-391。

高新、何頻，1998。《誰領導中國：最有權力的24個人》。香港，明鏡出版。

高曉，2011。《習近平—中國新領導人》。台北：高寶國際。

徐斯儉，2007。〈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精英與政策〉，徐斯儉、吳玉山主編，《黨國蛻變：中共政權的精英與政策》。台北：五南，頁1-15。

_____，2003。〈十六大前後中國的政治改革動向〉，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文化，頁122-159。

陳德昇，2008。〈中共政治繼承轉型與精英甄補變遷〉，陳德昇主編，《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策略》。台北：印刻出版，頁9-16。

陳德昇、陳陸輝，2008。〈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陳德昇主編，《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台北：印刻出版，

頁 17-64。

陳堯，2005。《當代中國政府體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陳梓龍、柳金財、曾喜炤，2004。《胡溫體制的治國理論與政策走向初探》。

台北：遠景。

郭華倫，1976。《中共問題研究集》。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張良，2001。《中國「六四」真相》（上冊）。香港：明鏡出版社。

寇健文，2005。《中共菁英政治的演變：制度化與權力轉移 1978-2004》。台

北：五南。

_____，2004。〈中國政治情勢：高層政局的演變〉，丁樹範主編，《中國大趨勢 2003-2004》。台北：新新聞文化，頁 16-35。

_____，2003。〈權力轉移與「梯隊接班」機制的發展〉，丁樹範主編，《胡錦濤時代的挑戰》。台北：新新聞文化。

寇健文、蔡文軒，2010。《瞄準十八大：中共第五代領導菁英》。台北：博雅書屋。

黃信豪，2012。〈改革開放時期中共黨政菁英的結構與輪替：回顧與前瞻〉，徐斯勤、陳德昇主編，《中共「十八大」政治繼承：持續、變遷與挑戰》。

台北：印刻文學，頁 29-55。

葉章美，1998。〈中共十五大後之國有企業改革〉，陳永生主編，《十五大後中國大陸的情勢》。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151-181。

楊開煌，2008。〈發展戰略思考之評述〉，高長、陳德昇主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三十年：評價與反思》。台北：遠景基金會，頁 37-56。

_____，2007。《新政：胡錦濤時代的政治變遷》。台北：海峽學術出版。

楊開雲，1998。〈中共十五大之後的制度改革與社會變遷：一個「新制度論」的觀察分析〉，陳永生主編，《十五大後中國大陸的情勢》。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 205-246。

楊中美，2011。《習近平：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中共新領導人》。台北：時報

文化。

_____，2008。《新紅太陽：中共第五代領袖》。台北：時報文化。

_____，2002。《中共新領袖：胡錦濤》。台北：時報文化。

_____，2000。《江澤民傳》。台北：時報文化。

楊光斌，2003。《中國政府與政治導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董立文，2004。〈從權利繼承看中共政治發展的非制度化〉，林佳龍主編，《未

來中國：退化的極權主義》。台北：財團法人台灣智庫，頁130-163

葉永烈，1995。《陳雲全傳：鄧小平時代的第二號人物》。台北：周知文化。

鄧小平，1993。《鄧小平文選》（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趙紫陽，2009。《國家的囚徒》。台北：時報文化。

趙建民，1998。〈中共十五大的政治經濟分析〉，陳永生主編，《十五大後中國大陸的情勢》。台北：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53-69。

鄭宇碩，2004。《胡錦濤的新時代》。台北：遠景基金會。

鄭永年，2004。《胡溫新政：中國變革的新動力》。新加坡，八方文化。

_____，2002。《江澤民的遺產：在守成和改革之間》。新加坡：八方文化。

_____，2000。《政治漸近主義：中國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前景》。台北：吉虹資訊。

_____，1999。《朱鎔基新政—中國改革的新模式》。新加坡：八方文化。

劉鉞聲，2010。《中國最有爭議的人：溫家寶全傳》。美國：明鏡。

韓文甫，1993。《鄧小平傳—治國篇》。台北：時報出版。

薛曉源、陳家剛，2007。《全球化與新制度主義》。台北：五南。

謝慶奎、楊鳳春、燕繼榮，2005。《中國大陸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

薄一波，1994。《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

薄智躍，2008。〈中共十七屆政治局候選人：從地方精英到權力核心〉，陳德昇主編，《中共「十七大」政治精英甄補與地方治理》。台北：印刻出版，

頁 133-185。

蘇嘉宏，1992。《派系模式與中共政治研究》。台北：永然文化。

鄒讜著，甘陽編，何高潮等譯，2002。《中國革命再闡釋》(Interpreting the Revolution in China)。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二、期刊論文

文沁，1993/9。〈對江澤民營植共軍領導地位之研析〉，《中共研究》，第 27 卷第 9 期，頁 56-74。

中共研究雜誌社社論，1992/8。〈中共「十四大」前黨內兩派的動向〉，《中共研究》，第 26 卷第 8 期，頁 7-14。

_____，1992/2。〈改革論揭開「十四大」序幕戰〉，《中共研究》，第 26 卷第 2 期，頁 1-6。

方國平，1992/11。〈中共「十四大」述評〉，《共黨問題研究》，第 18 卷第 11 期，頁 1-7。

方靜，1997/8。〈中共十五大與黨的團結〉，《中共研究》，第 31 卷第 8 期，頁 26-28。

王玲玲，1993/5。〈中共政權機構人事改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36 卷 5 期，頁 5-20。

_____，1993/1。〈中共「十四大」人事之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36 卷第 1 期，頁 14-26。

王嘉州，2002/10。〈論「三個代表」與政治繼承〉，《中國事務》，第 10 期，頁 22-38。

王似華，2012/2。〈以制度化觀點分析「十四大」以來中共政治局常委之建構〉，《中共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頁 54-68。

王信賢，2008/9。〈傾斜的三角：當代中國社會問題與政策困境〉，《中國大陸研究》，第 51 卷第 3 期，頁 37-62。

_____，2005/2。〈中共保先運動的發展與評估〉，《展望與探索》，第3卷第2期，頁12-16。

王肇隆、郭瑞華，1995/2。〈中共政治菁英結構研究—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探討〉，《國立屏東商專學報》，第3期，頁111-131。

王官德，2000/11。〈中共領導人的權力繼承與鞏固〉，《源遠學報》，第11期，頁77-92。

包淳亮，2007/11。〈對中共十七大權力接班的一些觀察〉，《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通訊》，第17期，頁8-11。

_____，2002/1。〈當代中共權力繼承的制度限制〉，《東亞季刊》，第33卷第1期，頁25-36。

_____，2000/10。〈江澤民在「十六大」全面退休的可能與挑戰〉，《共黨問題研究》，第26卷第10期，頁91-95。

伍小濤，2009/11。〈廬山會議五十年祭：毛澤東與彭德懷的恩恩怨怨〉，《歷史月刊》，第262期，頁86-95。

朱德米，2005/4。〈精英互動中的正式與非正式政治〉，《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第88期，頁146-150。

沈明室，2003/2。〈中共十六大權力繼承與軍隊角色〉，《展望與探索》，第1卷第2期，頁31-51。

吳安家，1994/11。〈論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的政治意涵〉，《中國大陸研究》，第37卷第11期，頁5-15。

_____，1994/1。〈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後的政治動向〉，《中國大陸研究》，第37卷第1期頁14-24。

_____，1992/12。〈中共「十四大」後的政治動向〉，《中國大陸研究》，第35卷12期，頁5-15。

_____，1992/10。〈中共「十四大」前的政治情勢〉，《中國大陸研究》，第35卷第10期，頁5-15。

- 吳玉山，〈意識型態與列寧主義的國家論〉，《東亞季刊》，第 15 卷第 3 期，1984 年 1 月，頁 39-65。
- 吳仁傑，2007/8。〈中共政治局組成及升遷趨勢探討〉，《中共研究》，第 41 卷第 8 期，頁 42-59。
- _____，2007/5。〈中共積極培養「團系菁英」意涵及影響〉，《展望與探索》，第 5 卷第 5 期，頁 17-28。
- _____，2006/6。〈中共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書記接班角色探析〉，《中共研究》，第 40 卷第 6 期，頁 45-61。
- _____，2005/3。〈中共權力繼承機制探討與展望〉，《中共研究》，第 39 卷第 3 期，頁 46-65。
- _____，2001/11。〈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意涵和未來發展〉，《中共研究》，第 35 卷第 11 期，頁 28-46。
- 李奎泰，1992/1。〈胡耀邦和趙紫陽的崛起和下台的比較研究〉，《共黨問題研究》，第 18 卷第 1 期，頁 6-16。
- 李久義，1992/4。〈中共十四大前夕政局情勢〉，《共黨問題研究》，第 18 卷第 9 期，頁 1-9。
- _____，1989/8。〈從權力結構談趙紫陽被整肅因果及影響〉，《共黨問題研究》，第 15 卷第 8 期，頁 1-9。
- 李世明，2011/9。〈中共紀檢委在反腐工作的角色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9 卷第 9 期，頁 36-52。
- 宋國誠，2008/6。〈科學發展觀—中國第三次社會轉型〉，《中國大陸研究》，第 51 卷第 2 期，頁 97-134。
- 林尚立，2007/1。〈從中共「十七大」前瞻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東亞研究》，第 38 卷第 1 期，頁 193-210。
- 俞文學，2007/11。〈胡錦濤人事大敗記〉，《開放雜誌》，第 251 期，頁 11-16。
- 郭錫嘏，1997/12。〈江澤民與大陸反對勢力的鬥爭〉，《共黨問題研究》，第

23 卷第 12 期，頁 4-15。

_____，1997/2。〈「江核心」權力結構面臨挑戰〉，《共黨問題研究》，第 23 卷第 2 期，頁 4-15。

郭瑞華，2003/1。〈中共十六大之人事布局分析〉，《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1 期，頁 9-27。

_____，1994/11。〈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評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0 卷第 11 期，頁 8-17。

唐明輝，1999/3。〈現階段江澤民權力穩固性芻探〉，《共黨問題研究》，第 25 卷第 3 期，頁 17-28。

唐彥博，2007/7。〈中共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之挑戰〉，《中共研究》，第 41 卷第 7 期，頁 57-78。

陳德昇、陳陸輝，2007/12。〈中共「十七大」政治菁英甄補與地方治理策略〉，《中國大陸研究》，第 50 卷第 4 期，頁 57-85。

陳陸輝、陳德昇、陳奕伶，2012/3。〈誰是明日之星？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的政治潛力分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55 卷第 1 期，頁 1-21。

拳鼓，1979/1。〈中共正式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研析〉，《中共研究》，第 13 卷第 1 期，頁 91-99。

陳永發，2010/9。〈毛澤東與七千人大會：民主發揚還是文革預演？〉，《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9 期，頁 127-169。

陳述之、江衍良，2012/9。〈改革開放時期中共意識形態的結構與演變：由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學發展觀的發展過程〉，《中國大陸研究》，第 55 卷第 3 期，頁 1-33。

陶儀芬，2003/3。〈「十六大」後大陸的經濟改革與政治繼承〉，《中國大陸研究》，第 46 卷第 2 期，頁 27-40。

張國聖，2004/12。〈當代中共官方意識形態發展的詮析〉，《中國大陸研究》，第 47 卷第 4 期，頁 25-50。

- _____，2004/11。〈「三差問題」對於中國國家發展的挑戰〉，《通識研究集刊》，第6期，頁17-30。
- 張五岳，1986/3。〈從政治聯合理論檢視中共派系政治〉，《共黨問題與研究》，第14卷第3期，頁30-36。
- 張鎮邦，198/10。〈鄧小平怎樣安排江澤民接班〉，《中共研究》，第23卷第10期，頁26-32。
- 張祖樺，2007/10。〈政改沒戲唱團派崛起有隱憂〉，《開放雜誌》，第250期，頁27-29。
- 康橋，1992/11。〈對中共「十四大」中共領導人事調整之分析〉，《中共研究》，第26卷第11期，頁25-47。
- 寇健文，2007/10。〈胡錦濤時代團系幹部的崛起：派系考量 VS. 幹部輸送的組織任務〉，《遠景基金會季刊》，第8卷第4期，頁49-95。
- _____，2007/9。〈既重用又防範的菁英甄補：中共海歸派高官的仕途發展與侷限〉，《中國大陸研究》，第50卷第3期，頁1-28。
- _____，2007/9。〈中共十七大與政治菁英的新老交替〉，《國立政治大學中國大陸研究中心通訊》，第15期，頁4-7。
- _____，2006/5、6。〈中共與蘇共高層政治的演變：軌跡、動力與影響〉，《問題與研究》，第45卷第3期，頁39-75。
- _____，2004/9。〈中共菁英政治的研究途徑與發展〉，《中國大陸研究》，第47卷第3期，2004年9月，頁1-28。
- _____，2001/9。〈共青團與中共政治菁英的甄補：團中央常委仕途發展調查〉，《中國大陸研究》，第44卷第9期，頁1-26。
- _____，2000/3。〈政治繼承與共黨政權結構穩定性的比較研究〉，《問題與研究》，第39卷第3期，頁57-73。
- 寇健文、黃霈芝、潘敏，2006/7。〈制度化對中共菁英甄補之影響：評估十七大政治局的新人選〉，《東亞研究》，第37卷第2期，頁1-38。

- 曹海濤、葉日松，2012/4。〈中國大陸轉型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與制度變遷〉，《全球政治評論》，第38期，頁109-134。
- 許志嘉，2000/4。〈六四天安門事件決策過程與大陸民主化前景〉，《東亞季刊》，第31卷第2期，頁21-42。
- 黃清賢，2008/7。〈中共領導人的辯證思維研究〉，《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5期，頁277-308。
- 黃宗昊，2010/9。〈歷史制度論的方法立場與理論建構〉，《問題與研究》，第49卷第3期，頁145-176。
- 曾慶華，2003/7。〈中共權力結構與決策模式〉，《中共研究》，第37卷第7期，頁26-45。
- 楊開煌，2007/12。〈中共政治發展初探：以人事接班與重大政策之決策機制為例〉，發表於「中共十七大觀察報告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頁15-31。
- _____，2007/11。〈解讀中共「十七大」〉，《中共研究》，第41卷第11期，頁49-63。
- _____，2002/12。〈對江澤民十六大政治報告之研析〉，《中共研究》，第36卷第12期，頁25-32。
- _____，2002/7。〈中共「十六大」之接班與人事安排——內在邏輯之探討〉，《遠景基金會季刊》，第3卷第3期，頁103-135。
- 趙建民，2007/12。〈科學發展觀與胡錦濤路線〉，《展望與探索》，第5卷第12期，2007年12月，頁43-46。
- _____，1997/9。〈評中共「十五大」〉，《共黨問題研究》，第23卷第9期，頁1-3。
- _____，1992/12。〈對中共「十四大」的權力構想〉，《政治學報》，第20期，頁241-259。
- 趙建民、劉松福，1997/8。〈中共中央總書記地位演變之研究：兼論總書記

- 與書記處之關係演變》，《共黨問題研究》，第 23 卷第 8 期，頁 29-42。
- 鄭海麟，2008/3。〈「科學發展觀」之我見〉，《海峽評論》，第 207 期，頁 23-24。
- 蔡詠梅，2007/11。〈老子革命兒接班〉，《開放雜誌》，第 251 期，頁 36-39。
- 蔡學儀，2003/6。〈解析中共新領導人胡錦濤〉，《展望與探索》，第 1 卷第 6 期，頁 94-104。
- 蔡相廷，2010/11。〈歷史制度主義的興起與研究取向—政治學研究途徑的探討〉，《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學報》，第 41 卷第 2 期，頁 39-76。
- 龍飛，2000/8。〈中共藉「幹部年輕化」推動新老交替〉，《中共研究》，第 34 卷第 8 期，頁 25-35。
- ____，1999/11。〈對江澤民欽定胡錦濤為「接班人」之探討〉，《中共研究》，第 33 卷第 11 期，頁 13-24。
- ____，1997/8。〈從「北戴河會議」看中共「十五大」部署〉，《中共研究》，第 31 卷第 8 期，頁 29-40。
- ____，1996/3。〈江澤民能否穩妥順利接班？—從中共歷次安排接班人失敗談起〉，《中共研究》，第 30 卷第 3 期，頁 13-25。
- ____，1995/5。〈中共政權爭奪戰提前曝光—從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辭職說起〉，《中共研究》，第 29 卷第 5 期，頁 20-32。
- ____，1992/11。〈從中共「十四大」看中共軍事未來走向〉，《中共研究》，第 26 卷第 11 期，1992 年 11 月，頁 80-91。
- ____，1992/8。〈中共「十四大」重要人事安排預測〉，《中共研究》，第 26 卷第 8 期，頁 15-29。
- 鍾穎盛，2000/7。〈中共中央政治局角色之探討—兼論其黨政關係〉，《共黨問題研究》，第 26 卷第 7 期，頁 7-17。
- 薄智躍，2012/3。〈中國大陸的黨軍關係〉，《中共研究》，第 46 卷第 3 期，頁 37-44。

三、學位論文

王德立，2009。《胡錦濤的戰略—科學發展觀的意涵》。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

吳宜純，2007。《中共領導人「指定接班」問題之研究》。花蓮：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

姜孟伶，2001。《鄧小平時期中共政治繼承之研究》。台北：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四、報紙及網路資料

BBC 中文網，2012/9/18。〈分析：黨內無派不再千奇百怪〉，《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ese_analysis/2012/09/120918_ana_party_factions.shtml>。

人民日報，2012/6/26。〈中國道路—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歷程〉，《新華網》轉載，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6/26/c_112287084_4.htm>。

人民報，2001/8/25。〈美國之音：中國社會貧富懸殊驚人〉，《人民報》，
<<http://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01/8/25/15350b.html>>。

中共黨史網，〈點燃文化大革命的三把火〉，《中共黨史網》，<<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0190/70194/5206586.html>>。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網站，2000/6。《深化幹部人事改革綱要》，
<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0/content_60412.htm>。

中國網，2004/9/27。〈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全文)〉，《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4/Sep/668376.htm>>。

_____，2004/2/29。〈溫家寶：堅持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4/Feb/507198.h>

tm>。

中國評論新聞網，2007/7/26。〈新一輪省級黨政一把手調整 年輕化特點明顯〉，《中國評論新聞網》，〈<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04/1/7/3/100417398.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417398>〉。

中共中央，2002/7/9。〈中共中央關於印發《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的通知〉，《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71380/102565/182144/10995045.html>〉。

_____，2007/10/21。〈中國共產黨章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18/content_633225.htm〉。

經濟日報，2006/7/21。〈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新華網》轉載，〈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7/21/content_4862102.htm〉。

文匯報，2007/11/22。〈新一屆中委 逾半新面孔〉，《文匯報》，〈<http://paper.wenweipo.com/2007/10/22/CH0710220001.htm>〉。

共產黨新聞網，1982/2/2。〈中共中央關於建立老幹部對修制度的決定〉，《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97/4495001.html>〉。

_____，1992/11/3。〈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積極大膽地做好選拔青年幹部工作的通知〉，《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BIG5/64162/71380/71387/71591/4855070.html>〉。

江澤民，1995/9/28。〈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係〉，《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3/15/content_2700833.htm〉。

_____，1995/9/27。〈幹部一定要講政治〉，《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86/4494287.html>〉。

_____，1995/11/8。〈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86/4494287.html>〉。

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86/4494279.html >。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2007/12/28。〈中國大陸群體性事件頻繁，步入「風險社會」參考資料〉，《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官網》，〈<http://www.mac.gov.tw/ct.asp?xItem=63867&ctNode=6451&mp=1>〉。

多維新聞網，2007/10/5。〈多維判斷：十七大政治局常委三下四上〉，《多維新聞網》，〈<http://politics.dnews.com/news/2007-10-05/3343463.html>〉。

阿波羅新聞網，2007/10/23。〈港評：中共十七大人事佈局四個為什麼〉，《阿波羅新聞網》，〈<http://www.aboluowang.com/news/2007/1023/60311.html>〉。

林中斌，2007/10/23。〈胡錦濤虛讓實贏〉，《中國時報》，A15版。

法制晚報，2007/6/30。〈省級黨委換屆結束 年輕化成領導群體特徵〉，《新華網》轉載，〈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7-06/30/content_6310429.htm〉。

金鐘，2012/11/2。〈十八大徘徊歧路〉，《開放雜誌網》，〈<http://www.open.com.hk/content.php?id=1012>〉。

何頻，〈胡錦濤接受習近平更有利〉，《看中國》，〈<http://m.kanzhongguo.com/node/215220>〉。

法悟、穆易，2005/2。〈中原憑什麼崛起〉，《中國經濟週刊》，第7期，〈《人民網》轉載，〈<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1631/14124/1258892.html>〉〉。

南方周末，2006/11/9。〈中組部前部長直言高官管理：非常反感跑官要官〉，《新華網》轉載，〈http://news.xinhuanet.com/lian Zheng/2006-11/09/content_5309743_1.htm〉。

柯宇倩，2012/9/26。〈寇健文：汪洋至少二十大不任常委〉，《明鏡新聞網》，〈http://www.mingjingnews.com/2012/09/blog-post_6166.html〉。

- 高毅，2005/2/28。〈胡錦濤在兩會前被稱為黨領導“核心”〉，《BBC 中文網》，
<http://news.bbc.co.uk/chinese/simp/hi/newsid_4300000/newsid_4306300/4306321.stm>。
- 陳雲，1982/9/6。〈在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談話〉，《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78/4493892.html>>。
- ____，1981/5/8。〈培養中青年幹部是當務之急〉，《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84/64186/66697/4495004.html>>。
- 陳思名，2009/2/17。〈實現黨中央領導集體的順利過渡〉，《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43371/8818514.html>>。
- 陳奕廷，2007/10/15。〈誰是胡錦濤接班人？團派李克強最受矚目！〉，
《NOWNEWS 新聞網》，<<http://www.nownews.com/2007/10/15/10844-2171176.htm>>。
- 陳有為，2007/11/6。〈任重道遠的中國政壇新秀〉，《聯合早報》。
- 熊亮華，2009/6/1。〈十一屆三中全會後 中央高層決策選拔年輕幹部內幕〉，
《共產黨新聞網》，<<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4956/9391347.html>>。
- 許志嘉，2007/11/26。〈中共十七大的幾點觀察〉，《銘傳一週網路版》，
<<http://www.week.mcu.edu.tw/oldweek/685/speak.htm>>。
- 國立政治大學中共政治菁英資料庫，<<http://ics.nccu.edu.tw/chinaleaders/index.htm>>。
- 黃碩，2006/11/12。〈中共中央發出通知，部署黨的十七大代表選舉工作〉，
《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1/12/content_5319132.htm>。
- 楊琳，2011/6/27。〈走向成熟的集體領導制度〉，《求是理論網》，<<http://>>。

- www.qstheory.cn/zz/zgtsshzyll/201106/t20110627_89303.htm>。
新華社，2007/10/21。〈十七大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1/content_6917972.htm>。
- 新華網，2006/8/6。〈受權發佈：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暫行規定〉，《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8/06/content_4926300.htm>。
- _____，2006/8/6。〈受權發佈：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規定〉，《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8/06/content_4926453.htm>。
- _____，〈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1/21/content_698625.htm>。
- _____，2006/7/6。〈中組部印發實施地方領導班子和幹部考核試行辦法〉，《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6-07/06/content_480307.htm>。
- _____，2007/10/19。〈十七大代表清醒看待中國未來面臨的五大挑戰〉，《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19/content_6907538.htm>。
- 劉思揚、孫承斌、劉剛，2007/10/24。〈為了黨和國家興旺發達長治久安，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1498.htm>。
- 蔣益文，2011/4/6。〈鄧小平廢除職務終身制始末〉，《共產黨新聞網》，<<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4317188.html>>。
- 韓振峰，2012/8/27。〈科學發展觀形成與發展的歷程〉，《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2/0827/c49150-18839025.html>>。
- 蘇紹智，2001/8/29。〈中共向何處去？江澤民允許資本加入黨之後〉，《BBC

中文網》，<http://news.bbc.co.uk/hi/chinese/china_news/ewsid_1515000/15152491.stm>。

【英文部分】

- Bachman, David, 2000. "Emerging Patterns of Political Conflict in Post-Deng China," in Hung-mao Tien and Yun-han Chu eds., *China under Jiang Zemin*, Colorado: Lynne Rienner, , pp. 35~70.
- _____, 1996/1. "Succession Politics and China's Futu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9, NO.2, pp.375.
- _____, 1992/11. "The Limits on Leadership in China," *Asian Survey*, Vol.32, No.11, pp.1046-1062.
- Bialer, Seweryn, 1980., *Stalin's Successors :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ttmer, Lowell, 2001/1. "The Changing Shape of Elite Power Politics," *China Journal*, no. 45, pp. 53~67.
- _____, 1996/9.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Issues & Studies*, vol. 32, no.9 , pp.1~18.
- _____, 1995/7.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China Journal*, no. 34, pp.1~34.
- _____, 1978/10. "Bases of Power in China: A Theory and Analysis of the Fall of the 'Gang of Four',"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1 pp. 26~60.
- Fewsmith, Joseph, 1994.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New York: M. E. Sharpe.
- Hall, Peter and Taylor, Rosemary, 1996/12.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ree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Vol.44, pp.936-944.
- Li, Cheng, 2001. *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Pye, Lucian, 1995/7. "Fac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Guanxi: Paradoxes in Chinese Administrative and Political Behaviour," *China Journal*, no. 34, pp. 35~53.
- _____, 1981.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 Nathan, Andrew, 1976/12. "Policy Oscil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 Critique," *The China Quarterly*, Vol.68, pp.720-733.
- _____, 1973/1. "A Factionalism Model for CCP Politics," *China Quarterly*, no. 53, pp. 33~66.
- Shirk, Susan L., 1993.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hambaugh, David, 2001/2. "The Dynamics of Elite Politics during the Jiang Era," *China Journal*, no.45, pp. 101~111.
- Teiwes, Frederick C., 1995/7. "The Paradoxical Post-Mao Transition: From Obeying the Leader to Normal Politics," *China Journal*, no. 34, pp. 55~94.
- Tsou, Tang, 1995/7. "Chinese Politics at the Top: Factionalism or Informal Politics? Balance-of- Power Politics or a. Game to Win All?," *The China Journal*, NO.34, pp.95-156.
- Zheng, Shiping, 2005/4. "The New Era in Chinese Elite Politics," *Issues and Studies*, Vol.41.NO.1 ,pp.190-198.
- _____, 2003. "Crossing the Political Minefields of Succession: From Jiang Zemin to Hu Jiantao," in John Wong and Yongnian Zeng eds., *China's Post-Jiang Leadership Succession: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pp.59~85.